

绪 论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是一门思想史科学。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科学，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阐述，揭示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以作为指导党的建设的理论依据。因此，它不但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每个历史时期发展的状况和特点，而且要阐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动因和发展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中主要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导师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和具体革命实践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建党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在无产阶级建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阐明这一学说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便是党的学说史的任务。因此，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就是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研究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因而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巩固与壮大的实践中实现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总结中形成的，都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或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这些革命实践，离开了党的活动的历史，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并不着重研究这些革命实践活动的历史，而是以这些历史为基础和线索，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是一门思想理论科学，因而它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产生于党的建设实践中，反过来又指导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实践过程，除了要以党的建设活动历史为线索外，还必须结合党的建设各个基本原理来进行，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并不具体阐述党的建设各个基本原理及其内在联系，而是着重研究这些基本原理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以何种形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即它的来龙去脉。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主要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创立、发展党的学说的历史进程为主，因而它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经典著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经典著作（包括有关的党的决议、报告和文献）中。这些经典著作都是革命领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离开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研究，党的学说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研究有关党的建设的经典著作，并不是对这些著作搞历史汇编，也不是孤立地介绍和阐述每篇著作的详细内容，而是研究这些经典著作是在什么情况下、为解决什么问题而发表的，它提出和阐述了哪些重要的建党思想，它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又处于何种地位，从中展示出党的学说产生、发展与完善的历程。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须以革命实践和党的建设实践活动的历史为基础和线索，以党的建设经典著作作为根据，以党的建设基本原理为中心内容，坚持史、论、著相结合，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立，即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第二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俄国的运用和发展，即列宁建党学说；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这些建党理论虽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但都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共同问题而展开论述，因而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此时，无产阶级虽然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既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马克思、恩格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要不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政党。马克思、恩格斯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特点的需要，首先致力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然后通过这个组织的先锋作用和国际纽带作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这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党活动的突出特点。他们的建党活动和建党思想，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

第一国际时期，帮助欧美各国工人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第二国际初期。在这些建党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其主要观点有：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个党应当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它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制定自己的科学纲领和策略；这个党应当按照民主和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它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制度；它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团结；它必须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上述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一些著作中：《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论权威》、《哥达纲领批判》等。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由准备时期进入到直接行动时期。在这个时期，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所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列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落后的俄国，是建立一个组织松散、以议会斗争为主的西欧式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严密的、革命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适应新时代特点的需要，在总结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同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俄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以这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榜样，创建第三国际，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是列宁建党活动的突出特点。列宁在长期的建党活动中，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集中论述了以下建党原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

起来的、有铁的纪律的组织，党内不允许有任何派别组织和集团的存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总结了俄国共产党执政初期的建党经验，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进一步丰富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主要观点有：执政党必须对国家实行全面的领导；执政党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执政党必须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反对官僚主义；执政党必须注意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等等。

列宁完整的建党学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著作中：《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系统阐述和概括了列宁建党学说，并为巩固和建设布尔什维克党而继续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西方资本主义诸国，也不同于虽然落后却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有着十分特殊的国情。如何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特殊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出色地回答了党的建设面临的特殊难题，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毛泽东建党思想独创性的贡献有：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概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

针；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提出执政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 4 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继续发展时期。在这 4 个时期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党的建设方面的著作、报告和文件。其中主要有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论联合政府》第五节、《关于健全党委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党委的工作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还有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党的任务发生重大转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中心任务的条件下，紧紧抓住“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展开了艰难的探索。他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紧密联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和解决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面向 21 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领导全党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突出点有：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强调要坚

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强调要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强调要从严治党，反对腐败，搞好党风建设。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邓小平以下一些著作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

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的意义和方法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主要是学习革命领袖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学习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推向前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一门系统而又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自 1848 年创立以来，迄今已 150 多年了，其间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这些理论既来自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共同的实践，又是适合一定时期和一定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属于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又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的独特内容和适用范围。学习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可以使我们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中，看到理论本身是如何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继承、创新和完善的，从而加深我们对党的学说这门科学的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又不断地完善和向前发展这一学说本

身。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它并不是若干现成结论的排列和汇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一结论的产生，都是同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①因此，要完整准确地领会这个学说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只知道这一学说的一般结论还不够，还必须了解每一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形成过程。就是说，要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学到党的学说的重要结论，而且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导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提高我们掌握和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搞好党的建设的自觉性。面向 21 世纪，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的历史重任。为此，全党必须认真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特别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而要学习和掌握好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就必须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因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在深刻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认真学习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基础和根据，更透彻地把握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和源泉。从而在实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版第 4 卷，第 459 页。

中，自觉地把握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前发展。

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联系实际，首先要联系历史实际。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每一条基本原理，不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这种特性决定了，理论本身不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具有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范围内的适用性。因此，离开这一定条件和范围，理论就会成为教条。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原理，不能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简单地照搬照抄，更不能断章取义抽取只言片语。必须紧密联系当时当地的历史实际，搞清楚每一条原理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它本身包含了什么具体的含义，它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只要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条理论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定位，也才能真正掌握每一条原理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

其次，还要联系当前党的建设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目的，不是为了学历史而学历史，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并运用它来指导当前党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①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跨世纪的历史重任，向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及自身的拒腐防变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为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就需要我们运用党的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只有这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才能既达到学习的目的，又推动党的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向前发展。

最后，还需要联系其他政党的实际。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在与其它政党相比较中发展起来的。其间既有排斥、斗争的一面，也有吸收、借鉴的一面。只有在比较研究中，才能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集中代表，首先具有阶级性和先进性，然而，既然是政党，也必然含有政党的某些共同属性，如应有明确的纲领，要按一定原则组织起来，要为夺取政权或影响政权而奋斗等等。这样，在制定纲领、制定组织原则等方面，可以也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政党的一些合理成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时，便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列宁在制定俄国党的纲领时，多次参照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邓小平在提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时，也肯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人制度的某些优点。任何理论的创立，都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离开人类全部文明遗产，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联系历史上其他一切政党建设的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拓宽思路，在比较中充分吸收他人的有利方面，抵制他人的消极方面，使我们党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壮大起来。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策略，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产生的 社会历史条件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理论，都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也不例外。毛泽东曾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① 这里虽然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同样是适用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近两个世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也不可能产生。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学说提供了社会经济政治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最早出现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00 页。

英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

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18 世纪中期，英国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开始的产业革命，使得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操作，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法国也不例外，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30 年，全国蒸汽机只有 600 多架，到 1847 年增加到 4800 多架。德国虽然比英、法落后，但到 19 世纪 20 年代，资本主义也有了显著的增长。40 年代，仅普鲁士一地就有蒸汽机 1100 多架，大小工厂 78000 多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党逐步产生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政体结构，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环节。以英国为例，1688 年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纪元。与以往君主制相比，议会上升为最高权力机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会，凭借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监控着国王的执行权。又经过 18 世纪英国内阁制的发展，资产阶级不再通过国王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是直接掌握行政权，走向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矛盾，也演变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资产阶级通过不同的政党，在议会中表达自己的意志，这就为政党活动提供了舞台，政党政治由此发展起来。

从根本上讲，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保证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性。但从形式上讲，政党系统扩大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范围，客观上承担着对社会多元利益进行初级协调和整合的功能。因此，政党的存在逐步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也出现了许多为政党和政党政治辩护的理论家。

19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上述经济政治状况，无疑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二、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学说提供了阶级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有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是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到一定程度，它非但满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力向着更大的社会化发展，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是经济危机。1825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范围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商业停顿，信用停止，工厂停业，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发展并日益尖锐起来。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同时产生的。但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同资产阶级一样的经济利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作为受苦受难的阶级出现的。在资本原始积累初期，资本家为攫取高额利润，千方百计地欺压工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①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工人阶级还不成熟，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还停留在捣毁机器，破坏厂房和要求提高经济待遇阶段。

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已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稳定下来，但对无产阶级来讲，仍处在政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3页。

上无权、经济上贫困的境地。这促使广大工人思考自己贫困的根源，这时候，在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工人起义和罢工，开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纪元。特别是 1831 年和 1834 年的法国里昂两次工人起义，1838—1842 年英国出现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以及 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武装暴动，都已经多少带有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①

法国的两次工人起义直接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1830 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代之以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的统治。工人们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可是所得到的微薄工资却不能养家糊口。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工人们提出了自己的工资标准，在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后，工人们举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国民自卫军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工人们被迫拿起武器，举行起义。起义群众曾一度占领了里昂市政府，但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起义最后失败了。1834 年 4 月，里昂工人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斗争的性质，工人们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起义经过 6 天的血腥奋战，最后终归失败。里昂两次工人起义是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无产阶级不再是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而是反对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政治要求走上了政治舞台。

在法国两次工人起义失败后不久，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这是工人阶级走上独立道路的又一标志。1838 年开始的宪章运动的直接导因是工人群众对 1832 年的议会改革和 1834 年的新济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8 页。

法的强烈不满，而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工业革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无穷的利润，而广大的工人却受着无尽的灾难。1832年的议会改革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它只是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成果。工人们从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所做所为中，看到了自己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性。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争取政治上的地位，才能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于是，他们于1838年提出了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人民宪章”，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到1839年5月，签名已达125万人。7月，英国议会否决了人民宪章。1842年5月2日，宪章派第二次向议会递交了有3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但又遭议会的否决。这次工人们举行了大罢工，虽然罢工被镇压下去，但它却唤醒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列宁曾给宪章运动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发生两次织工起义。虽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英国和法国，但德国的工人受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双重压迫，他们同英国和法国的工人一样，也难以忍受资本家对他们的压榨。6月4日，他们捣毁了工厂的机器，并同前来镇压的军队进行了搏斗。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德国工人和英国、法国的工人一样，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对这次起义评价很高，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本质。”^②

恩格斯在评价三大工人运动时说：“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一次工人起义；在 1838—1842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① 也就是说，到 19 世纪 40 年代，创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

三、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所作的深入研究，使他们在实践斗争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带动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唯物史观的创立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吸收历史上人类先进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中产生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吸取了它们有价值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它们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根本的改造，解决了黑格尔把运动和运动的物质对立起来的矛盾，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解决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前提和形而上学结论的矛盾，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创立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整个历史进程的

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还克服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拯救了德国哲学中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在探讨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和研究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1842 年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是他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开始。在退出《莱茵报》以后，马克思 1843 年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1843 年 5 月，马克思创办了《德法年鉴》，他发表在上面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论述了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若不从其它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它一切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必须有革命理论作指导。“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

恩格斯的转变是 1842 年在英国从研究实际问题开始的。1844 年 10 月至 1845 年恩格斯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德法年鉴》上也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论述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1844 年 10 月，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②特别是在 1845 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版第 1 卷，第 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8 页。

“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①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同1842年他们第一次会见不同，这是他们各自通过不同途径完成革命转变的基础上的会见，两人观点完全一致，从此他们开始了共同的战斗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鲍威尔兄弟关于英雄和群氓的唯心史观，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列宁说，这部著作“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形成。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术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都必然要发展为革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首先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伴随唯物史观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党的学说最终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立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对为什么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党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这些论述，既同历史上资产阶级政党划清了界限，又同当时已经存在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同时，这些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们开始着手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并从 1846 年初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19 世纪 40 年代，在工人运动开展较早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些工人组织，比如英国的宪章派、法国的四季社和正义者同盟等。但这些工人组织由于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本身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为了给工人阶级指明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愈来愈多地直接参加革命的工人运动，并在工人群众中宣传自己的科学世界观。首先他们在 1845 年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小组。1846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又与菲利浦·日果合作，共同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设想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使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在共产主义目标下团结起来，创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建立了联系，特

别是同当时最有影响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正义者同盟在各地的小组，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小组。

正义者同盟是 1836 年成立的，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德国的侨民，其指导思想比较混乱，先是信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后来又推崇真正社会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但正义者同盟在西欧各国都建有自己的支部，是当时唯一的国际性的工人组织，通过它可以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就着手做正义者同盟的工作。

但是，要想使正义者同盟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改变其指导思想，使其克服狭隘宗派主义情绪和密谋性的活动方式，使同盟成为群众性的、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使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同盟领导人产生了改组同盟的要求，并向马克思、恩格斯靠拢，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思想体系也需要正义者同盟这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去宣传和实践，这表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种条件正在成熟。

1847 年，马克思、恩格斯以按照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则改组同盟为条件加入同盟，并且立刻对同盟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47 年 6 月 2 日，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决定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这个缺乏阶级分析的口号。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年 12 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了章程，在删去了其中带有空想共产主义的色彩后批准了这个章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同盟不仅要有作为组织准则的章程，还要有行动指南的纲领。为此，恩格斯在一大开会前，就写出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信条草案》作为同盟纲领的第一个稿本，第一次以唯物史观论述了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工人和资本家斗争的产物。但《信条》在论述共产主义时，考虑到同盟的整个思想状况，恩格斯作了妥协，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

1847年10月，同盟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企图将他们的修正稿提交大会讨论，受区部委员会的委托恩格斯写成了同盟纲领的第二个稿本《共产主义原理》。《原理》同《信条》相比，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很大的进步。《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对立基础上的，把共产主义理论建立在完全现实的基础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原理》比《信条》要成熟得多，虽然仍采取了教义问答这种形式，但为大会制定一个正确的纲领迈出了重要一步。1847年11月29日，同盟第二次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的观点在大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大会结束后，马克思、恩格斯受大会的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经过努力于年底完成。1848年2月，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

二、《共产党宣言》阐述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极为丰富。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全面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阶级关系，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制定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科学概括。唯物史观是贯穿《宣言》的一根红线。《宣言》还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科学总结。

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是《宣言》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以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恩格斯后来说道：马克思和他从 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即“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并说，“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②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不但指出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特别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私有制，这种制度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而引起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除了可供出卖的劳动力之外，不占有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5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55 页。

任何财产，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加以保护，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则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从而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无产阶级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宣言》分析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政党的过程，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依靠分散的、自发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为了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由分散的力量变成统一的力量，由自发的力量成为自觉的力量，需要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只有在先进政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又说：“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第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

为了同当时已经存在的几个具有工人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这一点同其他的工人阶级组织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共产党人不是与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但是，共产党又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了共产党同一般的工人阶

级政治组织的区别后，阐述了共产党所特有的性质。这就是，一方面，共产党人强调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具有为共产主义彻底斗争的精神。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第三，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因为它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唯物史观。

恩格斯在其革命活动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阐述了《宣言》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它说明了这样的原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产阶级产生以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只有使整个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不是某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基础上的，他们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5页。

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和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面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①

由于共产党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所以，它在理论方面胜过其它政党，胜过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它能够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它能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它是党的言论和行动的指南，是党的团结战斗的思想武器，是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

第四，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和最终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的最近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的的实现，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即作为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的性质，从而无产阶级也就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党的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消灭私有制；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人们的思想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识，要随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改变而改变，要随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一句话，就是要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第五，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正确的革命纲领和路线，而且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这一论断，实际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总的、基本的策略原理，是共产党人制定斗争策略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一原理，是基于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这一客观事实，考虑到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十分成熟这一现实情况。他们要求共产党人一方面立足于现实，首先要积极参加当前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参加当前斗争时，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要把当前斗争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完成当前的任务，当作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

根据上述策略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具体分析了法国、瑞士、波兰各反对党派的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在法国，共产党要联合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反对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和与封建贵族有联系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瑞士，共产党人要联合激进党人进行民主革命，以便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在波兰，共产党人要支持发动过1846年科拉科夫起义的政党，争取民族解放。以上各国的革命运动，虽然多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但是，它们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

革命扫清了道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此，共产党人应当支持和参加反对现存社会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要积极支持和参加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要努力争取全世界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在合作时要把所有制问题放在首位。这一思想表明，共产党人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团结和争取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

第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问题。

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的实现，除了一个国家和党的自身条件外，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团结也是必不可少的。《宣言》指出，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工人的劳动差别越来越小，工人的工资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越来越趋于一致，这造成了工人解放的国际性；再加上无产阶级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国际资产阶级，他们也会联合起来镇压工人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也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生产工具的改进，交通的便利，一切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文明中来，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无产阶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口号。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国际联合的同时，并不否认各国无产阶级在本民族国家内的任务。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其内容是国际性的，其形式是民族的，如果不

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完成这个任务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所不能代替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消灭国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争取本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就是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敌人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持相互支援的。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阐述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

由恩格斯起草、马克思修改的《同盟章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上的重要文献，它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原则。《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同盟章程》主要阐明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和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它取消了旧的工人组织和政党的神秘性和宗派性的痕迹，使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现代的无产阶级先进的政党。《同盟章程》规定全体盟员一律平等，党内一切事务都由盟员和代表大会来处理；代表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同盟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成员都定期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中央委员会是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要同下级组织经常保持联系，下级组织要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等等。上述规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但已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同盟章程》还规定了盟员条件，即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承认共产主义；不参加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团体；所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经常同组织联系，接受组织的领导；盟员必须获得支部一致通过，才能入盟并加入某

一支部。盟员如果不遵守这些条件将被开除。

四、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创立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立是政党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否认政党的阶级本质，唯心主义地研究政党的属性、形式和外部特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克服了资产阶级党的学说的唯心主义性质，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时，提出了党的阶级性思想，并科学地论述了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使政党理论第一次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还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有本质的区别，使政党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虽然也有各种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打着工人阶级利益代言人旗号的理论家，但他们有的把政党搞成中世纪的神秘的密谋性的团体，相互联系要用代号；有的又强调它的自由性，分散而没有共同的组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展革命作了科学的论述，他们强调了政党的政治纲领，规定了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策略原则和方法；他们规定了政党的政治目的以及为实现这种目的的斗争发展阶段；他们就党的组织原则也作了严格的规定；他们强调了党员的条件。这些论述，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各种工人团体的界限，建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使无产阶级政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活动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9世纪40年代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阶段，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党的建设上也不例外。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的目标是什么？党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些都很现实地摆在了工人阶级面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适应了这种需要，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及时地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党的建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促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也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对于今天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宣言》虽然是 19 世纪中叶产生的，但它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作用不仅限于上个世纪，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宣言》的基本原则将永远指引着工人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论述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依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指针。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 1848 年革命及其对党的学说的阐述

《共产党宣言》刚刚问世，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就席卷欧洲大地。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这场革命风暴检验了他们在《宣言》中所论述的革命理论。他们总结了这次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了新的阐述。

一、1848 年革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

19 世纪 40 年代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激化，欧洲大陆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1848 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才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1848 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①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刚刚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并在其中提出了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69 页。

级的要求。

德国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迅速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提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为了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回到了德国的科伦。6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教育人民认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散布的和平幻想，号召人民进行不断的革命，直到完成反封建的任务。《新莱茵报》起到了德国1848年革命中民主派神经中枢的作用。

但1848年革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发展，到下半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封建势力纷纷抬头，重新恢复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作出了重大牺牲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流亡伦敦。以后，由于发生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再加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沙佩尔——维利希集团的分裂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2年11月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不久，就投入了1848年欧洲革命，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为党如何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成为行动的党提供了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总结说：“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64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后对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

1848 年革命不仅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原则，而且为丰富这些思想提供了客观依据。1848 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主要的有：《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8 日》。这些著作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

第一，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在斗争中要发挥组织的力量。

1848 年革命爆发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刚成立不久，虽然同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它对于如何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也没有经验，只着重于宣传群众，而忽视了在自己周围吸引和组织群众。在 1848 年革命中，同盟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秘密组织已不适合斗争需要，只要投身公开的政治斗争就可以了。这样就使得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8 年革命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它的理论观点或成员的个人作用来实现的。由于上述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8 年革命中没有起到独立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政党作用，因而，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鉴于 1848 年革命的历史教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合的合唱队，而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①所谓秘密和公开的含义，一方面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要在未来的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69 页。

表明无产阶级也要依靠党的组织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独立政党的含义，意味着组织上的独立，不能隶属于其他政党；同时也在思想上也要和其他政党划清界限。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他们是根本差别的，而 1848 年革命更证明这种差别是不可调和的。

第二，加强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同无产阶级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①此外，这种领导核心作用，还表现在同农民的关系上，也就是要在革命中联合农民，实行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而在此之前，他们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认为农民虽然有它革命的一面，但作为小块土地占有者更有它保守性的一面。经过 1848 年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最后认识到，没有农民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便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②而农民也具备了同工人联合的可能性，因为随着革命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幻想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日益解体而破灭，农民的利益已经不同于拿破仑时期，而是和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了，“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③“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6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4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221 页。

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 无产阶级的领导还表现在党同外国组织的关系上，“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把那些适当的和忠实于革命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这个第二种组织的成员应把这种联合会看成是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他们必须始终接受同盟的真正盟员和同盟领导机关的领导。借助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联合会，还可以保证对农民协会和体操团体的特别巩固的组织上的影响。”^②

第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时，曾提出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并没有具体论述。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们通过对德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是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后来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③ 这是因为剥削阶级国家是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工具，即使在资产阶级最先进的国家形式——民主共和国中，这一点也不例外，只有把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机器打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

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关联，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六月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65页，注释（8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99页。

义的失败，使无产阶级“确信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因此，无产阶级的口号应该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凭借革命的暴力粉碎敌人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从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同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项临时性措施，而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② 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为止。后来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 同《宣言》所抽象地提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相比更为具体。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断地革命。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战斗口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中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的思想已经包含了不断革命的含义。1848 年革命使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确了这一思想。他们提出，在 1848 年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以对现存社会实现某些改造为满足，这些要求实现以后便希望尽快地结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0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6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47 页。

革命，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①由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世界共产主义者协会》第一条写道：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②也就是说，不断革命包括两个过程，其一是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二是由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由此可见，不断革命贯穿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

第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

1848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次革命中，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丰富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党的斗争策略的思想。

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制定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为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德国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德国革命已经不同于17、18世纪英法两国的革命，它只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这时的资产阶级也缺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力量和勇气，小资产阶级在革命时的态度也是动摇的。但无产阶级在德国还不是很发达，还不能有力地担当起这次革命的领导重任。因此，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一方面要积极地参加，否则，共产党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6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① 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能超出当时群众所接受的程度和形势的范围，而是力求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适时将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一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在德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认为这符合德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将来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重要的阶段。从而，也为他们后来设想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奠定了基础。

关于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方面，要同他们联合，去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要巩固自身统治谋取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掌握一个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斗争策略。比如：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实现人民主权；认清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实质，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学会武装起义，不要玩弄起义，一旦起义，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投入进攻，等等。特别是 1848 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立即进行其他的革命，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无产阶级政党要支持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

1848 年革命唤醒了欧洲各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运动的态度，并在实际斗争中，支持他们的革命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82—18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4 页。

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他们特别重视匈牙利的民族革命，认为它起到革命同盟军的作用，在欧洲民主势力和沙皇反动势力决战的时候，各个人民的革命斗争将和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支援相互影响。

在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解放运动中，要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他们认为，对待 1848 年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表明了民族运动的态度。他们毫不怀疑地支持革命的民族运动。但对泛斯拉夫运动，则给与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把对沙皇的态度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这为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正确区分民族运动的态度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从一定的历史时期革命运动的历史趋势出发，把具体民族运动置于全局中分析，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总体的利益要求孤立地看待民族问题，更不能离开对国际无产阶级主要敌人的态度来看待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革命的总结，使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为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深入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发展无产阶级党的学说打下了基础。

第二章 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对党的学说的丰富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的。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致力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则继续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他们在 60 年代建立和领导了第一国际的革命活动，70 年代以后在欧美一些国家帮助建立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与 40 年代在国际范围内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新的建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党的建设的许多重要原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建党学说。

第一节 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建党活动

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国际时期和帮助欧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时期。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又独自担负起了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使命，继续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贡献。

一、创立第一国际和为坚持国际的正确纲领路线而斗争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走向低潮。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写成了宏篇巨著《资本论》第一卷，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他们同各国社会主义者加强联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进行组织准备。

到了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1864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宣告成立。马克思出席了成立大会，被选入总委员会，并为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后来，恩格斯也参加了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和党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国际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为国际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第一国际的一切重要文件，几乎都是由马克思起草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始终是第一国际的灵魂和精神领袖。

为了捍卫国际的正确纲领和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同国际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第一国际活动的前期，主要是反对蒲鲁东主义。法国的蒲鲁东是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反对工人进行任何政治斗争，更反对组织工人政党；主张在保留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企图通过建立“交换银行”和“消费合作社”的办法，建立一个所谓的公平社会。马克思批判了这种错误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1867 年的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不可少的措施。”1868 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些决议的通过，不仅标志着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而且把党的纲领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

在第一国际后期，主要是反对巴枯宁主义。巴枯宁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政治运动。他背着国际组织宗派集团，进行分裂活动，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并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种种诽谤，阴谋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巴枯宁主义是第一国际后期的主要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同这个宗派集

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写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论权威》等著作，深刻地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关于放弃政治的错误论点，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危害，论述了加强集中和权威的重要性，从而使党的组织原则的思想更加丰富。1872年在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恩格斯作了关于巴枯宁集团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①根据恩格斯的调查报告，大会决定把巴枯宁分子开除出国际。

第一国际期间，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他们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它却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在高度评价巴黎公社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全面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后来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特别指出：公社采取的一切职位由选举产生出来的人担任并随时可以撤换，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可靠的办法。^②

二、在欧美一些国家帮助建立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相继进入了建立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时代。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成立，1875年它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6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

年，美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劳工党。1879年，法国成立了工人政党。此外，英国、丹麦、瑞士、墨西哥、意大利、俄国等近二十几个国家都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

这些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本国的斗争为主要的政治舞台；二是开始了公开、合法的议会斗争。这种新的斗争特点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主要是：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制定一个革命纲领；如何在合法斗争环境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各国党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

首先，他们非常重视各国党的纲领的制定。巴黎公社失败后，德国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为了推动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两派实行合并是必要的，但必须制定一个共同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革命纲领。然而，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没有接受劝告，他们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竟然同意把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写进党的纲领草案。马克思、恩格斯看见这个纲领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①。恩格斯首先写信给倍倍尔，指出了纲领草案的主要错误。不久，马克思抱病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哥达纲领批判》）通过对纲领草案的逐段批注，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同时强调了党的纲领的重要性。后来当法国工人党成立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参加了党纲草案的讨论，而且马克思还亲自口授了党纲的导言部分。

其次，他们十分关心各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这些年代里，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冒牌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猛

烈攻击。特别是德国党内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和“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帮助各国党的领导人及时识别这些错误思潮，而且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写成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大量的书信，为保持党的纯洁性作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建党理论。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党的学说的丰富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只是建党实践的初步总结。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阐述的党的学说原理。

一、提出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

无产阶级要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就提出并一直坚持的立场。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这要根据不同的形势和任务来确定。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①同时，由于当时各国工人运动规模比较小，斗争策略和组织工作比较容易统一，建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国际范围的政党是可能的。这种国际性的政党，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和教育各国无产阶级，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后来因各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而且发展不平衡，这种政党组织形式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显得不适应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

1865年，恩格斯在《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要在德国建立工人政党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于1869年宣告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它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很大的启发。1870年8月，当巴黎工人阶级积极行动起来的时候，恩格斯看到法国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感到十分忧虑。他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说：“最糟糕的是，巴黎一旦发生真正的革命运动，由谁来领导呢？”^①到了1871年2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②。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1871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并把有关内容写入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4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阶级。”^①从此，开辟了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时期。

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恩格斯在谈到国际解散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时指出：“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②。“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国工人组织的单独存在，比它们形式上参加国际性的团体更为重要。1876年11月恩格斯写信给贝克尔，表示了他和马克思共同的意见，即国际的全体积极活动家，应致力于在各国建立和巩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而不是恢复以前的国际组织。这就是说，国际工人协会这种组织形式，也不能适应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而必须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政党，才能有效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列宁在评价第一国际贡献时也指出：“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所以提出建立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因为：第一，当各国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靠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指导各国的斗争是很困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都建立工人政党；第二，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证明，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不能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以后，德国工人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证明了在每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更有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0页。

④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417页。

于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一思想，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

二、强调了坚持党的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阐明，共产党是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后来他们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党的过程中，进一步坚持了这个思想，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捍卫党的科学世界观。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为党的理论基础，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条件。因此，这“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②。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必须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

当时，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打着“革新科学”的旗号，拼凑了一套所谓“终极真理”体系，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杜林体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连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也上当受骗，竟然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吹捧杜林的文章。到 1875 年初，杜林主义对党的影响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一形势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全力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党的科学世界观。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一书，第一次从总体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恩格斯在 1885 年版的序言中说：“消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9—4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406 页。

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①

1878年10月，德国帝国国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党的合法活动遭到禁止。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抬头，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1879年9月初，以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说什么社会民主党由于捍卫巴黎公社而激起了资产者的仇恨，由于“不够温和”而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文章建议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和斗争目的，只要求政府进行一些改良，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声称必须吸收大量资产阶级分子，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德国党领导人的《通告信》中，坚决揭露了“三人团”妄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的企图，论述了坚持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性。他们在谈到吸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党的问题时指出，这些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而且首先“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②。

同时，坚持党的科学世界观，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切不可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

三、阐明了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

党的纲领，规定了党为之奋斗的最近任务和最终目的。它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85页。

现党的性质，决定党的发展方向，是凝聚全党、动员群众的一面旗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党的纲领问题。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国际起草的《成立宣言》，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坚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原则，但是，为了照顾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使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派别能参加到国际中来，在不损害革命原则的前提下作了一些让步，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①。

在进入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时期，各国党如何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党的纲领，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② 党的纲领的作用，一是让外界来了解党，认识党，从而决定对党的态度；二是通过纲领团结自己的队伍。如果一个党没有一个正式纲领，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就无法号召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目标而斗争。因此，“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③ 这就是说，党的纲领是衡量一个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党的纲领如此重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25—32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9页。

各国党的纲领的制定。他们一旦发现某个党的纲领有错误，就会坚决予以批评纠正。他们一再强调，在党的纲领问题上，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例如，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党的情况时说，可能派由于抛弃了党的纲领，因而他们就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党。以盖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虽然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坚持了革命纲领，因而党的力量是大的。“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①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证了党纲的重要性，而且阐明了制定党纲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必须坚持把党的最终目的和当前斗争任务结合起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制定出来的纲领才是“明确的积极的纲领”。党的纲领制定之后，必须付诸实践。否则，就会变成一纸空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确定了纲领之后，党的任务就是组织全党实现党的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②

四、论证了集中和纪律的重要作用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为了克服旧组织独裁密谋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党的组织原则时，更多地强调了民主。第一国际时期以及后来在帮助欧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时，马克思、恩格斯同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斗争，又强调了集中和纪律，从而使党的组织原则更加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宗派主义的特点及其危害，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96页。

“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① 宗派的存在，是由于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能够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的时候，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宗派主义运动要谋取的是狭隘的小集团的利益。“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变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因此，在工人运动中和无产阶级政党内不允许有宗派组织存在。

针对巴枯宁反对权威、主张自治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论证了权威和集中的必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无政府主义反映了小私有者力图保持所谓个人自由而排斥集中管理的大生产的观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从个体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必须加强集中化，加强权威的作用，必须协调多数人的行动。并说明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他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战斗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更不能没有权威和集中。巴枯宁分子主张每个党员、每个支部的“自治权”，不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甚至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可以不服从。恩格斯指出：“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1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2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6页。

这就是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权威和集中，没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服从，不仅会使党缺乏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甚至根本就不能存在下去。因此他说：“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权威和集中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党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认为没有党的纪律，没有集中，党就没有斗争的武器。马克思针对无政府主义对党的危害，特别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② 遵守党的纪律，就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全体成员都必须遵守。对于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的成员，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把他开除出党。

五、阐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各国党内斗争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即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1882年10月20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③ 他针对德国党内有些人厌烦斗争而追求无原则团结的思想倾向，又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1页。

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①。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认为，首先，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②。其次，是由于资产阶级实行收买政策，而无产阶级队伍内部出现了“工人贵族”，这是引起党内斗争的社会阶级根源。恩格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就作出资产阶级在“利用目前的繁荣或半繁荣，收买无产阶级”的论断。后来，他进一步考察了英国工联的蜕化过程，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③ 1869 年 7 月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规律显然是，到处都有一部分工人领袖必然要蜕化”^④。此外，“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⑤。这些人加入党内，很容易把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恶习带进党内来，侵蚀党的肌体。恩格斯就德国党的情况曾经指出：“德国党内的争吵，并没有使我惊讶。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⑥。因此，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1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5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33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740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25 页。

性质，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恶习作斗争。

要正确处理党内斗争和党的团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团结固然重要，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那就是不能以牺牲“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为原则。所以，对于各种背离党的原则的错误行为，就要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是巩固党的团结的重要途径。恩格斯指出：“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①特别是对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坚决进行揭露。恩格斯 1879 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党内“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②法国工人党在 1882 年的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恩格斯认为，这种分裂可以使问题明朗，摆脱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两个“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了。这是一件好事”。当然，这并不是赞成任何一种分裂。只有当党内争论涉及原则问题，只有实行分裂才能坚持原则，而且分裂的时机对党有利，分裂才是可取的。恩格斯结合德国党内斗争的情况，指出：“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

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首先，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做法。他们认为，对那些机会主义者、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2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9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58 页。

们孤立起来，直至开除出党；而对犯错误的同志，则要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其次，要正确地开展批评。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原则性问题一定要进行批评斗争，非原则性问题不要纠缠。在党内斗争中一般应采取自由辩论的方法，不采取简单把人“驱逐出党”的做法。

第三节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党的 建设理论的贡献

1883年3月1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了。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负起了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

19世纪80—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斗争加剧，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在积聚力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得到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1889年7月成立了新的国际，即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内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增长了。

恩格斯在他晚年，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关心和支持（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撰写序言；他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热情关怀欧美一些工人政党的发展，向它们提出建议和意见，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恩格斯晚年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新贡献，主要是：

一、提出要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迫切要求建立独立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当时美国的工人组织还处于分裂状态。其中，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唯一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但是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德国移民。这个党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和其他一些书信中，批评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针对这个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德国移民，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担负起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使命，“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①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针对美国工人党的这种错误，恩格斯特别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②“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他还说，英国和美国党，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活的理论，“而只是把理论当做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像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④，所以党只能成为一个宗派。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还强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93—94页。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意义，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他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论庸俗化，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② 恩格斯强调要把正确的原理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③ 他 1884 年 2 月 4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批评杰维尔那种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的错误做法，指出那些原理如果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就会是不正确的了。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思想。

二、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条件及其成长的道路

1890 年 2 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经历了 12 年的“非常法”迫害之后，在选举中获得很大的胜利，成为国会中最大的政党之一。这次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已宣告“非常法”的破产（虽然它在形式上有效），标志着俾斯麦时代的结束，3 月俾斯麦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向该党提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查斗争的策略问题。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持有“左”倾立场的青年派无视客观形势的变化，否认利用议会活动、进行合法斗争的重要性，指责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并且把冒险主义的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742—74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69 页。

略强加于党。他们还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文章，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写给该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深刻地批判了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指出这种忽视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

恩格斯在批评青年派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提出了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条件。他说：“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②这就是说，党的领导干部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而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青年派的主要弱点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此恩格斯希望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彻底的批判性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证书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③这指明了党的领导干部成长的道路。

三、提出要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防止党的蜕化

在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德国党把合法斗争方式提到首位。在斗争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

泛滥起来了。他们把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说成是“新路线”的开始，幻想像德国那样反动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①，鼓吹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以改良代替革命。恩格斯在理论上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但认为这必须有特定的条件。为了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泛滥而导致党的蜕化，90年代初，恩格斯一连做了几件事：一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二是重新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写了序言；三是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恩格斯着重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揭露了机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为了防止党蜕变的危险出现，恩格斯认为，必须开展正常的党内原则性讨论。他说：“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②这就是说在党的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由辩论。恩格斯认为，这是提高全党思想水平，溶化涌入党内新成分，“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好办法。

四、提出正确处理各国党之间关系的准则

随着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纷纷建立，如何正确处理各国党之间的关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工人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0页。

动能否健康发展。

恩格斯提出，各国党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他说，“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①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各国革命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因此，它要求各国工人政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在内部事务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恩格斯认为，一个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客观作用，而不取决于某些党的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某些党在某一时期，可能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但这个党绝不能代替其他政党的作用，更不能强迫别国的工人政党跟着自己走。1893年6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批评法国党在一份声明中提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起领导作用的主张是不妥当的，认为这会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受到破坏。1894年1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再次批评了法国党的这种错误做法，指出“任何一次国际行动，都必须就其实质和形式事先进行协商。我认为，如果某一个国家公开提出倡议，然后要别的国家跟着它走，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法国先生们有时在礼节问题上是非常苛求的，他们本身应该遵守民主形式。”“事先不同别人商量就独自公开提出倡议，这样就把事情搞坏了。内部的政治条件，特别是每个国家议会现有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做法，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绝对行不通甚至是有害的。”^②因此，各国党对有关国际事务应当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来解决，反对有领导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5—186页。

恩格斯虽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他对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提出了总的原则。这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①他还针对德国党说，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它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恩格斯提出的以上这些原则，对后来各国党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章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发展、壮大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法，从而创立了完整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同俄国建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俄国建党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及学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到帝国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时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革命已经成为直接的现实，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一、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说：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如果没有这种理论，它就要创造出这种理论，为其政治斗争服务。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不是偶然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从经济上看，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已经掌握和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从政治上看，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仅加紧对本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而且对外进行疯狂的殖民地掠夺，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这种情况表明了帝国主义阶段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革命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世界历史已由巴黎公社开始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跨进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时期。

俄国自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度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就基本上完成了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可是，俄国帝国主义除了具有一般的帝国主义特征外，还有由于它的特殊的经济和历史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独特的社会形态——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同农奴制残余相结合；政治上的封建君主同金融垄断资本家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并由这个联盟掌握着国家政权，使沙皇俄国变成了“民族的牢狱”。俄国广大人民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俄国社会矛盾也由此而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又由于俄国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与此同时，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日趋激化。据统计，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民族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革命形势似干柴烈火，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现实，世界革命中心也由德国转向了俄国。革命形势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于是，俄国便成了列宁主义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发源地。

二、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成果

列宁认为，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又要研究和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党的经验教训。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主要继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列宁坚信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正确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是指引俄国建党的唯一正确理论，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列宁还特别重视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后期各国党的经验教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引下创建起来的，德国党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俄国建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了具体分析，他指出：“按其组织性、按运动的严整性和团结、按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数量浩瀚和内容丰富等方面来说，都是走在各国党的前面的。”^① 尽管他们曾一度犯过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她仍然是一个最优秀的党，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向德国人学习一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第 324 页。

切宝贵的东西。但从 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便泛滥起来，导致了第二国际各党变成改良的党、和平的党、议会的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真实地反映了列宁建党时所面临的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①第二国际各党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堕落到机会主义的泥潭。这就为列宁建党提出了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严峻任务。于是列宁“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列宁对第二国际各党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第二国际各党追随机会主义者，一味地迷恋于议会，迷恋于和平，迷恋于改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党，根本不能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要求的。因此，必须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清除他们的影响才能在俄国建立一个同第二国际各国党不同的新的党，革命的党，战斗的党。列宁在他有生之年，不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而且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学说。

三、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升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理论的渊源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②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列宁，深谙革命者脱离实践和群众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其自身价值也无法实现。列宁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踏上了革命征程，积极地投入到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农民。

^①《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71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7 页。

1888 年秋，在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同先进的工人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列宁完全被马克思的书迷住了，在马克思的书中找到了解决俄国革命的“答案”，列宁兴奋地说，马克思的学说给他打开了“新眼界”。他深信，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才能作为革命的旗帜。由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团结了许多工人群众。1889 年列宁来到了民粹主义的堡垒萨马拉，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同民粹派展开了斗争。为了从理论上粉碎民粹主义，于 1894 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系统地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和纲领，彻底揭露了他们冒充“人民之友”的假面貌，阐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规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1899 年，列宁又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此，完成了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清除了一个主要的思想障碍。1895 年，列宁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上，为建党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列宁积极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亲自到工人小组宣读和解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把彼得堡的近 20 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为统一的政治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初步实现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任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实质上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下，全国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工人组织，列宁及时地总结了这些斗争经验。

列宁还特别重视总结“劳动解放社”的经验教训。“劳动解放社”是普列汉诺夫 1883 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1884年和1887年先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这是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实际步骤。

由于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共同努力，1898年3月，各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或马克思主义小组集中在一起，于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

从列宁实际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和从事革命理论宣传、组织群众及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得以从实践经验达到理论的升华，形成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事实，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形成的前提、基础和列宁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和直接参加建党实践的密切关系。

第二节《怎么办？》一书奠定了新型 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怎么办？》是列宁批判经济主义的总清算和终结，它标志着反对经济主义的最后胜利，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党内经济主义的出现及其特点

经济派大约于1897年初发端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内部的一些持有单纯经济观点的人，趁列宁等一批革命家被捕，党内混乱之机，掌握了斗争协会的领导权。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因多数会员都倒向了经济派，“劳动解放社”不得不退出联合会，从而使经济派在党内占了优势。

经济派在党的一大后，利用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的状况，于1899年公然抛出一个纲领性文件——“克列多”（即纲领、信

条)，散布一系列单纯经济观点。其核心是“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称这条路线在俄国就是经济斗争，用“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来代替“夺取政权的意图”；宣扬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不适合”于俄国了，因此必须加以修正。他们以国内《工人思想报》和国外出版的《工人事业》杂志为阵地，在反对“思想僵化”、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批评自由”的幌子掩护下，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政治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否定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否定在俄国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在俄国党内产生经济主义并不是偶然的，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的历史特点相联系着的。首先，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反对民意党人把政治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的少数人的阴谋活动时，往往不自觉地走向了反对政治斗争的另一个极端。其次，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人小组和广大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中没有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初期，在工人小组中，接触了工人阶级最下层和不开展的落后部分，为了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适应当时的觉悟水平，往往把眼前的利益放在首位，暂时不宣传争取政治自由的政治目标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再次，当时，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和团体分散在全国各地，组织之间缺乏联系，特别是缺乏同国外那些理论上坚定的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革命家的联系，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最后，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很快发展起来了。

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直接动摇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基础，成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因此，批判经济主义，同经济派划清界限，便成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迫切任务。

二、《怎么办？》一书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怎么办？》是一部系统批判经济主义，阐述理论作用的论战性著作

第一，《怎么办？》一书是反对国际国内机会主义思潮的必然产物。

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写于 1901 年秋至 1902 年 2 月。1902 年 3 月，在德国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

《怎么办？》一书，是列宁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进行系统批判的论战性著作，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899 年伯恩斯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立即博得了各国资产阶级的喝彩，也得到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响应，并形成了一种国际思潮。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由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都成了一家兄弟，彼此称赞，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党内的经济派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翻版，因此，反对国内的经济主义同反对国际上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为了反对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必须首先从反对和清算国内的经济主义开始。列宁认为，在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顽强得多，同经济主义的对立是根本的对立，全局性的对立。事实说明，经济主义者的观点体系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由于他们迷恋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已经变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中的右翼了。所以，列宁说：“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

切根本之点 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

第二，《怎么办？》一书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基础上的客观需要。

列宁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党正处在“理论混乱的时代”。伯恩施坦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从根基上抽掉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达到他们把党变成改良的党、议会的党和和平的党的目的。就当时俄国党内实际情况看，一部分人“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② 另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③ 轻视理论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摆在党的面前一项急迫的任务。为达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的目的，首先必须搬掉反马克思主义这块绊脚石。所以列宁强调，必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必须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这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把革命理论作用提到首位，系统地阐述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

第三，《怎么办》一书是对 1901 年和 1902 年《火星报》的策略和《火星报》的组织政策的总结。

1900 年 12 月，列宁在莱比锡创刊出版的《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列宁不仅是该报的主要领导者，而且为该刊写了许多文章。《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重大作用。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强调指出，俄国工人政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2—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2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23 页。

制度，争取政治自由。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觉的斗争，必须有自己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严密的政党。“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 这之后，1901年5月，列宁在《火星报》发表了《从何着手》，1901年12月，发表了《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等重要文章，不仅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而且，针锋相对地对经济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怎么办？》一书，实际上是对经济主义的总清算、总批判，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扫清了思想障碍。正如列宁于1907年9月，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所说：“《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怎么办？》一书是1901年和1902年火星派的策略、火星派的组织政策的总结。确切地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总结’”。^②

（二）《怎么办》一书中阐述的党的学说的基本思想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教育和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第一，揭露机会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列宁揭露了经济派否定革命理论作用、崇拜自发性行为。列宁指出，“批评自由”和“反对教条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者惯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和口号，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是在这种时髦的口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93、94页。

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①说到底，“批评自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其目的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伯恩斯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②

列宁指出，经济派是国际机会主义在俄国的翻版，其所犯的错误是全面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在策略上都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根本上否定理论的重要作用。他们错误地认为，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社会民主党只需尾随自发工人运动之后，记录工人的自发斗争就可以了。公然宣称：“我们工人不需要什么马克思、恩格斯。”^③贬低政治斗争的作用，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使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武装。列宁嘲笑他们是“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的人”^④。（“后背”即借用圣经中的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主义特征。编者按）

列宁论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

（1）阐述了革命理论是工人运动的指南。列宁成功地解决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8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6页。

转引自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3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2页。

了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与经济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意识到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原理。列宁认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当科学社会主义一旦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成为自觉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

(2) 阐述了只有以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自发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是工人运动中的觉悟成分。党不能像经济派那样只满足于尾巴主义的地位，而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性，起先锋队的作用。列宁说：“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②因此，列宁反复强调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早在1899年10月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就指出这一点：“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③1902年8月，在《革命冒险主义》一文中，列宁在批判否定理论作用的错误倾向时指出：“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④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使自己的全部活动建立在自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3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86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7页。

党的基础之上。

(3) 重申并阐述了理论斗争是社会民主党从事伟大革命斗争不可缺少的形式。列宁援引恩格斯一段话说明理论的重要意义。“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①“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②这就告诉我们，理论斗争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一样重要，是一条不可缺少的战线，在实践中必须把三者有机地配合起来，才能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斗争。

(4) 阐述了革命理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意义。其一，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刚刚形成起来，刚刚确立自己的面貌，对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的错误思想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然而，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派别又显得活跃起来，对于社会民主党清算其他派别的错误思想来说是雪上加霜。因此，能否清算机会主义派别与思潮的关键寄托在用革命理论武装全党上，这是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前途的问题。其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国际性的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才能顺利地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4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5页。

的政治经验 以及革命经验)”^① 其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为了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有革命理论为指导，列宁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② 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二，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列宁在分析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后说，经济派崇拜自发性，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他们责难社会民主党“轻视自发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只要社会民主党尾随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后面就可以了。列宁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1) 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产生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之中，只有在深湛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被创造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这种理论创造。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3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4页。

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工人不能参加这一理论的创造工作；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与工人运动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创造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

(2) 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既然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从外面把这种意识灌输进去，来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自觉的性质。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②还说：“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③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而不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地位、作用及其历史使命，使之自觉地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怎样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呢？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④履行自己的职责。

(3) 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必然产生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灌输进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要把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9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6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6页。

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它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无产阶级具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内因和基础，因而无产阶级容易领会和接受这一理论。但是，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思想体系，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可见，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①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② 它时时刻刻地侵蚀着无产阶级。因此，必须自觉地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要不断地强化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③ 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反对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武装工人阶级，把工人运动引导到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

第三，批判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谬论，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列宁指出，经济派“不仅对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组织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0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页。

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① 他们极力赞美当时盛行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诬蔑革命家组织是“民意主义”、“违背民主原则”、“反民主倾向”，企图把党拉向后退。他们要求的仅仅是罢工基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工人自发组织。这样，就把党组织降低为经济斗争服务的“执行组”，充当了工人自发经济斗争的“记录员”，妄图把先锋队的党组织变成工人运动的尾巴，进而达到取消党的目的。列宁认为：“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② “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③

(1) 建立革命家组织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一项迫切任务。列宁反复地强调：“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④ 把“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⑤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9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9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0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1—112页。

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①“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

(2) 革命家组织要由一批有经验的政治领袖为核心。我们所说的“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③这些职业革命家应是群众的政治领袖，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列宁说：“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④俄国社会民主党所以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⑤这是列宁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注意选拔、培养党的政治领袖的原因所在。党有了一批成熟的领袖，革命事业才能不断地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3) 革命家组织的活动要保持高度的集中性和秘密性。有了革命家组织，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是否就可以获得胜利了呢？不是的，还要根据具体形势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要遵循一定的活动规律。由于在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就更需要注意活动方式，在高度集中和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活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116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6页。

动。“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①事实很明显，“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②经济派提出实行所谓“广泛民主原则”，在沙皇的黑暗统治下是根本做不到的。他认为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③列宁指出，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弱点恰恰是不善于做秘密工作。沙皇警察往往利用一两期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能把秘密的党组织破坏掉。所以，列宁反复告诫社会民主党人，一定要学会做秘密工作，提高活动技巧。“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④

为了使党的工作保持秘密性，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态。列宁强调把秘密的职能集中在少数职业革命家手中，加强职业革命家的作用。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削弱地方活动和群众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⑤可见，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秘密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⑥

(4) 出版全俄政治报纸是组织建党的重要实际步骤。列宁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9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3—114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7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9页。

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9页。

认为，办全俄政治报是确保组织不混乱的重要手段。可是迄今为止俄国还“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这对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达到确保组织统一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办报本身也是一种组织工作，一旦办成全俄政治报，那么，在这个报纸周围，由办报纸的工作人员自然地形成了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①由此可见，办全俄政治报是消除组织涣散、建立严密的党组织的绝好的办法。

（三）《怎么办？》一书的历史地位

《怎么办？》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教育和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第一，《怎么办？》一书结束了思想分歧，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

1897年经济主义从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发端以来，列宁就意识到经济主义对革命的破坏和危害，它会把无产阶级引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轨道。因此，列宁把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放在重要位置。列宁及其战友经过3年的坚持不懈地斗争，以《怎么办？》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终于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思潮。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指出：“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②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又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永远是最直的。”^③经济派的主要刊物《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杂志在1902年也相继停刊。这场斗争的胜利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8页。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84页。

^③《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99—100页。

利，使全党在思想上得到了统一，为建立统一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怎么办？》一书是对经济主义批判的一个“终结”。

第二，《怎么办？》一书结束了组织上的混乱，为建立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党内不仅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且在组织上的混乱也是相当严重的。经济派极力赞美当时盛行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反对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列宁把它看做是当前运动的“真正病症”，因此，他把建立职业革命家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他说：“《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 1901 年和 1902 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 1903 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①有了这个组织，党才能实现高度的团结、巩固和稳定。否则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同时，这个革命家组织要同工人阶级群众相结合。我们必须懂得：“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最有组织能力。没有这一条件，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儿戏，就是冒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再三强调：它所主张建立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地起来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②列宁同经济派在组织方面的斗争为 1903 年党的二大建立实际的真正的党做了组织准备。

第三，《怎么办？》一书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党学理论宝库增添了新鲜内容。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全面论证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对建立新型政党的必要性、性质、作用、理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6 卷，第 94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6 卷，第 96 页。

论以及它活动的基本原则都有深刻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党理论，其中主要的有：

(1) 首次提出了“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的光辉思想。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俄国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轻视理论作用；党内理论水平有所下降；以及党内少数人热衷于实际运动等事实，把理论的作用提到了首位。提出了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理论党就不可能起先进战士的作用的英明论断。从而使党建立在牢固的革命理论基础之上。

(2) 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的光辉思想。列宁认为，经济派的错误观点同 19 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现的工联主义者一样，鼓吹阶级合作，反对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把斗争仅仅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列宁在同经济主义者的斗争中指出，经济斗争是社会民主党政治活动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认为，决不能因为搞经济斗争而忘记了政治斗争，如果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忘掉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

(3) 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革命家组织是革命获得胜利的组织保证的光辉思想。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当时党内的状况后认为，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中统一的革命家组织，这是把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所在。只有加强组织建设，才能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组织混乱现象。工人运动只有在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自发性和工联主义，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列宁在这本书中所阐述的建立革命家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加强组织建设提

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怎么办》一书发表至今已有 90 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书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观点仍然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当今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设，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和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第三节 《进一步，退两步》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

《进一步，退两步》是列宁的一部名著，与《怎么办？》一书是姐妹篇。如果说，《怎么办？》一书主要是解决思想上建党的问题，那么，《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则主要是解决组织上建党的问题。

一、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党内斗争

二大于 19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2 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 13 次会。之后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举行，又接着开了 24 次会，总共开了 37 次会。列入日程的共有 20 个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通过党纲、党的组织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26 个组织，43 名代表，共有 51 票表决权（其中 8 个代表有 2 票），另外，有 14 个代表有发言权。

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建党的组织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粉碎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

织原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结束了，可是党内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二大后，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斗争更加激烈，马尔托夫等人继续进行分裂和破坏党的活动，“企图回避问题的实质，企图隐瞒党内的舆论和党的决定，企图歪曲概念和事实”^①。普列汉诺夫被马尔托夫等人的叫嚣吓破了胆，倒向了马尔托夫一边，形势非常危机。列宁说：“混乱状态日益加剧，新的冲突不断发生，党的各方面的正常工作都被挤掉了。”“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对这种状况，如果再默不作声，那简直是犯罪。为了说明两派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揭露马尔托夫等人的机会主义错误，给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党员提供合理地、果断地解决党内争论问题的材料，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这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实质上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斗争的生动记录，是二大会议的再现，也是对二大和二大后党内斗争的科学总结。

二、《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发表的历史条件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于 1904 年 1—5 月写成，同年 5 月发表于日内瓦。列宁所以要写这部著作，是同当时的历史环境相联系的，是党内斗争的客观需要。

第一，《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为了澄清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歪曲党内斗争真相、欺骗舆论的嘴脸而写的。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代表大会结束后，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息，相反，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派，竭力破坏二大通过

^①《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99 页。

决议，公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方面，歪曲和掩盖同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把列宁在二大上获得的胜利说成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他们提出无理要求，要在《火星报》编辑部中占多数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同布尔什维克人数相等。当这些无理要求被布尔什维克断然拒绝后，马尔托夫等人就暗中搞派别活动，捏造谎言，蛊惑人心，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列宁，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列宁说：“马尔托夫派用来欺骗党（由于神经失常，他们可能、甚至很可能首先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主要伎俩，第一是歪曲火星派内部分歧的真正根源和原因，第二是歪曲关于小组习气和组织瓦解、关于宗派主义和党性等等这些概念。”^①“特别使我感到气愤的，就是他们所固有的欺骗和虚伪，就是企图回避问题的实质，企图隐瞒党内的舆论和党的决定，企图歪曲概念和事实。……有些同志对这种虚伪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只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要使他们了解情况，就应该大力进行解释，所以我一直打算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把全部问题详细地（必要时利用一切文件）加以解释。”^②所以列宁打算只要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一公布，就开始写《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以便让广大党员群众了解党内分歧的真实情况，认清斗争的意义，对党内斗争做出独立的判断。

第二，《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为了集中呈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一阶段的斗争情景。要想澄清党内斗争的事实，这就必须回顾二大会议上斗争的情景，再现二大斗争的全过程。二大一开始两派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这种矛盾和斗争则集中表现在二大会议中所发生的每个重大事件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充分运用代表大会上的一切文件和记录，因为这些材料可以“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9页。

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①为了使全党了解两派的形成、发展和斗争的情况，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用图表分析了两派斗争的全过程。后来，列宁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进一步，退两步》“叙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段。”^②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之间斗争的生动的历史记录。

第三，《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克服组织涣散，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物。由于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拒绝执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使党组织陷于严重的混乱之中。而且“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党的各方面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的妨碍。……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组织纪律已经彻底松弛，党的严密的统一行动已经成为幻想。”^③可见，孟什维克已经把党弄到十分危险的地步，说服、教育甚至让步已无济于事，只有斗争才是党的唯一出路。列宁认为：“我们要敢于承认党已经不存在，我们要重起炉灶，从头做起，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党。……建立一个真正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党，建立一个拥有真正的党的机关的，而不是只挂几块虚假的招牌的党。”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当务之急。可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实质是在俄国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00—10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0、1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12—113页。

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党的问题。《进一步，退两步》这部著作的问世，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危机中看到了光明，为在组织上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阐述的党的学说的主要思想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划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意义，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领导干部学习这部著作时，一般地说来，把第九、第十七、十八章作为重点。这里，我们以第九章为中心，适当地联系有关章节的重要理论，做一简要的介绍。

第一，党章第一条条文分歧的实质是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的问题。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章时，列宁同马尔托夫发生了分歧。列宁提出党章第一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则提出：“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两个条文的分歧在于党员是否参加党的组织问题。列宁坚持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只有这样党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党员才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组织也便于监督检查自己的党员。此问题的关键，“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①。

在二大会议上，讨论党章第一条条文时，代表们都非常关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4页。

心，情绪高昂，争论的也最激烈，可以说，是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少有的现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列宁认为，对这个“原则问题”的争论应辩证地来认识，就是说，虽然党章第一条条文是“原则问题”，但它不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①也不会使党分裂。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从二大和二大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党章第一条条文的分歧，确实是“原则问题”。因为党章第一条条文的分歧是马尔托夫少数派走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转折点；因为党章第一条条文的分歧奠定了马尔托夫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中派结成的反动联盟的开端；因为党章第一条表决时，所有机会主义分子都支持马尔托夫以 28 票对 22 票（1 票弃权）通过，使党又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因为二大后期，党内分裂进一步恶化，使党又退到了小组时代、涣散时代和手工业时代。马尔托夫从党章第一条错误开始到二大后的分裂党的活动为止，已完全堕落成机会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性质的错误，是“原则问题”了。

上面，我们分析了列宁同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条文上的分歧的重大意义、斗争过程以及后果。那么，从理论上来看，在党章第一条条文上的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列宁认为，集中到一点，是在俄国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的问题。如果按照马尔托夫党章第一条条文来建党，那么这个党必然是一个组织涣散、没有

^①《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48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48 页。

定形、成分复杂的党，这样的党是不能适应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只有按照列宁条文建设党，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成为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党章第一条条文争论的焦点是建立一个战斗的革命党的问题，还是建立一个改良的机会主义党的问题。

第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有组织的整体。

马尔托夫等少数派错误地认为，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统一的整体，而是由一些自称为党员组成的简单的总和，因此，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只要同情党就可以成为党员了。阿克雪里罗得在大会发言中积极地为马尔托夫这一观点辩护，诬蔑列宁混淆了党与组织的界限。

列宁针对马尔托夫等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① 斯大林认为，这是列宁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就是说，党首先应当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党必须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纪律和统一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每个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领导下工作。只有这样，党组织才能对党员进行检查和监督，因此，参加组织应是一个党员最起码的条件。也是“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② 如果按照马尔托夫的条文去建党，势必“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③ 可见，党与非党本身就应有明确的界限，而阿克雪里罗得的没有组织的界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2页。

的党该有多么荒谬！列宁还批驳了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党”，“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的观点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至于所谓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大学教授、中学生或工人，只要声明一下，就成为党员等更是十足的痴人说梦。

由此可见，列宁同马尔托夫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①的争论。

第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

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组织还是一般的阶级组织，党同阶级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上，列宁同马尔托夫也存在着严重分歧。马尔托夫等人否定党的先进性，混淆党同一般阶级组织之间的界限的一派胡言，居然得到阿克雪里罗得的支持，狡辩道：“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够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都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马尔托夫等人主张把党员称号散布的越广越好，如果每一个罢工者、示威者、对党的同情者自作主张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表示高兴。

列宁批驳了马尔托夫等人“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②观点，列宁认为，毋庸讳言党同阶级有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其联系在于党以无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其区别在于党是阶级中的先进部分。这种把党同阶级混淆的论调，是经济派一大特点，同样是错误的。“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4页。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5页。

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① 总之，党同阶级相比，党无论是在觉悟程度方面，还是在积极程度方面都比阶级要高得多。同时，要把先进部队同倾向于党的阶级群众加以区别；把加入党的分子与靠近党的分子加以区别；把先进的党员同帮助党的人加以区别。那种抹杀这些原则界限的人，就是把党降低到一般工人运动的水平，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进而否定党的先锋队性质。“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② 所以，其实质完全是为组织涣散作辩护。

第四，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本阶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由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那么党同群众、同本阶级是什么关系呢？马尔托夫为了污损列宁，谎称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为限”，把大批人“抛在党的大门之外”，以脱离群众的阴谋集团代替党组织。马尔托夫对列宁的诽谤，立即赢得了经济派分子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之流的喝彩和随声附合。列宁批驳道，党不是狭小的密谋组织，而是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群众性的党，我们要把密谋组织同党的秘密组织区别开来。党的秘密组织同民意党人的靠少数人进行秘密行刺是根本不相容的。建立秘密的党组织是同当时的革命形势相联系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党的力量还十分薄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就必须处于秘密状态，因此把中央领导权集中在少数职业革命家手中，不等同于群众断绝联系，更不是与少数人的密谋组织同日而语。

列宁认为，即便在革命险恶的形势下保持党组织的秘密，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61页。

不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了联系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是由两部分所组成，除了职业革命家外，还有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及为数众多的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党员群众。列宁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就曾指出：“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①况且这些少数革命家也并不是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圈子里，他们也要采取各种办法接触群众，保持与群众的沟通和联系。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必须首先得到本阶级群众的支持。列宁以 19 世纪的阿列克谢耶夫、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等卓越的活动家小组为例，他们所以能够胜任当时的政治任务，是因为他们热烈的宣传能够唤起群众的响应，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群众的支持。可见，“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②“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第五，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组织的领导者。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特别是同工会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马尔托夫等人同列宁的看法也是根本对立的。马尔托夫抹杀党与工会的界限，把党同工会相提并论，否定党的性质与领导作用。

列宁一向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斗争，领导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7—258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8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7 页。

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① 工会不是中立的，更不能独立，它应当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在二大讨论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指出：“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② 在实际工作中，“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③ 后来，列宁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党是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问题。斯大林在评论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时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要贡献之一。

第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

马尔托夫等人用“自治制”来对抗列宁的“集中制原则”，他们宣称党是各个自治委员会的总和，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对整体应该有自治权。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们攻击集中制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说集中制把党变成由中央委员会充当厂长的“大工厂”，把党员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说少数服从多数是“硬性压制党员的意志”，把维护党的纪律说成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等等。

列宁指出，集中制思想是《火星报》建党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具有原则意义的思想。有了集中制党才能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列宁反复强调了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序言中、在第九章和第十七章等部分中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认为集中制思想是唯一原则性思想，应当贯穿在党章的始终。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9 页。

列宁不仅说明了集中制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实现集中制必须坚持的原则。为了把集中制原则贯穿到党的建设实践中去，在批判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自治制和他们对集中制歪曲的言论时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①集中制的实现需要有许多条件。“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②

列宁指出，集中制原则必须体现在党的组织章程中。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且还要有一个体现这个纲领的党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建党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章，他为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一个好的党章，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认为，党必须重视自己的章程，因为“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③制定一个好的章程对统一全党的组织和思想，保证党的集中化有重要作用。若没有党章，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列宁在批判马尔托夫时说：“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96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87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64页。

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列宁不仅重视党的组织章程的制定，而且还模范地遵守党的章程。例如，在二大表决党章时，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的条文，这个条文尽管是个错误的，但列宁还是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服从了代表大会的决定。

第七，论述了组织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意义。

组织对于无产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进一步，退两步》全书。

列宁把组织同夺取无产阶级政权联系起来，把组织的作用提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他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个武器。”^②事实证明，为了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重要条件是无产阶级要依靠组织的力量，只有依靠组织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只有依靠组织才能团结全体劳动人民，才能产生无穷的力量去战胜各种困难，去夺取政权，这已被历史所证明。

列宁从组织的物质统一同思想一致的辩证关系中阐述了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③没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思想统一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只有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使各种不同思想按照组织的要求，纳入到无产阶级的思想轨道，这样的团结统一才是党和阶级的真正统一。

列宁认为，组织是团结千百万劳动者的纽带。组织可以把分散的劳动者组成一支大军，只有组织起来的大军才能摧毁俄国专制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正如列宁所说：“这个组织把千百万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92—3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5页。

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① 不管前进道路上有什么曲折和倒退，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空话，不管人们如何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三、《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历史地位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发表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发表，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引起国内反对派孟什维克的惊恐和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摒弃这本书，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中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们的印刷和发行。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致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即《现在不能沉默》）文中指责列宁是“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则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公开为党内无政府主义现象辩护，并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诽谤。尽管如此，这部著作在地方委员会党员和先进工人中间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受到了热烈拥护。莫斯科、彼得堡、基辅、里加等十几个城市，警察在逮捕和搜查时，都发现了《进一步，退两步》这本书。大多数地方委员会都很喜欢这本书。彼得堡委员会在专门的决议中声明赞同《进一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5页。

步，退两步》中所阐述的观点。在党的干部中也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个党的工作者给列宁写信说道：“我读了您的小册子……要是事实和逻辑能说服人的话，那您的这本小册子就一定能说服很多人……但愿有更多的人能读到这本书，特别是在俄国。”

在国际上，除支持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所阐述的观点外，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党内到处都流传着反对列宁的集中制，拥护自治制，企图削弱党的组织纪律的倾向。他们站在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参加德国党活动的俄侨帕尔乌斯（1869—1924年），在1903年末就公开说，俄国党的任务就是跟“集中制”的极端作斗争。考茨基在说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说：“假如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我必须在马尔托夫和列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根据我们在德国活动的全部经验，我将坚决赞成马尔托夫”。^②并为孟什维克破坏和分裂党的活动进行辩护。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出版后，德国左派优秀代表人物罗莎·卢森堡，以评论该书的名义歪曲了列宁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也发表了反对“集中制”的错误言论。列宁得知后，立即著文予以反驳。列宁把文章寄给了考茨基，要求他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但遭到了拒绝，进一步暴露了考茨基的真面目。

（二）《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详尽地阐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基本组织原理

《进一步，退两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特别是党的基本组织原理。这部著作是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最集中、最系统、最完整地阐述党的基本组织原理的一部专著。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也是形成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转引自《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49—650页。

转引自艾津：《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俄文版，第125—126页。

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征的概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四条结论，基本上是根据《进一步，退两步》书中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的。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对于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分清理论是非，清除理论上的混乱状况有重要作用。克鲁普斯卡娅于1904年3月，在给下新城一位同志的信中写道：“列宁关于代表大会和党内形势的一本小册子（分量很重……）即将脱稿。应该认为，这本小册子将会透彻地阐明多数派的立场，我甚至有一个希望，这本小册子多少会使目前盛行于党内的理论上的混乱现象得到消除。”

（三）《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

《进一步，退两步》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大体上都涉及到了，如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建党的目的，建党的组织原则；党员概念，党员条件，党员作用；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地位，党与非党的关系；党代表的选举，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立，基层组织的存在形式；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党内斗争的性质和规律，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等等。从《进一步，退两步》所阐述的党的基本组织原理来看，可以说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进一步，退两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党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怎样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本色，怎样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怎样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怎样充分发扬民主，怎样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等等。只要我们带着这

些问题学习《进一步，退两步》，都会得到一定的启示，为当前党的组织建设提供思想武器。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进一步，退两步》对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制有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党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违反党纪国法者不在少数；一些组织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搞分散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的威信。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为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就要向列宁学习，像列宁那样全面系统地抓党的组织建设，同各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

（四）《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二大之后，党内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特别是在党的上层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的情况下，列宁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为我们科学地分析党内斗争形势和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

第一，学习列宁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解决党内矛盾。列宁认为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解决党内矛盾时，必须坚持用事实说话，以便再现二大召开时的真实历史。列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运用了二大会上的所有材料（包括记录、发言、插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有力地教育了犯错误的人，而且也教育了广大群众，教育了全党，提高了全党的认识能力和理论水平。

第二，学习列宁处理复杂党内斗争的坚定态度和必胜的信心。列宁通过对二大，特别是对二大后党内形势的分析，清醒地认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所以，列宁在这场斗争中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而这种光明的前途是不能垂手可得的，而是要经过奋斗的。就是在二大后，少数派一时得势占了上风时，列宁也深信真理必胜，共产

主义必胜。所以，列宁一直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第三，学习列宁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列宁从 1900 年 6 月流放获释后即投入筹备召开二大的准备工作并为此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于 1900 年底创办了《火星报》经过两年的准备后，于 1903 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列宁提前两个月就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亲自接待每一位代表。开会期间，代表们的观点不同，列宁为了使全体代表思想统一在党的原则基础上，除了白天开会外，还利用晚上或会议间隙时间，找他们谈话。在会议进行的 24 天中，列宁和所有到会的代表谈了话。列宁在会上的发言、插话和答辩等达 100 次之多。列宁还参加了会议文件的全部起草工作。正是由于列宁卓有成效的斗争和工作，所以，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获得了胜利。

总之，列宁的这种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四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基础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解决了思想上和组织上建党后，策略上建党就提到了全党面前。适应这一客观需要，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回答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本策略原则，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策略基础。

一、1905 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发表

正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社会改良”，赞美“社会和平”的时候，1905 年在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于

1905年革命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路线。布尔什维克执行了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正确路线，孟什维克则承袭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

俄国革命经过几年的准备，逐渐地成熟起来。20世纪初，沙皇俄国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俄国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在这个基础上，1904年12月爆发了巴库的工人大罢工，各地农民纷纷起来响应。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为反对厂方无理开除4名工人而举行了全厂工人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沙皇的镇压，由此而点燃了全俄工人政治罢工和农民起义的烈火。1月22日，人民组织了一支有14万人的和平请愿队伍进行请愿活动。然而，遭到了沙皇的残杀，1000多人被打死，近5000人受伤，造成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流血星期日”事件。这一事件是自巴黎公社“流血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屠杀工人的惨案。这次运动的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工人纷纷举行起义，掀起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罢工浪潮。仅1月份，罢工人数就达44万人，超过了以往10年的罢工总数。这次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总演习”，也是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列宁得知1月22日的消息后，高兴地说：“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当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浑浑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几个月、几年都受不到的。英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口号‘不自由无宁死！’，现在已经响彻全俄国。事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①

在这种迅速发展着的革命形势下，整个社会各个集团和政党，纷纷调整和制定新的方针和策略。沙皇反动政府妄图运用反革命两手达到扑灭革命的目的；立宪民主党也采取了狡猾的两手政策，与沙皇妥协以达到窃取政权，反对革命的肮脏目的。根据

《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85页。

这种情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有清醒的估计，以便制定与当时形势相适应的策略方针，继续掌握领导革命的主动权。为此，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及时提出了迅速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以便于制定统一的革命策略和战线，聚集革命力量，采取一致行动。列宁的建议虽然又遭到孟什维克的反对，但是，全党大多数组织却毅然排除孟什维克的阻挠，参加了 1905 年 4 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孤立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建立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不仅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领导这个革命。无产阶级在第二阶段中，应当迅速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能充当领导者，领导这场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大会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对武装起义、对农民和临时政府的态度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大会认为，组织武装起义，是党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所有党组织不仅要向无产阶级说明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要向他们说明如何组织这次起义。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要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应是工农专政的政府。会上还提出没收地主、官僚、教堂、寺院和皇族的土地，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孟什维克也在瑞士的日内瓦单独召开了代表会议。他们认为，正在发展着的俄国革命只不过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重演，革命必须由自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应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主张不与农民接近，反对武装起义，认为起义是自发的过程，是无法准备的，

起义只能吓跑资产阶级。起义不是党的事情，党应当召开国家杜马，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会后，他们又加紧了反党活动。

列宁认为，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不断深入的路线斗争的客观需要，有必要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关于党的策略方面的著作，1905年7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就是一部最主要的代表作。

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基本思想

（一）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孟什维克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一样，极力鼓吹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这个革命的领导者，而无产阶级则只能尾随在资产阶级后面，充当“助手”作用，如果无产阶级充当领导，就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的规模缩小。孟什维克的“理论家”马尔丁诺夫公然宣称：“无产阶级及领导权，——这是有害的空想”；无产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极端反对派走。”

列宁明确指出，俄国的1905年革命同西欧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就是说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不同于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动力和领导权内容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现在资产阶级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反动阶级；而无产阶级不仅按其阶级地位来讲，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而且已经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又有本阶级的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所以，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个实际步骤，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

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①

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临着两种可能的结局：或者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消灭农奴制残余，建立民主共和国；或者通过资产阶级领导并与沙皇妥协，建立仍旧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有限君主制的残缺不全的立宪制，使革命半途而废，列宁说：“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②可见，无产阶级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那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避免充当资产阶级助手的命运而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呢？这首先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这个党要保持其独立性、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自立的地位，在事变的进程中“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③其次，必须把农民当做自己的同盟军，建立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对农民的领导问题，离开对农民的领导，领导权是空的。列宁说，要教育农民成为民主革命的力量，“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4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6页。

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①再次，必须把自由资产阶级驱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孤立，这样才能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二）武装起义是获得革命胜利的主要手段

表面上看，孟什维克对武装起义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实质上是反对武装起义的。他们拼命鼓吹“自发起义论”。胡说“起义是自发的，组织和准备起义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预定的行动计划都是空想（……），都是白费气力”。^②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计划是可怕的“雅各宾式”的计划，是“布朗基主义”。普列汉诺夫则说暴力会使一个国家迅速地“走向彻底毁灭”，责骂布尔什维克“迷恋于武装起义的文件”是犯了搞“武装起义的游戏的冒险性”的错误。列宁指出：人民武装起义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手段。无产阶级政党应竭力设法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无产阶级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应创立革命军队，这是保证人民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保证争取民主共和制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孟什维克既然认定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孟什维克公然声称布尔什维克不能掌握政权，只能做为一个反对党派出现。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可是不同阶级对待政权问题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和路线。贵族、地主阶级主张“沙皇与人民协商”，由沙皇政府召集一个有严格等级限制的谏议性议会，搞假民主，消灭革命。自由资产阶级主张召开立宪会议，使资产阶级在政权中占主导多数，而使革命人民占少数服从的地位。无产阶级则主张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临时革命政权，实现工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42—43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20页。

农民主专政。列宁说，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唯一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以工农为其阶级基础的，它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铺平道路。

（四）坚持不断革命，不停顿地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错误地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农民因获得土地而马上变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支柱，只有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然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列宁同他们的观点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要求，提出农民运动必须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论证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二者是相对独立的革命阶段，任务、性质、动力有所不同。列宁说，混淆两个革命的任务是荒谬的。这两者的联系在于，二者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民主革命作为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第二步。“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也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列宁指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关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关于工农联盟和工农革命专政的学说，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历史地位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 1905 年在日内瓦出版后（在国内也翻印过），在国内广为传播，在彼得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党组织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后来被反动当局列为禁书，并作出“销毁”的决定。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当时以及在苏联共产党历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一）《两种策略》一书的问世，从思想上粉碎了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武装了全党和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两种策略》主要是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列宁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策略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不同阶级对革命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敢不敢领导革命、敢不敢夺取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的焦点。孟什维克害怕革命，不敢斗争，不敢胜利，而是鼓吹妥协，总想把革命果实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走背叛革命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则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采取革命的策略，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列宁号召“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①由于彻底地粉碎了孟什维克的错误策略路线，进一步武装了无产阶级，明确了革命的前途，增强了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信心。

（二）《两种策略》一书的问世，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马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第 84 页。

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党的策略思想奠定了基础。列宁在新形势下，针对革命中遇到的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列宁主要回答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紧紧地掌握领导权；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权；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及其工农民主专政；必须实行不断革命，在争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同时，适时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整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节。

（三）《两种策略》一书的问世，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策略基础

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看，《两种策略》的发表，是继党解决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之后，又成功地解决了策略基础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做了科学的分析，而且解决了如何革命的策略问题，并用这些战略与策略思想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这些理论，实质上是列宁在 1915 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结论的前提，并为 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策略原则。

第四章 列宁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这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崭新课题。列宁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积极探索，提出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节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过程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一共有6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俄共（布）一共召开了6次代表大会和6次代表会议，除了1921年5月的一次代表会议外，每次大会都作出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决议，这些决议有不少是列宁亲自起草的。同时，列宁还就党的建设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讲话和书信。列宁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

1918年3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也是党执政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定，批准了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

列宁认为，党在执政以后，应当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学会管理国家。他受党的委托，于 1918 年三四月间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① 这是当时俄共（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但是，由于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又把党和人民卷入军事斗争之中，未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918 年春，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苏维埃政权，并很快占领了乌克兰、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和城镇，控制了全俄近 3/4 的土地。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在目前，战争问题、军事事件问题又作为革命的主要问题，根本问题而出现于舞台。”^② 后来，他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动员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苏维埃国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过近 3 年的浴血奋战，到 1920 年底基本上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叛乱，取得了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列宁和俄共（布）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19 年 3 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通过了新的党纲，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里，对党员发展工作、党的组织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477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12 页。

制度、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规定，提出执政党要注意保持党员成分的纯洁性，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要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恶习作斗争。根据八大的决议，各地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列宁于同年 10 月写的《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对征收党员周活动进行了总结，强调执政党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并提出用动员党员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1920 年俄共（布）九大，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对党的组织任务与政治任务的关系，对党的干部分配原则，对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党的宣传工作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1919 年共产国际建立。列宁于 1920 年 6 月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为了纠正共产国际内部出现的“左”倾错误，阐述党的战略策略思想而写的。同时，它又是一部党的建设的重要著作，深刻阐述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理。例如，它强调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严格的纪律和集中制是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党是在反对“左”和右错误倾向的两条战线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党必须正确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必须与本国的特点相结合；等等。可以说，这些原理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包括执政以来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但是应当看到，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党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所以党的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中。正如俄共（布）八大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党正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每个决议首先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才可向有关的党机关提出申诉。在这方面，在目前阶段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出版工作、宣传

等)就应当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加以集中。”^①整个说来,它表现为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工作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这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战争环境中是必要的,而且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矛盾:极端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了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机关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这些,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就不能容许了。

二、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展开

1920年底,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结束,真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了新经济政策。适应这种变化,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②。他根据和平时期的特点和党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继续进行探索,使许多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展开。我们学习和研究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尤其应该注意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提出的执政党建设思想。

1920年底,正当党着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刻,托洛茨基等人就工会问题挑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远远超出了工会问题,它涉及工会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排除干扰,确保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列宁不得不应付这场争论。他写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文章,批评了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党、工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

①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07—50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7页。

强调必须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作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重要决定。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伟大转变。列宁在有关报告中，就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在列宁主持下，党的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重要决议，强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进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这种形式和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明确提出了党要适应从革命战争转入经济建设的形势，改变党内生活的“极端集中制”，由“战斗命令制”过渡到“工人民主制”，使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关于监察委员会》等决议。在这些决议中，提出禁止一切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求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脱离群众；要不断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对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清洗不合格党员；等等。1921年开展的清党，约有17万人被清除出党，占当时党员总数的25%左右。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但党的组织得到纯洁，党的战斗力得到增强。

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亲自领导和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列宁抱病亲自起草了政治报告大纲，并就提高党员质量和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问题，接连写了两封信，建议代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着重对一年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做了总结。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和会前他给中央的信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决议，批准了《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等有关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在这些文件中，集中阐述了党的建设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在新经济

政策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问题；二是关于继续提高党员质量和纯洁党的队伍问题。列宁指出，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为此，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经营管理，提高实际领导本领。另外，鉴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有增无减，列宁还建议代表大会能够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和纯洁党的队伍，党的十一大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延长党员预备期的规定，并对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使苏维埃国家摆脱了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消极东西。如，滥用新经济政策，经济犯罪案件增加，党员蜕化变质的危险增长。为此列宁强调，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必须善于抑制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方面”，加强反腐败斗争。俄共（布）十一大决议指出：党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同新经济政策有关的一些危险，党应当以最大的毅力同利用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培植资产阶级习气的企图作斗争。对于国家机关或经济机关的“共产党员”领导者的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列宁还特别重视法制建设，要求通过加强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工作，运用法律的武器同经济犯罪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三、列宁最后几篇文章和书信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

从 1921 年 12 月以后，列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2 年 5 月，列宁得了重病，12 月再次发病后半身瘫痪，丧失了独立工作能力。这时，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下了最后一批文章和书信，主要有：《日记摘录》、《论合作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些在后来称之为“遗嘱”。这是列宁最后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

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强中央领导层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这个问题使他“焦虑不安”。在历史上，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俄共（布）中央一直是团结的，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有过分歧甚至争论，但是经过讨论和争论取得一致意见后，仍然能同心协力地工作。并且，争论从来不是以采取组织措施解决的。正是这样一个中央领导核心率领全国人民打赢了国内战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然后又及时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顺利地进行经济恢复工作。

但是，列宁在晚年看到的影响党的领导的危险，既不在工农两个阶级的分裂上，也不在派别集团上，而是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某些人的关系上，特别是他们的个人品质上。列宁在信中对党的几位领导人，其中主要是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作了评价。他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托洛茨基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① 列宁指出，必须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消除这种分裂的危险。为此他建议：

第一，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党的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 27 人，候补委员 19 人；中央监察委员 5 人，候补委员 2 人。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 50 人甚至 100 人。他说：“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②

第二，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监督。为此，列宁建议同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9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1 页。

时增加监察委员会的人数，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 75—100 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他们监督检查下级组织的工作，出席政治局的会议，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

第三，加强集体领导。列宁建议加强中央全会的工作，中央全会平均每两个月开一次，同时让中央监察委员出席。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就可以由中央全会研究决定。集体领导加强了，个人的偶然因素给党造成分裂的危险就会减少。

第四，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他在 1923 年 1 月 4 日写的补充中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并没有理解这一要求的重要性，看不到这种个人品质对党的命运的影响，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

第二节 列宁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原理，积极探索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列宁认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和正确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否则，就不可能取得

^①《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0 页。

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十月革命以后，在要不要坚持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问题上，无论社会上还是党内都有人持反对态度。当时，列宁曾经设想实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其他政党只要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就允许它们存在并参加政权。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反对，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一党专政”。列宁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如果以为共产党领导就是“一党专政”，那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①。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一党专政”，就是指要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同时，列宁还坚决批评了党内反对派提出的把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错误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否定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②。

为什么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列宁认为，首先，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它一直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5—126页。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23、624页。

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①其次，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②列宁在这里既讲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流血的、暴力的和军事的斗争中需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也讲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不流血的、和平的和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斗争中需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顺利地、有效地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斗争，全面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列宁不仅提出和论证了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问题，而且提出和探讨了党如何正确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问题。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决议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努力领导苏维埃，但又不是代替苏维埃。”^③但由于国内战争的险恶环境，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后来随着经济恢复工作的展开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于是更加引起了列宁的关注。1922年3月召开党的十一大时，列宁在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当时党政关系存在“不正常”的状况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并强调：“党的任务则是对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7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54—155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71页。

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① 列宁说的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就是指政治领导，即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不是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涉。

那么，工人阶级执政党如何实现自己的领导呢？列宁认为：第一，党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实现领导。他在强调党要领导苏维埃的同时，又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② 党的八大决议也指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③。因此，必须保证苏维埃机关加强自己职权范围的工作，提高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第二，党通过选拔、教育和调配干部实现领导。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靠党的干部去贯彻执行所以，选择、教育和调配干部，对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关系极大。列宁说：“如果没有人员的任命和调动，任何政治也就无法体现。”^④ 因此，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各级党组织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人，没有能干的人，一切命令和决议不过是一些肮脏的废纸而已。第三，党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活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领导。根据列宁的建议，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工会等各种非党组织中，都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党团的任务是：“在各方面加强党的影响，在非党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以及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的工作实行党的监督。”^⑤ 同时，列宁还强调通过共产党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58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7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66页。

⑤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29页。

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他要求在苏维埃机关任职的党员，“在遵守劳动纪律和发挥劳动干劲方面应当走在大家的前面。应当真心实意地执行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决议”^①。这样，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二、经济建设是党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

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其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就是进行经济建设。1918年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②。1919年他在为党的八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又说：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③。后来，他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再次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 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列宁认为，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需要。列宁深刻阐明，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前提，但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方面的保证，而且需要经济方面的保证。他说：“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03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68页。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27页。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23页。

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①其次，这是巩固新生政权，防止资本主义旧制度复辟的最根本保证。因为只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生命力。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第三，这是对付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列宁认为，如果不发展经济，那就要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第四，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列宁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③。

列宁不仅提出了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建设，而且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就曾经几次想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使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920年底，随着国内战争即将结束，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一经济建设上去”^④。根据列宁的提议，大会正式作出了实行这一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并通过了在全国实现电气化的宏伟计划，列宁称之为“第二个党纲”。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样，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46页。

列宁指出，为了确保工作重点的转移，应正确理解政治的含义。他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①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如果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

列宁认为，军事任务可以凭热情、勇敢精神来解决，而经济建设的任务“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②。因为经济建设的任务比军事斗争更困难、更复杂，单凭革命热情是不够的，它需要做复杂的组织工作，需要有科学精神，需要有管理艺术。而这些东西对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党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用一般号召的方式，习惯于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因此，这就要求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列宁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学会管理经济，成为内行。他说：“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是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③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实际情况看，所缺少的恰恰就是文化知识和管理本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号召全党掀起学习的热潮。他严厉地批评了那种不愿意学习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他说：“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08—3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40页。

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① 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因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三、党要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列宁根据执政党的地位变化和面临的新任务，进一步阐明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强调执政党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列宁说：“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② 他多次谈到，只有 20 多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并保持国家政权，就在于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别说能够保持政权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要依靠群众。列宁批评那些患有“左派”幼稚病的共产党员说：“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同时，列宁还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③。

那么，工人阶级执政党如何防止脱离群众的危险呢？列宁根据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实践经验，提出必须解决好以下一些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19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53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96、23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372 页。

问题：

一是要防止因为胜利而骄傲自大。革命胜利后，党执了政，掌了权，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自大。因此，列宁一再告诫说：“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①他甚至认为，“骄傲自大”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大敌人。而党要防止骄傲自大，就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公开进行自我批评，这不但不会降低党的威信，反而会更加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二是要防止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列宁指出，在胜利的时候，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实际，主观武断，盲目决策，使党的方针政策出现失误。而党的方针政策一旦失误，就会从根本上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集中人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俄共（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固然是当时客观条件所迫，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反映出，在指导思想存在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左”的错误。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54—355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5页。

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①通过总结这个教训，列宁反复阐明，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一定要具体地分析本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意愿，防止犯“左”的错误。这样，才能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

三是要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一部分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甚至违法乱纪，破坏党群关系。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②1919年俄共（布）八大根据列宁的提议，在通过的党纲里写上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内容。后来列宁又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③列宁认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他身体力行地领导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坚决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官僚主义，对于严重的官僚主义案件必须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意识和能力，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四、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

列宁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创立者。在党执政的初期，由于党处在战争环境中，更多的是强调集中，民主受到了一定限制。但随着国内战争结束，进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列宁则强调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4页。

^③《列宁全集》第1版第35卷，第552页。

必须不断地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1921年，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指出：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须由“战斗命令制”改为实行“工人民主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具体说来就是，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党内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党的决议未通过以前，要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当然，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必须最迅速而准确地执行。

为了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决议还要求：第一，在党员大会、支部大会上经常讨论全党生活、地方生活中一切最重要的问题；第二，必须使党的领导机关召开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并吸收更多的普通党员参加；第三，要求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使领导机关同全党之间保持固定的联系；第四，有关的党委会不仅要向领导机关，而且要向下级经常报告工作；第五，上级机关不得随意下令解散下级组织，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作出指示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

列宁强调，党内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当时俄共（布）中央没有设主席，党的最高领导集团是政治局。政治局委员虽然在国家行政职务上有高有低，但在党内却没有高低之分，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一人一票。列宁是人们心目中的最高领袖，但他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总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讨论和表决，对集体作出的决定无条件地遵守，决不个人专断。当然，集体领导必须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列宁指出：“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实行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谈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因此，“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

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①

针对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列宁还十分重视加强党内监督。这既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和纠正党内一切不良现象的有力措施。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设立专门的监察机关。党执政以后，从 1920 年开始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对此，列宁的基本主张是：要提高党的监察机关的威信和它的职权，监察机关要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具体来说，第一，各级监察委员会应由党内最有威信的同志组成。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而且，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职务。列宁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它的委员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一个主管机关以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任任何职务。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有了迄今所设想过的——一切保证中的最大保证”^②。第二，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与同级党委会平行，有同等的权力。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由代表大会选出；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③第三，监察机关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于他们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应比组织局更具有独立性”^④。监察委员会在和同级党委会的关系上，它必须独立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41—42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197 页。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74 页。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1 卷，第 290 页。

地行使自己的监察权，而不受同级党委决议的约束。俄共（布）十大决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的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列宁还着重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做到绝对了解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并处理它的问题。他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①

列宁指出，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反对各种派别活动。他说：“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②为此，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提出要“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中央委员如果进行派别活动，经中央全会 2/3 票的多数决定，可降为候补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

五、注重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

列宁一向重视党员质量问题。早在建党初期，他就提出：

^①（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84、377 页。

^②《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78 页。

“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执政党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艰巨任务，进一步强调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②

为什么执政党要特别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③。因此，“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④那些追求地位的人，那些想从执政党的地位捞取好处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都千方百计地想混进党里来。第二，执政党的党员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如不严格要求，就有可能出现某些意志薄弱者被权力所腐蚀，搞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第三，执政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对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不但要对党无限忠诚，而且要有从事经济建设的本领。第四，党执政以后，由于新党员大量增加，教育和管理的任务比过去更加繁重。列宁一再指出：“我们党员现在达到的巨大数字，使人有些担心，而且这里存在着很现实的危险：我们党在迅速发展，而我们教育这些党员去完成党的当前任务这项工作却不能随时跟上。”^⑤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党内总的任务不是在数量上扩充党的队伍，而是改善它的质量，提高全体党员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页。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1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9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11页。

一基础上达到全党队伍的统一。”^①

列宁强调，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党员的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是永远也不能成为执政党党员的。他明确宣布：“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②在战争年代，列宁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带头上前线和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员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了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必须规定严格的入党条件。列宁主张，执政党只能吸收那些经过严格考验的，真正赞成共产主义，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先进分子。为此，他建议对新党员规定预备期，以考察他们的真正入党动机和是否达到党员标准。十月革命前，俄共（布）对新党员没有预备期的要求。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党章，增加了党员预备期的规定。而且，要求在接收新党员时，要严格入党手续。第二，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列宁认为，执政党必须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920年初，在新党员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他提出：“我们的当前任务，就是要最迅速、最有效和最切实地帮助这些年轻的党员成长，把他们培养成建设共产主义的干部，使他们最有觉悟，能够胜任最重要的职务，并且同群众即大多数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③党的十一大有关决议也指出：“清党暴露了党员的政治修养水平一般是非常低的。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54页。

——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水平。^①第三，必须把党员置于纪律、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认为，在遵纪守法方面，党员同普通群众一样，不能丝毫特殊。而且，党员更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强调：“在苏维埃俄国，根据党的倡议，共产党员犯罪，要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处罚。”^②第四，必须随时清除“混进党里来的人”。党在执政以后，一方面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党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党里来；另一方面，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可能经不起各种考验，腐化变质。鉴于这种情况，列宁强调，党必须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他指出：“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第三节 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特点和意义

由于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加强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列宁提出的执政党建设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由于当时苏维埃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因此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又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特点

列宁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探索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注重实践，反对从书本出发。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在实践中探索。他指出：对俄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05页。

《对布哈林 过渡时期的经济 一书的评论》中文版，第56页。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62页。

国共产党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①。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然也包括执政党的建设在内。十月革命以前，虽然列宁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革命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胜利地领导了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执政党肩负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建设不能完全照搬过去的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付诸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和掌握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第二，认真总结经验，勇于修正错误。既然是探索，就难免会有失误。可贵的是，列宁敢于正视这些错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如在国内战争期间，俄共（布）在经济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政治上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这一方面对于保证战争的胜利是必要的，但是，它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列宁及时提出了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党的建设上决定从战斗命令制改为实行工人民主制，扩大党内民主。这说明，列宁并未拘泥于战争年代形成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和做法，也不因执政后曾经发生的失误而执迷，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果断地纠正那些过时的、不正确的做法。第三，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列宁在他晚年十分关注党的建设，甚至重病期间也还在不断地思考和提出建议，说明他是充满着探索精神的，他的思想始终是开放的。列宁的这种探索，展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的面貌。

二、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意义

列宁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页。

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执政，因而他们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才现实地提到了人们面前。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袖，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他探索的理论成果，既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又不能不看到，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他主持俄共（布）执政只有 6 年多时间，而且头 3 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因而这种探索又是很初步的。同时，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许多重要原则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还未能付诸实践。具体说来，列宁的探索可以分为：一是在党的建设实践基础上，对有关执政党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如以上概括的，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原理；经济建设是党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的原理；党要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原理；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原理；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的原理，等等。这些原理，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二是根据当时党的建设实践的需要，制定了一些应急的、只具有临时意义的政策和措施。如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战斗命令制，干部一律实行任命制等等。三是对于一些有关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未能作出明确的回答，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处理党政关系问题，加强党内监督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等。这些问题列宁虽然看到了，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但他在世时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今天我们学习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要着重学习他的积极探索精神，深刻领会他提出的反映执政党建设规律的一些基本思想。

第五章 斯大林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论述与发展

斯大林是列宁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追随者、拥护者和捍卫者，继承人。他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对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历史和个人原因，也有许多失误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借鉴。

第一节 十月革命前后斯大林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阐述

十月革命前，斯大林主要是围绕着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做进一步的阐发，为列宁创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月革命后，在捍卫列宁主义斗争中，概括了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特点。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和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中做了大量工作，写了许多论述列宁主义、列宁党的学说的专著。主要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他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等。在这些著作中，对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有大量的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更为集中和突出。

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阐述

(一) 阐述了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党的重要意义

1901年1月，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中，简要而又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历史和工人运动，着重阐述了建立独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以及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组织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坎坷曲折历程，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类思维规律。“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乌托邦（空想的、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出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要性”。^①脱离现实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由于不了解工人群众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因而对工人运动不能给予“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这是造成他们的理论始终处于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地位，而被历史所抛弃的原因。与此同时，在工人群众中成长起一种伟大的思想，这就是19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②这一革命理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独立的有组织的强大的政党必须掌握的思想武器。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为了使自发的工人运动变成自觉的工人运动，必须有党的领导。社会民主派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页。

而奋斗”。^① 斯大林坚信，只要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在我们面前就将开始一个以政治斗争为目标的时期，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

斯大林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中，针对经济派赞扬自发运动，标榜运动就是一切，把社会主义意识看做是微不足道的错误观点，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对指导工人运动的意义。他说：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② 做为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当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能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已经得到解决。列宁认为，经济派崇拜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联主义。这种运动就是赞扬和崇拜自发运动，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挖了一道鸿沟；就是轻视社会主义意识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觉悟成分的作用，因而他结论道，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在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③ 斯大林还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他形象地说：“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2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82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88页。

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像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它会一直向前猛进 到达‘乐土’。”

（二）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区别

斯大林于 1905 年 1 月，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党章第一条条文，其中突出论证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他明确指出，在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变成我国斗争舞台上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的情况下，无产者和资产者两支大军的斗争已波及俄国整个社会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领导集团，“领路的先头部队”，即通常所说的政党。一边是自由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而它们的阶级和领导者集团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斯大林进一步说，只要我们把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政党稍作一番比较，便可以看出党同一般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②

（三）阐述了党员的基本条件

斯大林认为，党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为这些主张观点去奋斗；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同党一起工作。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才能加入党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规定了最近的目的和最终的目的，制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策略斗争方式。只有对这些观点持一致的态度才能成为党员，也唯有把这样的党员组织起来，才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91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56 页。

能结成一个集中的党。这是党员所必备的首要条件。另外两个条件就是要为实现“这种观点而斗争”和“必须在党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党。它要求每一个党员不能抽象地承认党纲、策略和组织原则，而是要实践他所承认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如果把“空谈家”也称之为党员，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把个人的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时，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党员。

斯大林批判了马尔托夫的只承认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怪异观点，论证了列宁党章第一条条文的正确性。

（四）阐述了党是领导革命，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旗手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党的领导问题。

1901年指出：“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②1905年指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这个革命的王力是城乡无产阶级，这个革命的旗手是社会民主工党”。接着还指出：“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叫做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今后还是它来领导我们前进，也只有它才能领导我们前进！”^③1906年又指出：“使革命获得胜利，……领导革命的一定要是觉悟的工人，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

^①《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8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4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8—69页。

阶级手中，——所以党的任务就是埋葬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城乡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他们的革命斗争，领导他们今后的发动，这样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①无产阶级政党要自觉地促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把革命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将革命进行到底。

（五）历史地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分歧的阶级根源

1905年4月底斯大林针对孟什维克少数派对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攻击，发表了《论党内意见分歧》。在这部著作中，他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产生的历史根源、两派分歧的内容、实质，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性；论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责任。

斯大林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工人运动也受这两种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两种思想，在党内产生两派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十月革命后，在捍卫列宁主义斗争中概括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特点

十月革命后，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概括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特点。

^①《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3—234页。

（一）重申了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斯大林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第二国际时期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不同特点。他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①然而新时期一到来，情况就根本不同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②如果认为这些新的任务可以用那些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会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不可避免的失利，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所以，斯大林明确指出：“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③没有这样的党，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式的党。

（二）进一步概括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这是斯大林对列宁提出的党是先锋队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先锋队首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其成员的质量。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

党要真正成为先锋队，还“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8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8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① 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斗争。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情和思想，如果做运动的尾巴，如果不把群众认识提高到自觉的觉悟的程度，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做为先锋队的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应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斯大林指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应当看的更远些，应当给千百万工人规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②

同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是先锋队的党的重要条件之一。党的先进性是同整个阶级相比，同广大群众相比而言的，“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末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党就不能领导阶级。”^③ 党的先锋队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个特点是：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

党是有组织的部队，这是领导本阶级进行革命所必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④ 斯大林批驳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0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1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2页。

了马尔托夫错误的组织观点，重申了列宁关于党是有组织整体的思想：首先，党是组织的总和，党员是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而马尔托夫党的概念却是界限模糊、没有定型、组织涣散的。如果接受马尔托夫的建党路线，党不可能在革命中起组织核心的作用。其次，党有统一的组织体系及其相应的组织原则。“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①

第三个特点是：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组织。除党组织之外，还有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共青团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等等。这些组织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没有这些组织，党就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那么，如何把这些党以外的组织统一起来，沿着一个方向，一条路线前进呢？最佳的办法就是实现统一的领导。而能承担起克服各自为政实现统一的领导责任的“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② 无产阶级政党也具备领导其他组织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他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5页。

带的唯一组织。’^① 斯大林就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充当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做了明确的解释，他说，所谓最高形式，是要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员，“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② 把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贯彻到其他组织中去。

第四个特点是：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③ 总之，“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④ 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完成，党也必定要灭亡的。

第五个特点是：党的意志统一是行动统一的必要条件。

全体党员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的一致，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因此“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有派别的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⑤

第六个特点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党内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因受资本主义影响在思想上严重不纯，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6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7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7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9页。

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豢养的工人贵族。正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①因此，清洗机会主义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就是说，当无产阶级“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者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②现在党内部空前统一和团结的根本原因，就是及时的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而后使党得到巩固的。

第二节 斯大林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主要贡献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他领导下，除了坚持列宁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外，又有新的丰富和发展。从1917年10月革命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共36个年头；如果从1924年1月列宁逝世至1953年也有30年的岁月。在这30年当中，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中央，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党内反对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对苏联的政权巩固，经济的发展及党的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间，单就党的建设理论方面而言，不仅阐述了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做出了许多新概括，丰富了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0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0—161页。

一、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根据党的地位变化，着重强调了党的领导问题。他认为，不管形势、任务、地位如何变化，党的领导这一条不能变，必须继续坚持列宁关于党的领导的基本观点，并要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发展和丰富列宁的理论，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

第一，进一步坚持党所领导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

1921年7月，在《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指挥员和司令部，“它领导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部门中的一切形式的斗争，并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联成一个整体”。^①这就是说，党要领导全部斗争，不仅要领导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斗争，而且也要领导不同的部门中的斗争，使党的领导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都有所体现。

第二，提出了“一个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之一。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在现今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只要“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②。1926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又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③。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3页。

第三，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等组织的关系。

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最高形式理论的同时，对党与国家政权等组织的关系有新的论述。斯大林认为，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决不是想说我们党和国家是一个东西。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①。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在政策上、方针上实行总的领导。“我只是想说，在我们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切基本问题上起领导作用的是党。”^②那么，党领导国家政权即政府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斯大林认为有三点：首先表现在共产党力求通过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并愿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己的候选人，自己的优秀工作人员，输送到我国重要的国家工作岗位上去。其次表现在党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 errors 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他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再次表现在任何政权机关在制定工业和农业方面或商业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计划时，党都要给它们总的方针性的指示，确定它们在计划执行期间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向。对工会领导不能干涉过多。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③但领导工会应当通过在工会中进行经常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不应当撇开他们。他批评在俄国党内曾有对工会领导过多的情形。要善于和工会及其领导者保持广泛的联系，党不能正式给工会发任何指示，但党可以给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发指示。共产党组织的责任就是力求在工会、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用说服的方法通过各种符合党的指示的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页。

决议，使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斯大林这些思想也适用于青年团、妇女组织、合作社组织。特别是斯大林在 1937 年 3 月，在《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及其他两面派分子的办法》一文中指出：党组织要从经济琐细事务中解放出来，并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他进一步说明，这一条的意思并不在于要摆脱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仅仅是在于再也不容许以我国党的组织去代替经济机关，其中特别是农业机关，并使它们无专人负责。因此，必须精通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经常地帮助这些机关，经常地巩固这些机关，不是在这些机关以外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经济工作。必须给经济机关、首先是农业机关以优秀人材，必须给这些机关补充有能力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的新的优秀的工作人员。只有把这一工作做了之后，才能指望使党组织完全从经济琐细事务中解放出来。

第四，党的领导不仅要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制定决议，而且要带领群众执行决议。

斯大林认为，党制定各种路线、决议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实现这些决议和路线，在于去领导彻底实现这些决议。更不是说，党的领导就是制定决议，执行决议是群众的事。恰恰相反，党的领导主要内容之一是带头首先执行决议。1924 年 7 月，斯大林在《关于波兰共产党》一文中嘲笑了普鲁赫尼亚克以胜利的神情宣读波兰中央委员会领导者们通过的一大串革命决议，认为党的领导就在于制定决议，在于实现决议。“他并没有想到制定决议只是党的领导的第一步，党的领导的开始。他不懂得领导的基础不在于制定决议，而在于执行决议，在于实现决议。因此，他在冗长的演说中竟忘记告诉我们这些决议的命运，他不认为有必要谈谈波兰共产党是不是执行了这些决议，执行的程度如何。但是，党的领导的实质正是在于执行决议和指示。”^① 1929 年 4 月，

^①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234—235 页。

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说的更明确，他说：“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① 1934年1月，《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有些人以为只要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制成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并一致通过，胜利就会自行到来，即所谓自流地到来。这当然是不对的。”^② 正确路线的执行，“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争取执行党的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行到来，它通常是由人们争取来的。”^③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党不能仅限于制定总路线。它还应该天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8—5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22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22页。

天检查总路线的实际执行情况。它应当领导总路线的实现”。^① 1934年1月，斯大林还认为，正确的路线的命运如何，在于宣传。使群众了解决议、口号的正确性。这样，党的决议、口号才能变为群众的指南，变成行动。

第五，执政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要靠钻研业务，要成为内行。

1925年5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说：“现在要进行领导，就必须善于经营管理，必须懂得和理解经济。现在只是高谈‘世界政治’，高谈张伯伦和麦克唐纳，是不会有有什么成就的。我们已经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因此，只有通晓经济的人，只有善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向农夫提出有益意见的人，只有善于帮助农夫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能做领导工作。研究经济，和经济结合，深入到经济建设中的各项细节中去，——这就是农村中共产党员现在的任务。”^② 1925年6月，在《问题和答复》中说：“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和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③ 1931年2月，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一文中说：“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8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3页。

管。……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①同年6月，在《新的环境和新建设任务》一文中又指出，在新时期要按新方式进行领导，领导者要了解新环境、新条件，根据这个来改造自己的领导工作。“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者不是‘一般地’，不是‘从空中’来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需要使他们不是从一般的空谈出发，而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个问题；需要使他们不限于纸上的敷衍或一般的空话和口号，而要精通业务，了解工作的细节，熟悉‘小事’……如果以为现在可以远离工厂坐在办公室内，从办公厅来进行领导，那就错了。”^②

二、执政党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人民服务

党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原理，是列宁创立的。斯大林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是为阶级、为群众而存在的，而不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

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他认为，一个党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仅无法进行革命，也无法进行建设。党之所以有力量，所以强大就在于它同千百万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愈密切，我们的胜利就愈有把握，就愈可靠。

1924年5月，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指出：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非党群众，必须懂得，“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它不是为自己本身，是为阶级而存在的。”^③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服务。1925年6月，斯大林批评某些地区领导者眼睛向上时指出：“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4、35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0、71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00页。

居民的联系。……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裂开了，那末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① 斯大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出了—个真理，党的干部和领导者，一切应着眼于基层、群众，不应是眼睛向上看。

第二，执政党能否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党的力量和党的生命所在。

斯大林认为，“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愈可靠。”^② 这是党领导群众，向群众学习的必备条件。“建设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挥人员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因为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绝关系。不脱离群众，而最紧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挥人员管理业务的新方法。”

斯大林从脱离群众的危害角度，谈了脱离群众害党、害国、害自己的恶果。在《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说：“如果共产党员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一堵墙同非党分子隔开，他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④ 1931年12月指出：“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⑤ 他严肃地指出：“当布尔什维克保存着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3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70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2—73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9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8页。

群众和丧失与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 而变成空架子。’^①发展下去党和国家就会灭亡。

第三，把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提到了党的领导规律的高度。

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领导规律之一。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正确对待群众。“从党同群众的联系来看，为什么党会强大有力呢？因为它在自己的周围有广大的同情党的非党积极分子。如果党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这些广大的同情党的积极分子，它就不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党就不能实现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领导。这是基本的领导规律之一。’^②党的领导要靠取得群众的信任来维持，“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而是要靠党的正确理论，要靠党的正确政策，要靠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要靠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要靠党有决心和本领说服群众相信它的口号的正确”。^③党的领导“全部真理”是先锋队不脱离群众，领导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这是“普通的列宁原则”。

党的政策正确固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这还远不是一切，为了使群众确信这一点，就需要党善于进行灵活巧妙的工作把群众引导到自己的立场上来，善于进行灵活巧妙的工作使千百万群众确信党的政策正确。他告诫党的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对自己要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即或是中央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委员，也不等于说已经具备了有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职位本身并不给予知识和经验，“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第 59 页。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98—199 页。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41 页。

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补充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一分钟也不可减弱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要仔细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倾听普通党员的意见、倾听所谓‘小人物’的意见、倾听人民的意见。”^① 这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第四，提出了解决党脱离群众的办法。

怎样才能使党不脱离群众呢？办法当然很多。斯大林强调了党的积极分子的作用。他认为，在党的周围的积极分子是党和千百万群众起连接作用的桥梁，党是从这些积极分子中汲取力量的，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取得群众的信任，并且是我们党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最丰富的来源，“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党就不能实现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领导。这是基本的领导规律之一。”^② 为此要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党员不要和非党员隔绝，不要把自己关在党的圈子里，不要摆党员架子，而要倾听非党员呼声，向非党员学习。

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积极性

斯大林认为，执政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一，提出了什么是党内民主及其实质标志。

1926年4月，斯大林在谈到派别集团的自由时，阐述了党的民主。他说：“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③ 为此，对党员群众

①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第55—5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8—199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1页。

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召开会议讨论，就应都让他们参加，对各级党机关自由地进行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员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新的领导者。他认为，充分发挥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是衡量党内是否发扬民主的标志。党内“民主的实质归结起来不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问题，而是主动性问题，是党员积极参加党的领导的问题。”^①不是形式上讲民主，而是从本质上讲民主。真正的党内民主，关键要看党员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的真正高涨和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

第二，扩大党内民主是有条件和限制的。

不要把民主偶像化和绝对化。斯大林倡导发扬民主，但他奉告大家，“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因此他说：“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实行党内民主是以每一个时期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为转移的。”^②要从条件出发，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斯大林在谈到内部条件时明确指出：“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起来。必须使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也在质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国内无产阶级分子增长起来。”外部条件是“某些多少能够保证和平，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如果有人侵犯我们，而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因为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党要动员起来，我们大概要使它军事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99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页。

化，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① 俄国的革命实践就证明了这一问题。十月革命前党内民主只限一定程度之内，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内民主逐步扩大。即使是在党内实行民主也不是没有障碍的，也还要受各种条件所制约的。首先，某些人头脑中还存在着战争时期军事化的残余，我们党似乎不是一个有独立的思想生活和实际生活的独立的有机体，而是一种类似由下级、中级和上级机关组成的机关系统的东西，这种因素妨碍党内彻底实行民主。其次，中央和地方庞大官僚主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往往不由自主地完全不由自主地完全不自觉地离开了党内民主。再次，党的许多组织和支部，特别是边疆地区的组织和支部文化水平很低，妨碍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实行党内民主本身还要求支部成员和整个组织要具有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同时，也要注意反对极端民主化。我们不能要求把“一切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自下而上地讨论。斯大林举例说，现在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至少有 40 万党员和两万个支部，如果什么问题都讨论起来，空谈不休，这种民主则有害无益。

第三，阐述了党内真正的民主涵义及与纪律的关系。

党执政后，民主便成为热门话题，但对民主的理解却各有不同，为了使党员对党内民主有一个正确认识，斯大林对什么是党内真正民主发表了意见。首先，要分清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自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② 党应当赞成第一种民主，反对第二种民主。其次，少数人的所谓民主。斯大林谈到某些人空谈民主时说：“究竟什么是党内民主呢？究竟是谁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寥寥无几的脱离革命的知识分子

^①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312 页。

有漫无止境地夸夸其谈和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等等的自由，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是破坏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区区少数人的民主。”^① 1930年6月，斯大林又断言指出：“知识分子集团间的派别争吵的自由并不是党内民主；而党所开展的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党员群众的高度积极性才是实际的、真正的党内民主的表现”。^② 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是真正广泛的民主。再次，要把党内民主与派别集团的自由区别开来。斯大林说：“派别集团的自由是什么呢？派别集团的自由就是瓦解党的队伍，把党分裂为各个中心，削弱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③ 斯大林提醒全党要警惕反对派大叫党内民主，要求全国性争论，借拥护党内民主之名，行破坏民主基本原则之实。最后，阐述了党内民主与党的纪律之间的关系。实行党内民主并不是不要纪律。“党内民主所以需要，不是为了削弱并破坏党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并加强这个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靠着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来增强的坚固制度，那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④ 所以，把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对立起来，把派别和团体的自由与党内民主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党内民主与集中、纪律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四、执政党更加需要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以后，许多党员干部放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搞一团和气。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而是用“私人情面”、“家庭方式”、“客客气气”的态度放过批评。“党的队伍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28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9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1—132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0页。

里有一些人一般地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①甚至否认错误而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声明“党是不会犯错误的。”进而逃避批评，不愿意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他认为，“害怕自我批评或非党员的批评是现在最危险的病症。”

斯大林认为，取得政权的执政党，胜利后的有功劳的人员，尤其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②对于胜利者，对于有功劳的人，尤其加以批评和检查。

第一，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执政党的重要性。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坚强的标志。斯大林认为，“只有深入生活的和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政党才敢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对自己的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对人民掩盖真相的政党，害怕阳光和批评的政党，并不是政党，而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③其次，坦诚地接受批评和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是党前进的表现。坦诚指出和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不会堵塞我们前进的道路。“正因为我们要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把诚恳的革命的自我批评当做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④“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⑤自我批评可以“割开我们的脓疮”、“消灭我们的缺点”，促使我们前进，所以，我们应当“公开老实”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再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斯大林说：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6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12 页。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03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84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7 页。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① 总之，执政党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应该很好地运用这一武器来建设党。

第二，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庸俗化。

斯大林针对自我批评中庸俗化的情况，专门写了（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除阐述了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外，还指出了歪曲自我批评口号，把自我批评庸俗化的不良表现。首先，有些报刊出现了把切实批评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转到以广告式的叫喊来反对个人生活中的极端现象的趋势。其次，他批评了“为了批评而批评”，“把批评变成一种耸动视听的竞技”，“散布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博得庸人的一笑”的不良现象。同时他也反对把批评变成对经济工作人员的攻击，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威信扫地的做法。

斯大林为了不使自我批评庸俗化，明确提出，“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不要把它变成玩弄‘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枪’等等题目的广告式的把戏的工具。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制造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厨房。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歪曲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攻击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的工具。”但是，他也告诫大家，不要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地正确，不要用此种做法堵住人家的嘴巴，不让批评，这不是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坟墓”。

第三，积极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

斯大林指出，党执政后，党的领袖和群众之间产生了矛盾，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13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20—121 页。

自下而上的批评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好方法。他认为，从历史上形成了某种领袖与群众的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威信越来越高的领导者，他们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而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①同时，执政党也出现了官僚主义，这一切，都需要“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②另外，自下而上的批评是肃清和根绝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他认为，肃清官僚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组织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来批评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③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检察院，来自党中央的批评。“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掀起极广泛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浪潮来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只有从上下两方面施以压力，只有把重点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指望顺利进行斗争并根绝官僚主义。”^④为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要在一切群众中间，首先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

第四，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培养干部、教育党的手段。

斯大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总是从自己的困难和错误中学习。“历史是用困难，用这种或那种危机，用我们的这种或那种错误来教育我们并锻炼我们党的。”^⑤因此，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不是掩盖、逃避自己的错误，而应是诚恳和坦白地承认自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8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9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62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62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87 页。

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揭发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改正错误的过程，批评错误的过程的本身就是培养、训练干部、教育干部的过程。

五、强调了执政党干部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及其正确态度

我们都知道，列宁在夺取政权前，侧重论述了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定性作用。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不仅坚持了这些观点，还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革命理论，理论的作用和学习理论应有的态度等问题。

斯大林阐述了理论的科学概念和对实践的作用。他指出：“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①彻底地解决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说明了理论是对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经验的概括。

斯大林驳斥了否认列宁主义的理论价值的谬论，论述了学习列宁主义的重要性。斯大林在 1924 年 4 月、1925 年 10 月、1929 年 12 月，都精辟而扼要地论述了列宁主义。他在《论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②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说：“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79 页。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205 页。

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① 所以，“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②

斯大林针对一些人、一些部门，在建设时期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情况，提出了学习理论对工作、科学、技术部门的特殊重要作用。强调了干部教育问题。他认为，党的干部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水平也愈高，愈有成效；反之，工作人员就会“变为鼠目寸光”，“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也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一个定理。我们要努力把党的干部锻造成为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医学专家、物理学专家、植物学专家，需要有专门知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掌握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斯大林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他批评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限于停留于表面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僵化的“公式”，这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学实质，重应用，不仅认识世界，而且以改造世界为目的。所以，斯大林提出要善于区别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理论与假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理论的界限；善于区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词句，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界限；善于区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单纯学习其简单方法的界限。学习理论的正确态度，应当是理论联系实际，企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是不可能的，应当根据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一般原理具体化，使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为建设事业服务。

六、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

斯大林的干部理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有自己的特色。特别

^①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80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26—127 页。

是对干部的重要性、如何选拔干部、干部标准、干部的使用等都有论述。1935年5月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对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都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的内容，这里我们就一一介绍了。

第三节 斯大林晚年在执政党建设上的严重教训

斯大林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借鉴。

一、混淆党内矛盾性质，使党内斗争扩大化，大批干部受到迫害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国内形势就非常复杂，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使斗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使党内矛盾斗争也变得很尖锐激烈。列宁在世时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缺乏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特别是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党的著名活动家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之后，党和斯大林把阶级斗争形势看的有些过重，以至于混淆了党内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肃反扩大化。如1934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被怀疑、逮捕和处决。在1966人中有1108人被逮捕和处决。在选出的139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处决。1938年虽然做了甄别但很不彻底，错误地打击了一些好人，同时又使一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坏人和野心家蒙混过关，在苏联共产党内埋下了心腹之患。

后来，斯大林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伟大成绩和

多方面的颂扬，更加滋长了骄傲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离开了集体领导，经常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反革命”，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给党的团结统一带来极大的危害。

二、思想僵化，独断专行，使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

斯大林在执政的 30 年里，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苏联，建设成先进的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强国；胜利地领导了苏联卫国战争，打败了法西斯的入侵，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历史性的胜利和成就，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赞誉，也使一些人片面地夸大了个人作用。斯大林在一片欢呼声中颠倒了领袖与群众、领导集体的关系，滋生了独断专行，家长制作风，党内外出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加之斯大林晚年较多时间里住在莫斯科西北 30 公里的孔策沃别墅“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更促使他远离群众和领导集体。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的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1952 年 10 月 5 日，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距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竟达 13 年之多。破坏了党内民主，影响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的发挥。此外，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自上而下的委派制，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活力，集体领导变成一个空架子，党的领导作用和威信下降。

三、在处理党与党、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存在着严重的大党大国主义倾向

国际主义原则教导我们，世界各国党和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当一律平等。然而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政权，在处理党际和国家关系中却背离了这一原则，开了充当“老子党”的先例，以大党和苏联模式而自居，对其他党和国家指手画脚。早在 1922 年列宁就发现了斯大林存在这个问题，在列宁的

帮助下，有了一定的改进。列宁逝世后，随着革命胜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个人威信的提高，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又逐渐滋生发展起来。1927年8月，他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党要“绝对地捍卫苏联”，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斯大林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把苏联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强加于我党。王明一伙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旨意，照搬苏联模式，背离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使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也经常对中国表现出大党大国主义架势，强加于我党。譬如苏联没有橡胶园，不生产橡胶，每年要用大量资金向西方购买。斯大林以咄咄逼人之势向毛泽东提出，要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他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毛泽东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既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进行了抵制，又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

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成立。事前本来苏共领导说只是个互通情报，交流经验的组织。可是后来情报局完全背离了成立时的宗旨，变成为苏共集中指挥的权力中心，在其中推行大党主义，在各国党之间造成极不正常的关系。在情报局中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照搬者，便视为“离经叛道”，动辄具体干涉，甚至以开除相威胁。组织围攻和制裁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后来又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粗暴干涉南斯拉夫内政，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开辟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第六章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产生和形成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前，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产生和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不断总结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逐步产生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毛泽东建党学说。

第一节 毛泽东建党学说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产生和形成，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大体可以分为 4 个相关的方面，即国际背景、国内条件、党内状况和个人特质。

一、毛泽东建党学说产生的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即外部条件。这种外部条件对毛泽东建党学说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 3 个方面，即所处时代的特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第三国际的指导。

我们研究毛泽东建党学说，必须从特定的时代特点出发。否则，就不可能把握其思想实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其特点是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和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那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怎样

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重大课题。列宁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的、腐朽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给革命者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新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十月革命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使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落后国家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新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完全采取新的平等态度，曾于 1917 年 7 月和 1920 年 9 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取消密约。这些消息在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和伟大意义，最重要的就是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正在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71 页。

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热情地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状况不能不对中国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从好的方面说，是毛泽东建党学说是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产生的。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在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导原则，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这表现为党从创立起就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内有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派别的存在，等等。从不好的方面看，主要是存在着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使党的建设受到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建党学说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毛泽东建党学说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二、毛泽东建党学说产生的国内条件

同任何科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一样，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确立，是以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客体——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不言而喻，这里讲的一切革命问题，当然也包括党的建设。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33 页。

所谓国情，最本质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在于：一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存，自然经济仍占优势，即是一种半自然经济半商品经济的社会；二是生产资料的封建地主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和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并存，资本主义所有制居于主导地位，但封建所有制仍占优势。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有了新的成分，即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来的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后者则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同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所以具有更为彻底的革命性。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则不仅继续以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外国帝国主义紧密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占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近代又遭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压迫。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同盟者。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1840年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则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就造成了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

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些基本矛盾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上述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由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新式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自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就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三、毛泽东建党学说产生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状况的最大特点有两条：其一，从党的思想基础上看，是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其二，从党的阶级基础上看，是党员成分主要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员所构成的。

关于党的理论准备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整个党来说，是有理论指导的，但历史上我们党理论准备又是不足的。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 1941 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作了系统的回答。我们党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短，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到 1921 年党的成立，前后仅 3 年多时间。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少。据统计，到党成立前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 7 种。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迫切性。党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形势要求我们党立即从事实际斗争，无暇从事理论研究和斗争经验的总结。四是马列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而且这些著作大部分还没有译成中文，因此影响到中国党员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修养。主观原因是党内曾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对

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则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和优越性。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集中表现为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必然导致党在革命运动指导上的错误。民主革命时期，在我们党内之所以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原因之一就在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

关于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暂时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据统计，在1927年3月，全党有党员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53.8%，而农民成分则占18.7%。这说明当时在我们党内工人成分还是占多数的，但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据统计，1928年6月全党党员发展到130194人，其中工人成分占10.9%，农民成分占76.6%。1929年工人党员降为7%，1930年7月又降为5.5%，1930年9月又下降为1.6%。这种状况必然会加深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而能否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性质。从全党的思想状况看，据周恩来1928年11月主持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着重讲了克服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并列出了极端民主化、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等10个方面的表现。

毛泽东建党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党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所以毛泽东建党学说主张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大量入党，所以毛泽东建党学说主张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四、毛泽东是最卓越的代表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

是这个集体中最卓越的代表，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理论成果是公正的。在广度上，毛泽东系统地总结我们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使之成为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在深度上，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规律，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过程来说，他个人特质有重要作用。

第一，出身农家子弟。了解农民，是准确把握中国党的建设特点的一个必备条件。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历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陈独秀、王明等人斗争的焦点，实际上就在于对待农民的战略和策略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曾被王明等人指责为“富农路线”，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也曾视中国共产党为“农民的党”。面对这种状况，党的建设如果不在农民问题上有突出的建树，不敢大胆地发展农民革命分子入党并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农民，必然一事无成。毛泽东生在农村，这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直接的感受，为他创立毛泽东建党学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第二，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具有极高的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神实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是进行理论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教条主义的习气，特别是他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这使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

第三，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社会调查研究。这对于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决定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写的调查报告等材料，现存的有 10 多种，达 20 多万字，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间，只有毛泽东进行了时间如此长久、次

数如此频繁、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研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毛泽东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就决定了从个人条件来说，他成为创立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主要代表决不是偶然的。

第四，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总结经验，他曾说过共产党靠总结经验吃饭。毛泽东建党学说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党的建设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概括而形成的。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能不犯错误而处处正确，而在于他能比别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就马上改正并总结经验，在后来的党建指导中愈来愈高明，能够比别人更好地驾驭党的建设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越来越得心应手地指导党的建设。

第五，精通中国历史。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使之中国化并上升到理性认识，还要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毛泽东自幼熟读经书，这使他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因此，毛泽东以后做文章、讲话时常能挥洒自如地运用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既有说服力，又恰到好处。正如周恩来所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 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总之，毛泽东既有高度的革命精神，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是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重要原因。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奋斗，没有国际国内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产生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条件，即使有了上述客观条件，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产生也将是困难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还将在黑暗中徘徊更长的时间。

第二节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活动及其建党思想

从 1920 年到 1927 年的 7 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自身的创建任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上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已经萌芽。这一时期以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界限，可以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学习和探索为特征，故称之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思想的探索阶段”；后者以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直接实践和初步运用为特征，故称之为“毛泽东建党学说取得初步成果阶段”。这两个阶段各有其内容。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正式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呼唤本阶级的理论和政党的出现。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从工人运动中寻找自己的物质力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伊始，便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他们走向工厂，走进车间，走到工人中间，和工人建立了联系，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

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2月，他们在离开北京赴天津的途中，共同酝酿了建党事宜，商定两人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既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情况，又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南陈北李”正在进行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具体帮助。稍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围绕着建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建党通信，是目前所见最早开始探讨建党思想的文献。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同年12月1日和次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蔡和森、毛泽东建党通信。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成了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政党的活动中心。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国内的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海外，一些旅欧、旅日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分别在法国和日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继续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在《新青年》上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讨论”，它以较多篇幅载文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11月，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这个刊物着重宣传党的建设的理论、列宁的建党学说，大量介绍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建党经验。它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

言》等专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采取办刊物、成立研究会的形式，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更加注重与工人运动结合，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此，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伙友》北京的《劳动音》、《工人》月刊，广东的《劳动者》、《劳动与妇女》，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有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深入到工厂车间、铁路矿山，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识字班，直接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启汉在沪西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特别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毛泽东开办的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招收附近工厂工人 40 余人。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动工人起来组织工会。1920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随后，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

综上所述，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在中国正式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 年 7 月，毛泽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思想

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酝酿筹建建党的过程中，首先学习和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在思想理论上为建党工作做了准备。他们通过创办刊物、通信、集会等各种形式，对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

党，都做了初步的探索，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基础之上。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主要是：

（一）关于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组成独立的革命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对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强调了这一基本观点。李大钊认为，在中国应当尽快建立一个政党。这个政党“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①这也就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陈独秀则明确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②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认为，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就必须建立共产党。1920年夏，蔡和森首先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则明确表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应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③同年8月，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有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④毛泽东随后复信，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言论，表明他们对于建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二）关于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一大”前后》（一），第157页。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9页。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必须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建党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李大钊 1919 年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提出：“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须发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所谓“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就是“劳工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陈独秀则明确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资产阶级上面全力造成的政党。”^① 蔡和森和毛泽东则一致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个政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基础。“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② 他们认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③

（三）关于建党的指导思想

与党的性质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李大钊就热情赞扬布尔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他在 1918 年 12 月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说：“他们（即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即马克思）为宗主的。”他公开宣称：“我是喜欢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④ 陈独秀也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

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② 《蔡和森文集》第 53 页。

《蔡和森文集》第 69 页。

《李大钊选集》第 231 页。

“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①因此，共产党要“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②毛泽东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所以，“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③他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④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蔡和森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思想。”^⑤

（四）关于党的奋斗目标和革命道路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五四运动以后，他更加坚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胜利，国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陈独秀则认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照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⑥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更加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⑦蔡和森认为党的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要达到这个方法的方法是“阶级斗争 + 无产阶级专政”，^⑧即通过暴力手段，“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会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⑨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⑩

① 《独秀文存》卷二 第 106 页。

② 《独秀文存》卷二 第 97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54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 页。

⑧⑨《蔡和森文集》（上）第 27、28—29 页。

⑥ 《独秀文存》卷一 第 559 页。

⑦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 1 辑。

⑩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 页。

（五）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注意从理论上政治上建党，而且注意从组织上建党。蔡和森强调“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年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①。他指出，“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②党还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③，这是“不可游移”的原则。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严格的物色确实的党员”^④。对于蔡和森的这些见解，毛泽东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⑤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方向，为党的一大制定党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对于推动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对于建立一个完全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建党学说取得初步成果阶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有组织地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随着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很快地成长起来。特别是党的五大以前中央制定的文件，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为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明确了党的性质

① 《蔡和森文集》（上）第25页。

② 《蔡和森文集》（上），第33页。

《蔡和森文集》（上），第25页。

④ 《蔡和森文集》（上）第3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表明了党的性质。而把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用比较完整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并写在党的章程和决议中，则是党的二大的功绩。二大宣言和有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要坚持党的这一性质，就要划清共产党与民主派的界限、党与工会的界限、党与学会的界限、党与秘密团体的界限。针对当时有人把党同学术团体和秘密团体混为一谈的观点，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二大就党与工会的区别指出：“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以上表述与列宁的“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制定了党的纲领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一个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的纲领，这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对此，党的一大规定党的纲领是：“1. 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 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 联合第三国际。”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但党的一大只是提出了党的最终目标，还没有能够制定出一个包括目前时期革命任务在内的纲领。党的二大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首次区分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当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党的三大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四大则正确地估计了社会各阶级及各阶级势力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五大又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

（三）规定了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民主，纲领规定修改这一纲领，要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同意的民主程序；另一方面强调了集中，规定自下而上建立严密的组织。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上，首次确认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二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大党章和四大党章在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上，基本沿用了二大党章的提法。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在《组织

问题决案》中，则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强调“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

（四）提出了党员的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就十分重视党员条件，强调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党的一大纲领就对党员条件作了规定，即只有“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才“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二大党章又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一方面规定“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另一方面规定申请入党者，须“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为了提高党员质量，三大党章首次增加了党员候补期的规定（劳动者 3 个月，非劳动者 6 个月）。对入党手续也作了一些变动，即由二大党章规定的经党员一人介绍改为二人介绍；由经地方、区及中央逐级审查改为小组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另外，还增加了党员经过组织决定可以“自请出党”的规定。特别是党的五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强调党员一要“服从党的决议”，二要“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三要“缴纳党费”。这些规定为以后制定更加完整的党员基本条件奠定了基础。

（五）规定了党的纪律

一大党纲虽然只有 15 条，但有好几条涉及到党的纪律。二大又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要求“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情感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特别是二大党章专设了“纪律”一章，明确规定了党员个人和组织以及组织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的基本思想。二大党章还规定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但只有开除一项。三大党章和四大党章也都专列了“纪律”一章，内容基本上与二大党章相同。五大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要重视

“政治纪律”。尤其是在纪律方面，五大党章改变了以前党章只是简单开除的做法，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把处分分为两类：一是对党组织，具体分警告、改组和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二是对党员，又分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的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同时，还规定对于违反党纪的行为，必须依合法手续审查。此外，这个党章还首次规定，在中央及省设立监察委员会。这些规定，对于加强党的纪律，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和全党的行动一致，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关于党支部的任务，四大党章已有初步规定，即“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五大后的修正章程又进一步作了详细规定，即“支部的任务是：（1）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2）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3）吸收新的党员；（4）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5）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6）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明确规定外，五大党章还首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进党章。

第三节 “古田会议决议”和毛泽东 建党学说的形成

从 1927 年“八七会议”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前，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代表作有《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上述几篇文章中，以“古田会议决议”最具特色。这是因为从时间上看，该文发表的时间最早；从内容上看，该文的理论最系统。由此可见，“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

明确。”^①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了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即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建党，国际共产主义中是没有先例的。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一、《井冈山的斗争》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总结

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到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并把这件事看做是一切的根本。10月15日他亲自主持部队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随后，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28年2月，井冈山地区党的组织已基本恢复。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此时，边界特委管辖各县党员总数已达万人以上，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八月失败”后，湘赣边界特委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对各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在思想建设方面，举办党团训练班，分期分批组织训练党团员。在作风建设方面，致力于培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注重在党内造成民主集中制的风气。在组织建设方面，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把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人清洗出去。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他11月写成的《井冈山的斗争》，就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建设上，要求制定明确具体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为党

的工作的行动准则。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忽“左”忽右。毛泽东深知制定一个明确具体的民主革命政纲对于指导根据地党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他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保证了湘赣边界根据地和党的建设的正确进行。

在思想建设上，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建党，必然使党内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大量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把他们的落后思想带进党内。当时，在党内这些思想主要表现为躲避对敌斗争或盲目暴动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和家族观念，以及土客籍矛盾等小资产阶级意识。为了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他向中央提出，关键是“在党内，加紧教育。”

在组织建设上，要求健全和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总结了三湾改编以来在红军中党的建设的经验。他说：“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在根据地也逐步建立了一套党的系统。这就是“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特委。”特委是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是红军系统党的最高领导机

关，“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正是由于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领导机关，才保证了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此外，当时根据地党组织还采取了“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的措施。这样做的结果，使“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

在党政关系上，主张党既要领导根据地工农兵政府，又要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地的政权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的多。”因而“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出现了以党代政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领导工农兵政权的重要原则，那就是：“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而那种“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为了使工农兵政府能体现民众的意愿，毛泽东首次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应用于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这就是“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总之，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中，初步总结了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党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党原则和措施，为毛泽东建党学说在古田会议上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二、“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形成的标志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当时，红四军党内就如何建党建军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对于这场争论的内容，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的一封信中把它概括为14个方面，并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问题。为解决这些争论，前委于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领

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做指导工作。同年 9 月，红四军又召开了党的八大，但还是毫无结果。中央收到红四军党的七大文件后，于 8 月 21 日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的正确结论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其中的一些错误。特别是，指示信明确指出：红四军中农民党员占多数，“这并不是危险现象，问题是在农民的成份上，要多找雇农贫农，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以趋于党的一致。”这对于农民党员占多数的党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9 月 28 日中央再次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信是由陈毅起草的并经周恩来审定的，该信根据红四军两年来建党建军的经验教训，从 9 个方面做了具体的指示，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中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建设的基本原则。这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正如毛泽东在 1929 年 11 月 28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12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部分，着重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政治建设问题。

（一）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主张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决议的基本精神，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第一，强调了红军党内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这就

揭示了思想建设与政治路线的内在联系，从而突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其根源。毛泽东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 8 种错误思想。他认为，一方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但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提出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为了有效地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提出要切实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批评。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要求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骨干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而“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

（二）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要求切实解决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毛泽东在强调思想建设的同时，还深刻论述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第一，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了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要求全党同志努力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第二，实行正确的“党员发展的路线”。针对“党员加入太随便”，“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的倾向，决议规定：“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

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决议既提出对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实行“厉行洗除”的方针，又规定了“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第三，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决议重申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要求“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决议强调“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的原则之一”。决议还提出了党小组的编制方法，认为“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

第四，“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方面“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另一方面“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三）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的领导是决定红军性质的根本条件。南昌起义是党独立领导军队的开始。三湾改编在实践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的功绩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为我军规定了一套政治工作的制度和原则。

一方面，决议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认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因此，革命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决议严肃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错误作法，认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就有“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决议对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即“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党的政治工作原则，解决了如何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例如，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红军的宗旨、“红军三大任务”、军队的三大民主、“执行三条纪律”和“六项注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古田会议决议”报送中央后，党中央很快对“决议”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向其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推广。1930年1月，周恩来领导创办的中央军委内部刊物《军事通讯》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在为这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1930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代表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四军的建党经验，认为红四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已经取得成效，“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已“存在于群众拥护之中”。由于各地党的组织和红军学习运用红四军的建党建军经验，党和红军都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提高，组织上也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总之，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总结红军和根据地党的建设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农村革命战争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和措施，成为毛泽东建党学说形成的标志。

三、《反对本本主义》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思想。一部分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在教条主义的危害下，党内已经发生了一次“左”倾错误，新的“左”倾错误正在酝酿之中。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哲学论文《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原题为《调查工作》。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在说明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1964年，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和个别内容上的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从哲

学的高度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一）论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问题，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等著名口号和科学论断

针对那种张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口号反映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直接调查了解，揭示了直接经验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源泉。针对共产国际代表对党的工作包办代替、发号施令的现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的论断，有力地抵制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一年多以后，这个口号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个口号。1931年4月2日，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调查还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则，还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调查研究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正如毛泽东所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二）阐明了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通过实践证明，而不是由什么“本本”、“先哲”或“上级”来证明

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真理检验的标准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当时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犯有本本主义错误的人判断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不是以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为标准，而是以马列主义的本本为标准，即以理论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毛泽东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实践证明”是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

了是对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所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因此，那些对于理论不是根据在实践中的证明就以为正确的，对于上级指示不是根据斗争的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检查而就认为是真理的，都是不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的。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

（三）把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和使用“思想路线”的概念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是把主观主义作为诸多错误思想之一来认识、批判和纠正的，当时还没有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则针对本本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僵死的教条的倾向，提出随着斗争实践的发展，理论自身也必须随之发展。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方针、政策等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斗争实际变化了，我们的这些理论、方针和政策也要随之变化。“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方法。因此，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固守“既定办法”的保守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尽管还没有对这条思想路线展开全面的论述，但从他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来看，已经包含了后来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在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科

学概念，并初步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早在我们党成立时就曾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的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制定的十大政纲中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1929年9月，周恩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明确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坚持和发挥了周恩来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主张“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提出了“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的口号。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称之为“群众化的方式”。同年11月，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又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同关心群众生活的实际利益密切联系起来。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时，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这一时期我党关于群众路线作了进一步阐述。其主要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

（一）论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我党群众观点的著名论断。此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堡垒政策”，总结中外历史上革命斗争的经验，毛泽东还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科学论断。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相信和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失掉人心，革命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

（二）揭示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与关心群众生活的内在关系

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在当时就是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要动员和依靠群众来实现党的这一中心任务，那就必须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还具体指出，群众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包括分配土地给农民，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学习文化，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三）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总结了我党动员和教育群众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具体”的工作方法。所谓实际具体的工作方法，就是指要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紧密结合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使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办得到。要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切忌空谈高论，不着边际；二是要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耐心说服，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强迫命令、以势压人。此外，毛泽东还阐明了任务与方法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

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总之，毛泽东从群众观点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没有充分展开这些思想，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但已经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这就为延安整风时期对党的群众路线作系统的理论概括奠定了基础。

第七章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

从 1935 年遵义会议到 1945 年党的七大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建党学说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这一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

第一节 毛泽东建党学说成熟的条件和标志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既有主观条件，又有客观条件，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正确结合。而这种成熟的标志则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

一、毛泽东建党学说成熟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是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不开的。就主观条件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但要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还必须有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领袖。在党的初创和大革命时期，党还没有这样一个领袖。因此，当时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只能处于萌芽状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开始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的重要条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为毛泽东获得领导全党工作的经验，从全党角度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

在毛泽东建党学说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做出了贡献。这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不断成熟的重要条件。例如刘少奇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党内斗争的理论，科学地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陈云的贡献主要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论述了党的干部、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纪律等问题。周恩来揭示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总结了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经验。任弼时则阐述了共产党的党性问题。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三）党员队伍数量的极大发展和质量的迅速提高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来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而广大的党员队伍是党的建设实践的主体，是毛泽东建党学说赖以成熟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员队伍的数量已从 4 万余人发展到了 120 多万人。从党员的质量上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空前的提高。这就为毛泽东等人吸取全党的智慧，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经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员队伍的实践是毛泽东建党学说成熟的来源，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是检验其是否正确的标准。

就客观条件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历史向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形势从内战转向抗战，由此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及其政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

就党的建设来说主要是：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如何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在贯彻它的过程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思想建设上，如何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在组织建设上，如何建立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并进一步巩固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建党思想就是在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熟起来的。

（二）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党这时已经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毛泽东等认识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并进行理论概括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是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只有在积累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经过反复比较和认真总结，才能认识其发展规律并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时党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又经历了抗日战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逐步认识到了党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从而使毛泽东建党学说不断成熟。

（三）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可以站住了脚、安下了家，这就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系统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创办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 10 余所培养干部的学校。

（四）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转变

当时党的建设同共产国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错误做法就是来自共产国际。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规定一般不直接干涉

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要求“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可以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有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毛泽东建党学说成熟的标志

邓小平说：毛泽东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时期，毛泽东论党的建设的文献很多。首先要数 1938 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 1939 年《共产党人 发刊词》这两篇；其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的一系列著作和党中央关于整风的一系列决定；再就是 1945 年关于七大的报告。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概括地说，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党建原理同中国党建实际相统一的基本方向，是毛泽东建党学说成熟的主要标志。

（一）从广度上看，这时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阐述了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的基本内容，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进入成熟时期。这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根据抗日战争党所处的复杂环境、党所担负的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以及党的组织状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豪迈地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第二，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结合的原理，即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党的建设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系的，这是无产阶

级政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三，论述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理论，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并认为正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第四，首次以完备的形式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学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成熟，在组织上获得巩固和发展，才能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才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二）从深度上看，这时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这种哲学高度，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标志。

《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即真理是客观的，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提出革命者要善于能动地改造世界，其中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矛盾论》则以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论述了人类历史上的两种宇宙观，强调革命者必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强调革命者要特别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

性问题。论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强调革命者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注意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论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强调革命者要正确理解和开展党内斗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则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第一，党的建设上的历史唯物论。我们党长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进行建设的，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总结了历史经验，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路线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典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独特的创造。

第二，党的建设上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建设上，正确处理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在思想建设上，正确处理了马列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关系、反对“左”倾错误与反对右倾错误的关系。在组织建设上，正确处理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与群众性的关系、党的干部标准上的德与才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此外，还有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党的领导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统一战线中的党与非党的关系、领导方法上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特别是解决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间的关系，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第三，党的建设上的唯物论和认识论。毛泽东坚持唯物论，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他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又说：“按照实际

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而要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尊重客观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二节 毛泽东建党学说在实践中 得到多方面展开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以下 6 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经验和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一、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

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党必须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在实现它的过程中自觉地建设党。

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这已是被党长期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真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错误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甚至主张共产党应并入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错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不论是陈独秀右倾还是王明“左”倾，都不能正确处理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部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从而使党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1935 年 12 月，党的瓦窑堡会议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后来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概括出

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正是由于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建党学说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地说：

（一）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密切相联系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党的建设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这就是说，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密切联系着”的。

（二）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党的政治路线这方面讲，当我们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从党的建设这方面讲，即“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就是说，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谁服从谁的关系。这不论是从党的建设对政治路线的总体来讲，还是从党的建设对政治路线的某些组成部分来讲都是如此。例如，对统一战线便不能一切讲服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批评过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新右倾投降主义，强调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三）党的组织与党的政治路线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毛泽东曾将党的组织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为战士与武器的关系。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按照毛

泽东的这一观点，党的组织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可以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党的组织是主体，而党的政治路线是客体。党的政治路线固然影响和制约着党的建设，但是归根到底，党组织是党的建设的行为主体，而政治路线只是进入党建主体的实践和认识范围的对象，是党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制定与执行、修改与充实都要由党来完成，因而政治路线也要受党的建设的制约和影响。

二、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理。

（一）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理

从一般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很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贡献则在于从特殊意义上，即认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内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我们党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严重存在，这就使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原理的提出大体可分为 3 个阶段：一是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其特点是毛泽东感觉到了“思想领导”的重要性，并提出要“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二是延安整风阶段，这表现在毛泽东已明确提出了“着重思想”建党的论断，并概括出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三是在党的七大上，其标志是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上升到了毛泽东的建党路线的高度，并作了完整的说明。

（二）论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性

毛泽东建党思想决不是孤立地片面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而是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去突出思想建设的主导作用。在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中，毛泽东有一个著名论断：“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从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关系看，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保证。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②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关系看，党风是党性和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毛泽东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说明党风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问题。

（三）阐明了思想建设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这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提出要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列宁曾使用过“思想上入党”的提法，但作为一个建党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来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对此“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以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

第三，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5页。

三、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1938年，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已经确立，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已经奠定，解决党的组织路线特别是党的干部路线问题成为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对此，毛泽东在8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历来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一条是不正当的，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9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论述了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关心和爱护干部的原则和方法，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干部工作的理论。这主要是：

（一）揭示了党的干部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认为，党的干部既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又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一思想，前者讲的是党的干部的重要性，后者讲的是干部的本质特征。对于前者，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因为“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②。对于后者，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二）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唯贤才。”毛泽东用来作为党的干部路线。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3页。

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与此同时，毛泽东严厉批判了“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他说：“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①

（三）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毛泽东早在 1937 年 5 月就论述了干部标准问题。1938 年 10 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又把党的干部标准概括为“才德兼备”。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才德兼备，也就是德才兼备。他要求我们在选拔干部时，既要看看其“德”即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修养、道德品质和工作作风等；又要看看其“才”，即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修养、业务素质、工作能力等。作为党的干部，应该是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不能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这就是“兼备”的含义。

（四）实行“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第一，要善于识别干部，这是用人之道的前提。对于善于识别干部的方法，即“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②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

第二，要善于使用干部，这是用人之道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③由此可见，恰当地使用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领导者领导艺术高低的重要标志。

第三，要善于爱护干部，这是用人之道的保证。对此，毛泽东提出 5 条爱护的办法：即指导他们；提高他们；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顾他们的困难。

（五）坚持搞“五湖四海”全面团结干部的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为党的事业共同奋斗。具体地说：

第一，要团结各方面的干部。如正确处理老干部与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

第二，要反对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对内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团结统一；对外产生排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因此，必须同宗派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第三，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犯了错误的人。这才是全面团结干部的关键，否则，便不成为全面团结干部了。

四、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大贡献。

（一）确立了党风概念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首次使用了“党风”概念。他指出，现在“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党风概念，而且阐明了党风的含义。从外延上看，党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接着，他又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就狭义来说，“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这里仅指党在组织生活方面反映出来的作风。就广义来说包括“学风和文风”在内的党风，则指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从内涵上看，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认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但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

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就清楚地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党的作风或党风，是党性的表现。

（二）强调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把党风问题看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①；“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

第一，党风关系到党的性质。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②这说明只有坚持党的优良作风，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

第二，党风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说过：“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这是因为“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③

第三，党风影响着社会风气。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④

第四，党风关系着人心向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取决于对党的认识和判断。而党的作风则是人民群众认识党的最直观、最形象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决定是否跟党走的最具显著特征的依据。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⑤

（三）概括出党的三大作风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作风。对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89 页。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84 页。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116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88 页。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3 页。

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概括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体现了党风最本质的方面，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关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要求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经常了解群众的思想，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关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所谓自我批评，就是指对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做出检查。所谓批评就是对他人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和批评是辩证的统一，其中前者是基础。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要把耐心的批评教育与严格的组织纪律结合起来。

（四）探讨了党风建设的途径

第一，整党整风是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整党整风。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整党，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二，调查研究是转变党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认为主观主

义是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它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要反对主观主义的作风，就要“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因为这“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①

第三，注重从党性和世界观上加强党风建设。毛泽东指出，党风不正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就是因为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武装起来的”。^②这说明党风与党性、世界观是密切联系的。因此，要端正党风，就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在改造世界观和增强党性上下功夫。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党内矛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武器。

（一）论述了“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

所谓党内斗争，一般是指党内在原则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对立和冲突。毛泽东认为这种“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③毛泽东这个关于党内斗争的概括，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指导思想。

第一，揭示了党内斗争的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说党内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二，阐明了党内斗争的性质。在这里毛泽东把党内斗争定性为“思想斗争”。虽然党内思想原则上的分歧有时可以发展到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页。

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分歧，但就实质来说，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范畴的问题。

第三，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根源。党内矛盾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是社会根源，即“社会的阶级矛盾”；二是认识根源，即“新旧事物的矛盾”。

第四，强调了党内斗争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如果党内没有这种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的重要途径。

（二）说明了党是“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了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强调了党内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意义。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原则。

第一，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倾向；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时，要注意防止右的错误倾向。

第二，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是“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②。

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要特别警惕两面派行为。这是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

第四，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②

（三）党内斗争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陈独秀家长制领导和几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他们在党内斗争上采取的方针和方法也是错误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斗争出现过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了处理党内矛盾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提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他还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这就为提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2年2月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惩前毖后”，就是要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 and 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另一方面，“治病救人”，就是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了错误的人，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4页。

六、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按照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

（一）对民主集中制的含义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首先是列宁确立的。但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没有作过明确的解释，而毛泽东则对民主集中制的含义作出了科学的概括。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执行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民主程度不够集中也不充分的实际情况，首次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民主和集中二者的本质特征，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了系统的阐述。一方面讲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另一方面又讲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此，毛泽东指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①

（二）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8页。

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①毛泽东的论述，为国家政治生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指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原则，途径和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国家一切机关都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人民内部也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既要有广泛的民主，又必须有必要的集中，要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三）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要党有力量”，就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②为使民主集中制成为调动全党积极性和巩固发展党的重要武器，毛泽东特别强调：

第一，要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他指出要“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要坚持“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第三，要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种倾向。二者各执一端，但本质都是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它们往往互相掩盖、互为依补。因此，要正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保持警惕。

第四，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了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主张要“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7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9页。

领导机关的行动。”^①根据这一精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党内法规的文件。

第三节 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贡献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它的成熟作出过重要贡献。

一、刘少奇的主要贡献

刘少奇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论党》等著作中，其基本精神有以下方面：

（一）创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大都是从总体上来讲的，而刘少奇则是从党员个体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方面展开的。

第一，强调党员修养的必要性。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就改造客观世界来说，只有加强党性修养，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就改造主观世界来说，只有加强党性修养，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第二，阐明了党员修养的概念和内容。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是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优良特性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一切优良品质和美德。他把党员修养的内容归纳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

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

第三，提出了党员修养的根本目的和途径。刘少奇指出党员党性修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①。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②。党员修养的途径是既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又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

（二）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

这些理论主要反映在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中。

第一，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根源。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有两方面的根源，即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③“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党内斗争的认识根源。

第二，论述了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性。刘少奇认为如果我们党“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那么“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此外“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

第三，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性质和实质。刘少奇深刻指出：“党内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11、108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67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9 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61 页。

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①

第四，提出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即必须是完全站在党的利益上，既要在思想原则上划分界限，又要在组织上采取温和的方式；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在党内外一般应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机会；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禁止党内无原则的纠纷。

（三）在《论党》中对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第一，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定义，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② 这一论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

第二，对党的群众路线及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高度的理论概括。刘少奇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③ 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第三，明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到客观规律的高度。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们党是由全体党员按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中央、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9—180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3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42 页。

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按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二、周恩来的主要贡献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发展与成熟也有重要贡献。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学习毛泽东》等。

（一）揭示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强调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肃清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周恩来一贯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早在 1923 年《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他就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党的六大前后，针对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要“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肃清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途径，主要就是必须“巩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改进支部生活，使支部“能成为群众的核心”，等等。

（二）在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第一，反对唯成分论的错误倾向。当时，党内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就是以“左”的唯成分论观点看待问题，简单地认为只要增加党内工人成分，实行党的干部和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就可以肃清机会主义。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点，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① 在党的改造中，机械地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9 页。

规定指导机关中工人成分的比例，“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①

第二，提出了坚决反对“左”比右好的错误倾向。当时，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人们对右倾错误深恶痛绝。但“左”倾则貌似革命，其危害性一时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因此，党内存在一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周恩来明确指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右倾和“左”倾都会给革命带来危害。他要求同志们坚决反对“‘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在反对右倾斗争的同时，要注意“‘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②

（三）总结了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经验，为党的领导干部做好领导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3年4月，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论述了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第一，领导者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要坚持原则，相信群众，要有学习精神和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第二，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抓住3个环节，即正确地决定问题；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况的审查。

第三，领导者的任务是抓好思想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要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要对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的情形进行审查。

第四，要重视领导艺术，准确把握革命运动的进程，善于抓住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善于团结群众，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组织先进分子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前进；要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2页。

不可采取排斥或歧视的态度。

第五，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即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则和原则；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用行政命令的方法。

第六，要有好的作风。即要有革命的胆略和求实精神；要谦虚实际、朴素勤勉、好学深思、机动沉着、坚韧顽强；要反对工作中的马虎主义、空谈主义、形式主义。

（四）阐明了对待革命领袖的正确态度

1949年5月，在我们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的历史时刻，周恩来预见到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人把党的威望，群众的作用，归于领袖个人；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功劳统统记在领袖个人身上，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甚至会有某些人把革命领袖奉为“神”。因此，他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重申了共产党员不要把领袖看成神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全党公认的领袖。但是，领袖不是脱离党和人民的“孤立的神”，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如果把一个人“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那就危险之至”。

三、任弼时的主要贡献

任弼时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党性问题的论述上。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为宣传解释这个决定，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又于1942年7月在中央党校作了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一）论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及其增强党性的特殊意义

对于前者，任弼时明确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①对于后者，任弼时从分析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本身的特殊性入手进行了阐述。

第一，我们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和我们的党员。

第二，我们党的组织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占较大比重，他们会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从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中脱化出来的，而是从刚刚破产的小资产者出身的，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第四，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和任务，要求无产阶级要同其他阶级组织统一战线，这样其他阶级的意识也会侵蚀和影响我们的党员。综上所述，所以我们党发出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论述了如何增强党性锻炼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任弼时提出应从5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深刻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出于自觉性、自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要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要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作斗争。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个人利益要服

^① 《任弼时选集》第231页。

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这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党的各个组织及每个党员都应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克服无组织与散漫性，这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们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充分估价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对于我们党的建设所起的作用

这主要是：第一，增强党性的决定“总结了我们党 20 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①。

第二，增强党性的决定对于全党起了教育的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过去那种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的现象没有了；在组织上那些闹独立主义的倾向的情形也比较少了。这些都说明党员在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进步。

第三，增强党性的决定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它引起了全党对于思想问题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学习。

四、陈云的主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写下了许多党的建设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论干部政策》、《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党的支部》等。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①《任弼时选集》第 244 页。

（一）论述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在干部问题上，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宏观上把握，那末陈云就是从微观上的具体展开。他认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①同时，他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应当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②此外，他还认为“党的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并把它概括为 12 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③。陈云提出的这些重要原则，把毛泽东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了。

（二）论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问题

在党员标准问题上，毛泽东原则上进行了论述，刘少奇侧重于党员的思想修养，而陈云则重点从组织建设方面阐述了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党员队伍的标准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陈云说：“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④。要从组织上保证和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党员。对此，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此外，在党员队伍建设上，他还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党员对党要忠实”等重要思想。

（三）论述了党的纪律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成立了由陈云和李富春负责的党务委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 146 页。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 147 页。

③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 44 页。

④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 64 页。

员会，负责处理党员的党纪、党籍和申诉等问题。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因此，陈云对党的纪律问题，在实践上有丰富的经验，在理论上有许多重要的论述。

第一，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问题的特殊重要意义。这是陈云从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缺点、中国革命的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当时党内的状况等五个方面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第二，提出必须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陈云指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①其基本精神就是主张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党内不允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第三，论述了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陈云说：“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②。又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③。这些论断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和铁的纪律的统一。

第四，提出纪律应保证党员和党组织应有的权利。陈云一方面“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④；另一方面又“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⑤，因为滥用纪律本身就是违犯党的纪律。

（四）论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1939年6月，陈云写了《党的支部》一文，论述了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建设原则、基本任务以及党支部与地方党部的关系等问题，丰富了毛泽东建党学说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29页。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31页。

③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31页。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30页。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50页。

第一，阐述了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陈云认为党支部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执行，党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

第二，阐述了党支部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问题。陈云认为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健全党支部的领导班子。一方面必须选举最优秀的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另一方面必须有健全的支委会。

第三，明确了党支部的基本任务，即进行群众工作；发展新党员；教育和训练党员；担负领导基层各项工作的责任。

第四，提出了地方党部如何领导支部的问题，即要了解支部的情况、给以适当的领导；要切实为支部培养干部。

第四节 毛泽东建党学说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革命胜利形势的要求，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报告。在这些文献里，他集中论述了改进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问题。

一、建立报告制度，维护集中统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全国胜利在望。在这种情况下，迫切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措施。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的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改、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央还要求各野战军的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也要向中央作一次政策性的

综合报告和请示，其内容包括军队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部队中偏向及克服偏向的方法、政治工作情况、军民关系，对各项指示的执行情况，以及敌我双方的装备与士气等情况。中央认为，只有向中央及时报告情况和请示工作，中央才能及时进行指导，使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又作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对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的指示及答复，不论属于何种问题，均需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所做的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每个中央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随后，毛泽东在《关于一九四八年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克服这些错误，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机关。

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严厉地批评了那种把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和所指挥的部队看成是独立王国的危险倾向，要他们向中央作出认真的检讨，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特别是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总之，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一系列指示和决议，是党中央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所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对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即将实现统一的形势下，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党顺利地执掌全国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健全党委制，加强集体领导

1948年9月，毛泽东针对一些领导机关存在着浓厚的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决定强调：

（一）健全党委制，就要反对个人专断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指出了当时某些领导机关存在的问题。这就是“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因此，那种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

（二）健全党委制，就要坚持集体领导

毛泽东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会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教研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

（三）健全党委制，还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

坚持集体领导，并不排斥和否定个人的作用，而是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毛泽东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这就是说，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分工负责地去执行。当然，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那种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以至抹煞书记或

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对的。

总而言之，坚持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公布后，极大地改善了党的各级领导，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关于这个“决定”的意义，邓小平 1956 年 9 月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指出：“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①

三、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艺术

《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改善了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是要实施正确的领导，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为此，毛泽东 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一）党委要处理好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能够“互相谅解”

对此，毛泽东讲了几条原则：首先，书记要当好“班长”。毛泽东认为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否则，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其次，书记和委员之间要互相谅解，有了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在党委会内部，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党委会内部有了矛盾，就要把它摆到桌面上来，决不允许背后说三道四。第三，党委成员之间要“互通情报”。毛泽东要求：“党委各成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29、230 页。

思想认识上的一致。

（二）党委要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统一，善于“不耻下问”

这就要求党委在做决定、下指示、发命令时，对不懂的和不了解的问题要虚心征求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把问题弄清楚后，再下命令。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外，都应该这样做。只有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才能克服盲目性，保证党委领导工作的正确性。这样做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当然，对于下面的意见要具体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错误的意见也要听，可以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总之，党委在做决定时，必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既要反对主观武断，又要反对极端民主化。

（三）党委要处理好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的关系，学会“弹钢琴”

党委会在抓紧中心工作的同时，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这就像弹钢琴，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掌握弹钢琴的工作方法，首先要善于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中同时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事物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抓主要矛盾，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抓住中心工作。掌握弹钢琴的工作方法，还要求我们在坚持抓主要矛盾、用主要力量做好中心工作的同时，处理好次要矛盾，适当安排和做好其他工作。这是因为次要矛盾解决得好，会给主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

（四）党委工作要划清两种界限，做到“胸中有数”

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有一个质量和数量的问题，党委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要了解实际情况，首先要认清事物的质，从质上划清界限。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事物不仅具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具有量的规定

性。认识事物的量是认识深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做到胸中有“数”，必须向群众向实际做调查，把确实的基本数字材料搞到手。总之，在党委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事物的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既要划清事物的界限，又要划清反映事物的数量界限。

第八章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完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已经改变性质和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下，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多次提出的关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关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关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好自身建设，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就是要结合新的情况，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

1949年至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是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根据这一新的社会特点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对党的侵蚀。与此同时，对共产党员的条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并随之开展了整顿党的组织的运动。党中央还提出执政党要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和实行，保证了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健康发展和对各项事业的正确领导。

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在 40 年代末扭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使革命形势迅速朝着有利于人民利益方面急剧变化，即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个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被围剿被压迫的党转变成成为掌握国家政权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执政党。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9 年 1 月 8 日通过并发布了（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的重要指示。指示中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但是由于形势发展极为迅速，许多新的问题已经摆在全党面前，需要给予解决，因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只能提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召开，以便适时地提出新的战略措施，使革命不失时机地向前发展。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始。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及其特点。这个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在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向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在《报告》中清醒估计和分析党面临的新形势并提出总的任务的同时，就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

二、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

（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取得国家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点，而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

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在其政治纲领中就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在建国前所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及其理论研究的中心内容，都是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看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因此，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国家政权，而应把革命引向深入，并从这一个高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清醒估计已经取得的国家政权及其面临的新形势。这一论断，是执政党自身建设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报告》中形象地表述了这一点。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①基于这一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同时向全党敲起警钟，要全党以更远大的眼光来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为眼前的胜利而固步自封，停步不前。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大家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执政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报告》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危险。因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发生变化。毛泽东认为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人民夺取政权后，国内主要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资产阶级。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已处于劣势。

因为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他们已不可能也无力同无产阶级进行公开的较量，必然地要变换手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来攻击和腐蚀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①因此，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充分认识这一新形势，应对自己提出更严的要求，从而自觉地经受新的历史考验。与此相适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关于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等重要规定。

三、及时整顿党的组织，加强自身建设

遵循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精神，我们党非常重视党的队伍的自身建设，警惕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袭和腐蚀。但是由于党所处的新的复杂环境，有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经不起新的历史考验，因而党内享乐思想有所增长，甚至出现了贪污腐化现象。为了清除这种消极腐败现象，毛泽东于1951年11月，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1952年在党的基层组织整理工作全面展开的同时，中央又发出了立即开展“三反”斗争的紧急指示。明确指出，“三反”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干部是否蜕化变质，关系到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随之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党中央认为“三反”运动丰富了整党的内容，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好方法。与此同时，还对县级以上干部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三反”运动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党的组织来说，是

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这一斗争的开展为党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另外，在建国初期，为了确保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在农村，对家庭出身是富农的党员的党籍问题，根据新的情况也作了具体规定。鉴于当时人民政府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成分的存在（有 5 种经济成分，其中也包括富农经济），但是共产党员则不允许剥削他人，不允许党员做富农，也不允许党员去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这是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党对社会经济现象和党员队伍建设分别作出了合乎实际的要求。明确规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剥削行为，就应无条件地开除党籍。这样，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健康发展。

毛泽东和党中央所以采取如此坚决果断的措施，是基于对我国以往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的总结提出的。

党的建设的实践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三反”斗争，是一次有效地反击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运动。它告诉我们，党执政以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党员队伍中的一些人的腐化变质已成为主要危险之一。事实同样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不懈地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进行斗争，就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立于不败之地。

四、努力加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及其特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并把它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国后，鉴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警惕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并建议党中央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使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

第一，把执政党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建国之初，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据此，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全党发出关于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指示。党员尤其党的领导干部切不能因为胜利而脱离群众，不要因为胜利而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要善于与党外群众和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党中央随之又发出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应允许党内外群众在报纸上对我们党的工作情况进行评论，进行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使党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由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威信不断地提高，党内已经开始出现拒绝批评和压制批评的情况。这种现象将直接破坏党同人民群众长期培育形成的血肉联系，损害党的崇高形象。所以，党中央及时作出决定，在人民群众中，在公开场合，尤其在报纸刊物上对于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使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尽快适应执政的新的历史环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我们党在建国初期曾进行过多次的整党、整干和整风运动。这些整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更好地使党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我们党对于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作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克服党与群众关系方面的关门主义倾向，在党的发展工作中要实行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的建党方法。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党处于非法的地位，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和接收新的党员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是当时情况所决定的，它保证了党组织安全发展的要求。但是建国后，执政党再沿用这种老办法，一则已无必要，二则易引起群众反感产生脱离群众的不良效果。所以，建国后提出公开建党，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所谓公开建党，就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公开进行关于党纲党章的宣传教育，对入党对象的考察，不仅听取

本人和介绍人的报告，同时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样使人民群众都来关心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党的建设置于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监督之下。

第二，执政党要自觉坚持和发扬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

建国后，毛泽东始终把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决定性条件。正因为如此，在50年代初期，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党的队伍在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也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这个时期，确有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滋长了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习气。因此，毛泽东于1957年3月发表了《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讲话。他认为，执政以来，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毕竟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新的条件下，容易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问题，还有一些不坚定分子，形成一种特殊思想，甚至用压制和打击的方法来对待人民群众。同时也由于革命的伟大胜利，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满足于现状，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足，计较个人得失。这些不良倾向的滋长，必然会脱离人民群众，影响党群关系。根据这种状况，毛泽东在讲话中尤其强调党员和党的干部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靠老资格吃饭。”^①他认为真正靠得住的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为人民解决问题。因此要教育党员和干部放下自己的架子，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才能保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本色，才能使党永远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2页。

质。毛泽东在该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发扬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这一问题，对于执政党的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它的最终目标是带领千百万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如果不具备这种革命的精神状态，那么共产主义理想将是一句空话。过去在战争环境下我们已经经受了这个考验，那么在新的条件下是否还要有一个革命的精神状态呢？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战争还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有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战争时期需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精神，而执政以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继续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因此，那种只计较个人得失，讲享受争待遇，是一种不求进步的消极现象，是与一个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五、执政党更应该提高共产党员的标准

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党在执政的新形势下要特别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因为党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肌体，那么就很难抵御外部细菌的侵入。建国初期，我党在这一点上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因而保证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1950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并形成决议，其中就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分析和规定。决议指出，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应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加以整理。这次会议要求正在进行的整党要以3年时间实现。其步骤，应以1年时间（1951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0—801页。

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党员的标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均应对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经过教育,然后将其中合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另外,对于整党中出现的有关问题怎样处理也作了规定,对于在整党中经过教育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

为此,党中央于 195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胜利后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等决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论述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如何在执政以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思想。

由于伟大的胜利,一些党员情绪也发生了变化,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不求上进,而是居功自傲,闹名誉、争享受,不打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拒绝党所分配的艰苦工作。有的党员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开始滋长。鉴于这些问题,刘少奇提出,必须对于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通过整理,对党的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以便发现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予以清除。同时还要对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以便继续提高那些好的党员,教育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通过教育和组织上的整顿,保持了党的纯洁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执政党更应该提高共产党员的标准。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专门以《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为题,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提出,全国胜利后,更应该提高党员的条件。因为全国胜利前,加入共产党的人,都要遭受反动派杀头的危险。在此情形下,投机分子和落后分子自然不会参加共产党。这就成为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限制。而全国胜利后,情况根本不同了。如上所述的自然的客观限制不复存在。因

此，如果不再从主观上加强限制，不更加提高对党员的要求，那么就会对党的队伍造成严重的危险。另外，其所以要提高党员的标准，还因为我们党已成为领导更复杂、更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因而对党员的迫切要求也不同于过去。再则，就是在新形势下，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作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的条件，也就更应该提高。刘少奇根据这种情况，认为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共产党员。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根据刘少奇报告的精神，总结了我党执政近两年的经验，制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共产党员八项标准：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在将来是要大发展的，并将发展成为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阶级。中国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将变成与工人没有多大区别的人。最后，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区别，也将逐步消除。所以，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最有伟大前途的阶级。它将不断地改造世界，也改造它自己。中国共产党正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党，并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党员必须这样来了解中国共产党。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第三，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在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如果

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

第四，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地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建设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第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第六，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谁如果是一个有了严重的错误而不能改正，并居功骄傲，自高自大，坚持错误的人，谁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第七，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一切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虚心地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及时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领导群众前进。为了这种目的，每一个有社会职业的党员，除从事社会职业之外，都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的分配之下担负一种工作。否则，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第八，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

这些条件说明，做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标准是很高的，只有下定决心锻炼和提高自己，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共产党员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必须是他们中间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

第二节 党的八大与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短短的7年间，除继续完成一些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外，已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基本确立，因而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的发展开始要求全面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分析新形势和面临的主要矛盾，确立党在新时期的路线和方针。而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研究和总结党执政以来的自身建设经验也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执政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自党成立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着1073万党员。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有113位代表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提出并总结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执政党要反对主观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较多，但7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仍然是执政党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一思想原则，早在延安整风时就提出了，而党的八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这个原则。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主观主义的错误在我们执政

党的干部和党员身上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之建国前更为复杂。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声，那么，主观主义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同时由于一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过马列主义的系统教育和实际锻炼，他们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

（一）加强全党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教育，提高党和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指出，首先必须加强对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使他们能够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研究和整理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与此同时，要加强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工作，使各种有关马列主义学科部门的研究都要适合执政党建设的迫切需要。其次，也要加强对广大新党员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知识，认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

刘少奇在《报告》中分析过去几年所曾犯过的某些错误，例如右倾保守和强迫命令等，都是因为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实际经验所致。不少党的工作人员，也同某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因此，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认识这种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使他们懂得调查研究实际情况是党的领导工作必备的条件。

（三）党的各级组织都要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

刘少奇指出，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四）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

刘少奇指出，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这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党内斗争中，应首先严格地区别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对于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虽然这些人毕竟是少数，我们务必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斗争，把他们经常清除出党。但是，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错误而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教育，而不要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对于这些犯错误同志，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对于在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虽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予恰当的纪律处分，或适当调动工作，但是仍然必须用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总之，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党提高了马列主义的党

悟，加强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扩大了党内民主，并且对工作中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这样，党的团结和统一就必然日益巩固，党的领导就能够实现。由于党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的实现，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能实现。

二、执政党要继续坚持群众路线

建国以来 6 年多的执政党建设历程表明，坚持实行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执政的新条件下，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下，结合我国执政特点，对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为执政党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执政党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报告）认为党的八大所以再次强调群众路线，是因为这个问题仍然是党的建设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执政以来，党的情况有很大变化，为群众路线提供了许多更为深刻的内容，需要予以总结。

邓小平首先在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明晰的阐述。他认为党的群众路线简单说来，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方面，首先要确立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从而把我们党的全部工作都当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明确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在于为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奋斗目标，并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创建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党为了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正确领导，在工作中还要真正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于 1943 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作的生动概括，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

见)集中起来(经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这种群众路线,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它是基于科学的认识论,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共产党人应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只有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因此,工人阶级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党只有认真地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才能给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他们前进。因此,党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任何骄傲专横,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都是同党的群众路线相违背的。

邓小平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我们党在执政后实行群众路线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认为在执政党的实际工作中,党员和领导干部最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因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不少党员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所以往往主观主义地考虑和决定问题,结果与人民群众越来越疏远。有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民奉承赞扬,不能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甚至还有一些品质恶劣的人,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这些现象说明,实行群众路线,对于执政党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时会遇到阻力和干扰。因为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遗留

物，在社会上有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执政党建设中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为了在执政条件下更有效地克服和反对官僚主义，真正实行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在《报告》中，根据当时党的实际状况和条件，提出了顺利贯彻群众路线的各项具体措施。要求在全体党员中加强党的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要求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者经常深入人民群众，搞好调查研究，以使自己的领导尽量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要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真正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实行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批评；要加强党和国家的纪律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给予应得的处分；要求各级党组织运用整党工作的经验，对全体党员进行作风整顿，在整顿中尤其要注意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三、执政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由于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政治生活是正常的。但由于执政以后的复杂环境，党内政治生活中也暴露出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此情形下，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重申“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①通过6年来的执政党建设的实践看，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执政党来说更为重要。邓小平在《报告》中结合党的建设的现状，首先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要正确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执政党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在建国初期，中央曾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5页。

给予地方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这是当时形势和工作的需要，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总的来说，还是对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不够，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上级组织所作的硬性规定太多，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行不通。这种过分集中的情况严重妨碍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为了及时纠正这种偏向，《报告》根据党章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提出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尤其在当时情况下强调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应遵循的几项原则：（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的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下级组织要定期向上级报告工作；（2）党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明确划分；（3）党的政策问题在领导机关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定，就必须服从决定。党的八大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的上述要求，对于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起了积极作用。

实践表明，执政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一定要认真注意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八大文献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认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保证。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与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所以我们党长期以来就遵循这一原则，在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好的制度和优良传统。

邓小平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根据党中央 1948 年所作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实行集体领导原则的主要形式就是党委制。因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在实行这个制度时，还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二者必须相结合，不可偏废。我们所主张的集体领导，并不是降低个人的领导作用，但是，个人领导作用只有通过集体的讨论，

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因此，我们主张集体领导必须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没有具体的个人分工负责，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任何复杂的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党的工作就会陷入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之中。

执政党为了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与党的关系。鉴于苏联共产党建设中已暴露出的弊端和我们党执政以来的实际情况，党的八大对领袖与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①邓小平还引证列宁的著名论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含义及其作用。认为领袖是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这是党的领袖同历史上一切旧剥削阶级领袖的根本区别点。我们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②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模范，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从苏联共产党当时揭示的问题看，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领袖同党的关系，反对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因为这种个人神化和崇拜已经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个教训值得吸取。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邓小平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③因此，我们党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正确处理领袖与党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防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4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4—23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

止和反对对领袖的崇拜和神化，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各方面得到贯彻执行。

四、执政党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根据执政以来党的建设的状况，明确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执政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之所在。所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也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实践再次表明，党要领导人民取得事业的胜利，就必须把人民团结起来，而这个团结的前提条件是，党自身必须首先坚强统一。建国以来，如果没有党的团结和统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这些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的完成是不可能的。执政以后，由于党的地位的变化。党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但是党的利益之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之所在。邓小平指出，由于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表明党居于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且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此，就要注意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关系，不能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这就是说，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形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的党组织，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全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国家工作提出正确、切实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

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发挥党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必须同各种错误开展斗争。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维护了这一时期党的团结和统一。邓小平在《报告》中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提出全党注

意对犯错误的党员要采取正确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团结的目的，也不利于党。

邓小平在分析上述情况之后，提出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他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党曾多次组织全党范围的整风形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收到好的效果。中央领导同志主动召集下级同志开会或谈话，听取来自下级的批评，并迅速采取实际措施改进工作，使自下而上的批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一些压制批评的现象进行了斗争。但是还有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并没有措施鼓励下级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搞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值得注意。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现象而斗争。

五、执政党必须对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

执政以来，党的情况正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损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为了提高党员标准，八大党章对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因为在新时代，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

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是，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分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划清界限。关于党员义务和权利，八大党章都作了适合执政党特点的具体规定。

邓小平在《报告》中，根据党章草案要求，详尽地论述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严格遵守党章和国家法律的问题。他指出，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党内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帮助敌人腐蚀我们的党。这种在党内以老爷自居的人，我们党是不需要的。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们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已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八大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党员必须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这些新规定表明党对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了。

为了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八大党章在提高党员标准的同时，对党的干部也提出了比普通党员更严格的要求。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向每一个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们就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党的干部是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受到了党和人民更多的信任，因此，他们对党和人民负有比普通党员更高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好坏，对党的事业有着决定的影响。他们必须不脱离群众，谦虚谨慎，自觉接受批评，改进自己的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特别要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还要

注意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工作。面对干部工作的新特点，邓小平指出，党的干部的管理工作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和提高。实行分级分部的管理，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互相结合起来，要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三节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对 执政党建设的艰辛探索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确立，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在这一新形势下也在思考和探索自身建设的道路。尽管这个时期出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总结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方面，提出了重要思想并作出理论概括，继续为执政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是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武器

党的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新形势，科学地阐明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官僚主义的滋长和国际波匈事件的教训，毛泽东在1957年1月，分析了我们党内的情况和值得注意的思想问题。他认为，从我国情况来看，当时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但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少数人闹事就是反映了这种状况。关于党内情况，他特别指出一些党员干部闹名利地位的不良倾向，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因此他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

教育，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新出现的问题。根据毛泽东这一论断，党中央提出了要重视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接收党员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人民对我们党的要求是很高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党员数目不足，而是数目已经很大，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党章的精神提高党员的质量。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甚发达的大国。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这不仅需要我们党制定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同样需要党制定领导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同年 6 月 19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它同时为执政党的建设阐明了所应遵循的思想理论原则。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回答了党如何观察社会和自身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这一分析提醒全党，要自觉地认识到不仅我国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而且党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毛泽东在指出这一情况的同时，还科学地论证了各种矛盾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他明确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

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同时也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他在总结延安整风运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认为在对待人民内部和党内的问题上，不能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更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因为这种错误做法只能使党的建设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是党的建设正常发展的有力保证。

毛泽东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还深刻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他认为，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时，要认识我们所说的自由只能是有领导的自由，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他指出，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二者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所以毛泽东认为，“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党在执政以后，党内一部分同志，因为革命的胜利，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也不足，闹名誉地位，争名利，严重地脱离群众。为了纠正自己队伍中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毛泽东在 1957 年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提出要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同年 4 月 27 日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之全党开展了检查党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和克服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的整风运动。根据时的情况看，开展这次整风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作

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对整个形势作了“左”倾错误的估计，所以使整风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反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二、在挫折中加深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再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能正确地处理党内各种关系，使党内的政治生活能够健康发展。但是自 1957 年，尤其“大跃进”以来，党内开始出现“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党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干扰，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正确执行，党的建设遭受极大的破坏，此种情形已经引起全党上下的关注和担忧，要求领导发扬民主，尽快纠正不良作风。党中央和毛泽东觉察到党内政治生活中这一严重局面，为了适应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认为化力气解决党内的这种不良倾向已经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为此，党中央于 1961 年 12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随后又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有 7000 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并检讨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所发生的错误及其原因，认真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都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专门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重要讲话。

（一）毛泽东联系党内状况，强调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我们党执政以来，尤其是 1958 年以来，党内开始滋长一种

不良倾向。有些人官做大了，开始脱离群众，压制民主，使党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和破坏，而且也给党领导的经济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次向全党强调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①很显然，这种态度不符合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态度。因为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党章也作了明确规定。所以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够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②。否则我们就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因此，民主集中制问题是关系到党的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党的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实践表明，要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民主与集中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从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又着重讲了发扬民主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③很显然，没有充分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6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9 页。

自由讨论和酝酿，就不可能真正从思想上实现党的集中原则。因此，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才有可能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中统一的含义。毛泽东在分析 7000 人大会的主题内容时，认为大会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但是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那么这种集中统一就是空的，假的，错误的。所以他指出：“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① 这里他再次强调了二者辩证依存关系。提出集中制只能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带头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办事。因为党委是实行集中过程的领导机关。但是党委本身的领导应该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决定重要问题。党委内部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有这样，党内才有可能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把集中的权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三）毛泽东指出，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开展起来，它表明党内是否充分发扬了民主。建国前后，毛泽东十分注意执政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避免过去统治阶级腐化变质的历史重演。党中央多次强调在党内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为此专门作出决定，因而那时，我们党内政治生活呈现生动活泼的景象。但自 1958 年以来，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削弱，有些党员干部非常怕群众，不愿同群众一起开展讨论，怕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在讨论问题时，有些人甚至不许人家讲话，有了错误也不许人家开展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毛泽东在讲话中剖析了党内出现的这种不良倾向，认为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党内正确的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所以他指出，共产党是为人民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就要欢迎群

众提意见，让人家讲话，自己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并且多作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实践证明，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①但是，批评的开展不是一种孤立的过程，如果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很好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只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活跃党内气氛，使民主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 1958 年以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郑重指出，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充分发表意见，有气出气，让人把话讲完。由于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表率作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了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为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作出了榜样。

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

随着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自觉地培养和造就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已十分紧迫地摆在执政党的面前，这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进入 60 年代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对干部要求更高。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加强干部教育，使大批能干的人才尽快成长起来已刻不容缓。刘少奇曾在党成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分析过这一情况。他指出，我们党已有 1700 万党员，其中 80% 是建国后入党的。这是我们党的新鲜血液，但是他们还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另外，就是建国前入党的人，是党的骨干，但他们对革命比较熟悉，而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熟悉。因此就全党而言，都有一个认真学习和熟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问题，使大家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客观规律。为了落实这一要求，中央于 1961 年 9 月发出《关于干部轮训的决定》，提出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随后于同年 11 月，中央又发出《对中央组织部 关于加强党员教员管理工作的报告 的批示》，中央批示提出：（1）在重新教育干部的同时，应当重新教育党员，这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2）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首先加强自身建设；（3）今后吸收党员必须切实注意质量。这些措施都对干部队伍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党的建设和国民经济工作都出现了良好的转机。与此相适应，中央组织部于 1962 年 10 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仍然很重，它不但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法宝，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法宝，因此在新的经济建设面前，“党要管好党”。同时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认为“党要管好党”，关键是管好党的各级干部。这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认为有些问题比较严重：一是脱离生产的干部人数过多；二是干部的水平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三是有些干部腐化变质。这些情况表明，加强干部管理提高干部质量，是非常紧迫的任务。1963 年中央批转的有关干部问题的一个文件中，严肃提出这些问题，要求全党把干部队伍建设提上党的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时还要尽快培养和选拔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接班人。同年第三季度，中央组织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送上的《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大力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认为从总体上看，我们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基本状况是好的，但有一部分领导班子很不健全，战斗力不强，特别是第一把手接班人衔接不上。认为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第一把手接班人的培养工作，将来就有脱节的危险。因为培养一个独当一面、德才兼备的第一把手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所以中央提出，从现在起就

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和选拔第一把手。为此，就要注意克服保守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打破论资排辈的束缚，积极大胆地选拔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了切实做好培养和选拔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首先必须搞好基础建设，尤其是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中央于 1964 年 4 月发出关于做好党员接收工作的指示。认为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来源。中央在决定中提出：今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任务，主要是进一步提高党员质量，为干部队伍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共党内领导层的更迭更引起我党的警觉，深感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选拔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不能等闲视之。为此，党中央于 1964 年全面地论述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沿着马列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我们要从上到下、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深刻教训和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这就是：

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

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对同志不能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和实行个人独裁。

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能像以往剥削阶级那样搞世袭制和个人交换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的群众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第四节 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中的失误与教训

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不但未能得以彻底纠正，反而继续蔓延和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内乱。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党建党，实际上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运动，给党的建设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又有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的失误。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给予正确的总结，以史为鉴，使我们党的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一、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执政初期，中国共产党按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精神，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因此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考验。实践证明，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及其方针政策都是符合我国情况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党

的建设的状况的估计开始脱离实际，作出了错误的理论分析，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给党的自身建设及党领导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时候，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失误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作出科学的分析，才能使我们对党的建设中“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旧错误的重演，使党的建设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发展。

纵观中国共产党 50 至 60 年代的状况，党的队伍基本是好的，腐化变质分子是少数人。这是确立我们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但是自 50 年代末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判断，尤其是在 1957 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中产生的“左”倾情绪，一直未能彻底纠正。进入 60 年代后，把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4 年下半年开始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全国基层有 1/3 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 1965 年 1 月，又进一步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 1965 年，又在《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中，对党内政治状况再次作出错误判断。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中央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此情形下，采取过去的斗争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并认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966 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左”倾错误被林彪、江青等阴谋家所利用。他们怀着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任意破坏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党的建设造成严重灾难。

二、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理论和“五十字建党方针”

执政以来，党的建设方面最大的失误和教训莫过于多年来形成的一整套“左”倾错误理论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五十字建党方针”，通过党的九大使其合法化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

196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还没有建立党委的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得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得逞，使党的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造成严重不纯。特别是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肯定，并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极力宣扬毛泽东多年来所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党的九大把这个“理论”作为党的纲领的主要内容加以肯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面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

削以后，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阶级斗争，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实际和党执政以来的自身发展状况。这个理论严重地混淆是非，颠倒了敌我关系，从党的内部削弱和破坏了党的建设和战斗力。

党的九大通过的章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党章许多条文直接背离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公然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野心家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总纲。同时，对党的性质和作用，对党员的义务与权利等作了片面的阐释和规定。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取消了新党员的预备期等。这些规定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九大以后所开展的“斗、批、改”阶段，其中整党是一项重要内容，其过程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在党的组织中渗透，直接给党的自身建设造成不良后果。1967年10月，党中央在一指示中明确提出了“五十字建党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968年10月，毛泽东又提出“吐故纳新”的指示，指出：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很显然，上述两指示完全是“左”倾错误的产物。这些又被康生和“四人帮”所利用，他们提出要“重建党”。把大批老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开除出党，同时把所谓的“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后果极为严重。

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斗争

虽然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左”倾错误和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但实践也证明，我们党毕竟是一个经过长期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他们坚信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曲折的斗争，这个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就是我们党所以能经受严峻考验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希望之所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和人民就以不同的形式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阴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特别是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虽然这个斗争被诬蔑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但是由于老同志们坚持了正确而顽强的斗争，毛泽东终于在1971年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实际上这个斗争是老同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斗争。也正因为党内有这种斗争，才使得“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受到一定的制约，使得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阴谋难以得逞。

“文化大革命”中期，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继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反革命阴谋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当1970年至1971年期间，林彪反革命叛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良好的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同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文，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

干部政策。这篇社论对加速解放和使用老干部起了扫除障碍的作用。此后一批老干部获得解放。1973年，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许多党的干部重新恢复工作，成为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力量。

周恩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仍然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一大批党内的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人民费尽了心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了毕生。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进行的斗争和工作，为后来彻底粉碎“四人帮”，为党的建设的正常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针对党内外存在的问题，强调要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其核心是党的整顿。

1975年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加重，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的整顿，使全国形势及党的工作和建设有了明显好转。他在这些会议及其他一些场合中，先后发表了《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各方面都要整顿》等重要讲话，特别强调党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中心环节。他认为只要抓住党的整顿这一中心环节，其他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而党的整顿其关键问题在于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作风的整顿。并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班子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省一级党委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地方党委的权威。这个时期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党的整顿的有关论述方面。即：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变“软、懒、散”的状态，努力使各级领导班子担负其责任，成为坚决执行中央正确方针，同

“左”倾错误和江青等阴谋家进行斗争的指挥部。为此，要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把这些人要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要反对派性。邓小平指出派性是各级领导班子没有战斗力的主要问题。因此，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党的三大作风不能丢，党委要按党章办事，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落实党的政策。特别要注意落实干部政策，首先要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实际上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强调恢复党的干部路线和群众路线。从而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当时在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央作了决定，除与林彪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释放。这一重要步骤，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起了积极作用。要注意建立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自发动以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对工矿企业及各条战线的工作造成严重损害。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要从制度上作出有关规定。这对内乱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有极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文化大革命”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深刻教训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党的建设而言，“文化大革命”直接打乱了执政党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及其战斗力，从反面给我们党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一）执政党必须确立并认真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建国初期，我们党正确分析社会现实矛盾，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建国方针，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并较快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及时分析并估量了社会现状，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

并随之制定了相应的党的政治路线。但自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左”倾错误思想开始萌发，至 60 年代中正式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背离了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导致党的建设改变方向，“五十字建党方针”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历史表明，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建设正常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已经确立的政治路线是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改变，全党都要坚决贯彻执行，这样才能为执政党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二）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的内乱所以能发生和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和破坏。这种现象所以出现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否则全党不可能得到深刻的教训。因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很深，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领袖和群众关系问题上的消极影响，我们党在执政以后没有使民主化和制度化得以很好地完善起来。因此，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蔓延，“文化大革命”就难以防止和制止。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从自身做起，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要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

（三）执政党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选拔接班人，不搞个人交接班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以后所掌握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因此选拔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按照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的意愿行事，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苏共斯大林搞个人交接班，我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选拔接班人一错再错，都带有过时的封建主义的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实践已表明，“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打乱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为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最高权力提供了方便，招致党的建设的严重破坏，教训极为深刻。

（四）执政党必须加强党风建设，始终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是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

第九章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也随着党的政治任务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正是适应这一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在总结国内外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在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当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科学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实现了又一次重大发展和飞跃。

第一节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环境和时代特征的产物。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正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鲜经验的科学提炼，是科学分析当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重要成果。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自1848年诞生以来，经历了15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

和毛泽东建党思想，已被实践证明是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政党的强大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党如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有效地抵御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便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面临的共同课题。对此，革命导师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实践，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列宁在短短的 6 年多执政时间里，虽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和原则，如执政党要坚持对国家政权实行总的领导，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执政党要不断提高党员质量等等，但是，由于列宁去世过早，上述思想不可能充分展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思想。如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等等。但由于 50 年代末期以后，党在指导思想出现了“左”的错误，这一探索便被打断。因而也未能从总体上解决这一问题。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多年的执政历程中，也提出和尝试了许多改革党的做法，但均未找到成功之路。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些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这一惨痛的教训把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人们面前，促使人们深思。

如前所述，我们党从 50 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党的建设也受到损害。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遭到严重破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和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新探索。正确认识党的建设

遭受的严重破坏，科学分析“左”的错误产生的根源，便成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本来面目，开创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左”的错误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表现有：

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断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党的方针和党的工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另一方面，大搞政治运动，在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必须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这样，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都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用阶级斗争去统帅一切和检验一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被错误地认为是“唯生产力论”，是搞“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按劳分配被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温床。

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颠倒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夸大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鼓吹天才决定论，制造现代迷信。把导师的语录，书本上的词句，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左”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本本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盛行。人们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看本本，唯独不看实践，不看群众意愿。其结果，严重违背和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由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设巨大成就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逐渐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到“文化大革命”时，其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并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削弱以至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果断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恢复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根本原则，并且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上述国内外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便成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全党全社会都面临着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历史性的变革，我们党虽然也曾经历过数次，如民主革命时期，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建国前夕，又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这些转变，其主要任务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而这次，却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僵化转变到开放搞活。这种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内外环境的根本转变，不仅是我们党未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这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变化，既为我们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正是在敏锐地把握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基础上，及时地总结了全党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新鲜经验，从而揭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规律。

（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方针必须作相应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此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与此同时，在党的建设的目标上，要求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上，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阶级斗争进行。无论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要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由此就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适应阶级斗争需要的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方针就不仅不适应新任务的需要，而且严重阻碍新任务的实现。为此，党的十二大鲜明地提出了必须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一崭新的建党目标，从而把建党目标和党的中心任务联系了起来。并在实践中确立了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的指导方针，规定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改革党建工作。这一正确目标和指导方针的确立，表明党的建设已经从适应阶级斗争向适应经济建设转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既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成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支柱。

（二）从僵化的体制、封闭的环境转变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要求不但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更要改善党的领导内容、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以及原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结构简单、发展目标单一、建设规模较小的条件下，曾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然而，一旦生产规模扩大、发展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复杂，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难以适应了。它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此，改革这种僵化的体制，就成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我们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通过改革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切，都对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容、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改变过去事无巨细一切都由党委包揽代替的做法，改变以往那种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党委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建立起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执行统一高效，监督富有活力，既集中统一，又相互制约的新型领导制度。为此，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好好研究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变成为一句空话。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把坚持、改善党的领导作为一个统一体，把改善党的领导提到与坚持党的领导并重的地位，提到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这既是改革开放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邓小平总结现实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党的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并探索一条从严治党的新路

子

由以行政指令性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使我们的经济活动、政治生活乃至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使党的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第一，市场经济是经济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它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允许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产权模式、多种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同时并存，自由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所在。而这种追求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多元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反对专制。因此，共产党要领导市场经济并取得成功，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保证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共同前进。第二，市场经济是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不论是国有、集体经济，还是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都要讲求经济效益和利润。这种承认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竞争机制，既可以激发人们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内在动力，也可以刺激人们的投机心理，诱发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观念和行爲。这种利弊共存的双重影响，要求党的组织，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抵制消极腐朽的意识在党内蔓延泛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全党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第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排斥特权，尊重法治，强调依法办事。只有建立起公正严明、强大有力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而法律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求执政党必须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内只有消除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废法等现象，全社会才能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风气。在党内，要建立起以制度建设为主的从严治党的监督和管理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使党的自身建

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使党的自身改革与整个社会的改革相协调，并起到有力的引导和保证作用。

针对市场经济诸项特性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要求全党必须认真研究党的自身改革这个重大问题，如：干部制度、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党内监督等等。实践的呼唤与理论的探索，为全党认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发展规律，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对峙态势，随着原苏联国家的解体，已不复存在。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并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有可能的。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上述国际形势的变化，指出，虽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①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把经济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解决，其政治独立、国家主权都无从谈起；只有摆脱贫困、落后，才能摆脱欺压、凌辱。二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兴起，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由传统的军事政治较量转变到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来了，经济技术日益成为各国之间竞争的主要形式。而要发展，要竞争，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稳定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国际新秩序。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

在这种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下，各国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谁认清了这一时代主题，谁把握住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总趋势，谁就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就能走在时代前列。反之，则会丧失机遇，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永远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早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就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加快了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一跃而成为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否抓住这一机遇，紧紧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并制定出一系列符合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严峻考验。为此，党必须及时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发展经济当做最大政治，肩负起历史责任。邓小平正是基于上述对国际形势特点的清醒认识和把握，提出了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并在实践中持之以恒地、毫不动摇地贯彻和推行，从而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世界总体形势是趋向缓和，但局部地区的矛盾、冲突和争斗，仍然此伏彼起，各大国之间的磨擦和利益争夺接连不断，天下并不太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驾驭整个世界发展的局势。另一方面，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党解体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便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的首要目标，他们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战略不会改变。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入手，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诸如拉拢、引诱我们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利用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政策上的某些

失误，干扰、破坏、阻挠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此，只有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把共产党内部搞好，才是挫败敌对势力的图谋，迎接国际形势的挑战，保证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第二节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邓小平作为党、军队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贯重视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系统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建党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成员，在长期的建党、建军和群众工作中，把毛泽东建党路线和原则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领导、思想建设等多方面颇有见地的思想，从而丰富和具体化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把毛泽东建党思想具体化，便成为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建党思想的显著特点。这些思想也是邓小平新时期党建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建党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著作中：《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在北方局党校整风会上的讲话》（1943）等。

（一）正确认识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关系，曾作过精辟的概括，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工作中把握党的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把握党的建设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邓小平出

色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还必须具备革命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包括统一战线）和党等 4 种力量。这 4 种力量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应相互联系和配合。如何联系和配合呢？邓小平强调：“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①然而“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②因此，“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③邓小平把党的建设与其他工作的这种相互联系与配合，上升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这样，就把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原则具体化了，使之成为指导根据地建设的具体方针。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

邓小平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对处理根据地党政关系作了许多精辟论述，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第一，批评了党内在党政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受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误以为党员包办一切就是党在政权中占绝对优势，“党权高于一切”就是党的领导。结果造成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忙于日常事务，放松了政治领导；造成一些党员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甚至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第二，强调党的优势和领导不仅在于党员在政权中的适当数量，更重要的是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依靠群众的拥护。第三，提出了党对政权领导的基本内容和途径。邓小平认为，党对政权的正确领导应采取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6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65 页。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66 页。

指导与监督的政策。所谓指导，就是使党的主张能够通过政权去实行。所谓监督，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就是使政权真正合乎统一战线原则。他强调，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责任上，而不是包办，遇事干涉。第四，阐述了党对政权的领导方式。邓小平指出，所谓领导，并不等于事无巨细地管理一切，指挥一切，党不要干涉具体事务；要依靠在政权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去保证党的领导，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党员和群众接受党的主张，要教育党员和群众正确对待政权、拥护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威信。第五，提出了党领导政权工作要贯彻民主的精神。他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就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们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三）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突出特点。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和丰富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这个基本原理。第一，强调了党内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通过整风，才能使每个同志认识到自己思想意识上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下决心改造自己，达到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入党的目的。第二，具体分析了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意识产生的根源。他指出，一是根据地的党员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干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骨干很少。而战争环境和长期独立工作，使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做得很不够。二是由于统一战线和分散游击的战争环境，使一些党外非无产阶级思想乃至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反映与渗透到党和革命队伍中来。三是由于残酷与频繁的对敌斗争环境，使党组织处于流动、不固定状态，分散多而集中少，工作非常繁忙，因而造成了开展思想教育的困难。这样，邓小平就把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与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特点，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特点结合起来，确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

任务和目的。他还根据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整风运动，都必须注意敌后战争的特点，不能机械采用延安的方式来进行，而必须注意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工作相结合，与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与自己的业务工作相结合。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邓小平探索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时期

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是邓小平探索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时期。1954 年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1956 年党的八大当选为总书记，成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期间，党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队伍、骨干力量和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壮大。然而另一方面，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也出现了严重失误，在处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正是在这种曲折复杂的环境下，邓小平紧紧地抓住“执政”这个不同于以往的党的建设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主要有：《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1954）、《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执政党的干部问题》（1962）等。

（一）充分认识执政党的地位给我们党提出的新的考验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党的路线和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

考验。^①这一新考验是什么？从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看，他思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在我们党内，尤其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在党内，特别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这种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听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其严重者已走上争权夺利、拉拉扯扯、搞小集团、破坏党分裂党的歧路。第二，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邓小平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进了城，执了政，具备了做官的条件，就最容易沾染官气。党内出现的各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就是这种官气的表现。而官气的沾染，必然使党员只想做官，不想做人民的勤务员。第三，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人为着捞取名誉和地位而入党。解放前，一个人决心加入共产党，意味着要丧失自由和生命。然而现在，这种危险不仅不存在了，反而出现了容易做官的好处。因而不少人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这种人一旦入党，就不去代表群众的利益了，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因此，必须对党员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鉴于以上三方面新考验的存在，邓小平提醒全党，必须“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②

（二）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积累了一套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执政后，我们在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4页。

以总结和研究。为此，邓小平在 1956 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和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就此进行了论述。

第一，强调民主集中制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

第二，提出要注意发展党内民主。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当前，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够，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也表现在党的组织关系中。因此，八大党章增加了扩大基层党组织、下级党组织和党员某些权利的规定。第三，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鉴于斯大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强调了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对于我们党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并重申了我们党在 1948 年 9 月作出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第四，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问题，是党执政以后，领袖与党、与群众关系上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论观点，阐述了领袖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他以苏共教训为例，说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强调我们党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这将成为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0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29 页。

（三）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创造出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宝贵财富。建国后，我们党积累了执政条件下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邓小平在 1956 年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第一，强调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他提醒全党注意：“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第二，概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邓小平指出，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确认这个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更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每一个领导干部，不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也要充分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一个党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少犯错误。第三，邓小平还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四）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提出要健全党的各级监察机关，加强党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21 页。

监督工作。1957年，他在西安干部会上又再次强调“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①邓小平提出：第一，加强党内的监督。即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党委内部的监督，这是最直接的监督。第二，加强群众的监督。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要开好，厂矿企业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农村要实行民主办社，学校要发挥教职员工会、学生会的作用。要让群众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场所、渠道，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第三，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提高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字方针的认识，党内不少人习惯于听一种声音，因此对这十六字方针想不通，要从斯大林搞得太死、搞得太单纯，导致思想僵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五）执政党关键是要管好干部

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邓小平作为主管党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第一，执政党关键是要管好干部。邓小平在担任长达10年的党的总书记的岗位上，深深地体会到，“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②第二，应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干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干部，但是党在提拔干部的工作中，存在着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页。

用“资格”选拔干部的主要问题，因而，妨碍了大批新干部的培养和选拔。邓小平对此强调，“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①第三，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建立交流制度。党执政以后，对所有干部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干部的范围不但十分宽广，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队长，而且每年数量还不断递增，由此造成了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副职太多等一系列问题。邓小平深感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要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他感叹说：“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②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邓小平强调干部要实行交流。他针对某些人的不正确想法，指出：“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③第四，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恢复组织部门对干部作鉴定的制度，加强党的生活会、党员和群众对负责干部的监督，要注意经常抓，经常抓就容易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还要加强干部的学习，恢复干部进党校轮训的制度。

三、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时期

从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到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①（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第 25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30 页。

③（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第 331—332 页。

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全党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鲜明地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他科学地分析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种种新变化，立足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展开了探索和论述，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方面，他通过总结教训，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与此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这些新思想和新观点，有些是对党建基本原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是对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的具体化；有些则是独创性的，如，把改善党的领导提到与坚持党的领导并重的地位，把制度建设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方针。上述探索和阐述，表明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和原则，既涵盖了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了初步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时代性。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不仅标志着党的建设拨乱反正任务的最终完成，而且标志着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因为党的建设目标，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而且是贯穿和指导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核心问题。目标的最终确立，表明邓小平对执政党建设理论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一定的框架。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又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这一时期，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集中体现在以下著作中：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高级干部要带头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等。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1. 在党的建设目标上，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2.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3. 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根据新的情况，不断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左”、右两种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4. 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强调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提出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了党的基本路线，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

5.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建立离退休制度，逐步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6.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强调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经常的工作；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7. 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永远不能丢；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完善党规党法，使党内生活制度化，保证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8. 在党要管党问题上，强调党要一管党员，二管干部，首先是管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

9. 在党同外国政党的关系上，强调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政党的关系。

第三节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而且各个内容之间相辅相成，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中，尤以新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为特色。认真学习与实践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坚定不移地用这一理论指导党的工作，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保证。

一、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制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

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成败。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党的建设就巩固壮大；反之则相反。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首先着重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即领导全党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还提出了保证这条基本路线贯彻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正确的政治路线来源于对社会基本状况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正是全面地、深刻地把握和认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才正确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又处于什么阶段？对此，从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曾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是处于不完全清醒的状态。我们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还曾在较长时间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基于上述错误判断，“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①邓小平在总结上述错误认识和“左”的方针政策带来的严重危害中，提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由此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始终不渝地扭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9 页。

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过去，我们所以长时期地把发展生产力推到次要地位，犯了急于求成、盲目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原因就在于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认识不清，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估计不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确立，为我们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正确路线的制定，一方面来源于对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科学分析，另一方面还来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多年来，我们所以制定了许多脱离国情的“左”的政策，从理论上讲，就在于我们离开了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加以反对。邓小平通过深邃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这一科学概括，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点；突出强调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理论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和当代中国国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两个基本点，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这条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要坚持和实行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来之不易，是全党历经 30 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它凝结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也凝结着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贡献。

（二）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然而，“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① 党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是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之初，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仍然处于一种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中。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在经济上，脱离我国国情，违背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经济增长模式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党的生活中，由于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严重窒息了人们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全党拨乱反正的关键。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同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僵化等各种“左”的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在批判“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他既充分

肯定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中的核心地位，又针对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积习，突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且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不解放思想，就会僵化，思想一僵化，就会教条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会照抄照搬书本、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就会脱离实际，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只有坚持二者的统一，才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精髓。

（三）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如何紧紧围绕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建设一个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领导重任的党，便尖锐地提到了全党面前。而建设一个好的党，第一位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党的建设的前进目标和指导思想问题。

党的建设的目标总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便成为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方针。由于这个建党目标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违背了时代的要求，因此它在实践中，不仅未能加强党的建设，反而使党的建设遭到了削弱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问题。十二大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①这个目标的确立，从根本上否定了把党的建设成为“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的“左”的提法，又从当前的历史条件出发，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时代活力，使党的建设方向更加明确，更加符合政治路线的需要和人民的意愿。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和要求。十五大政治报告对这个总目标和要求作出了更加全面的概括，即“把党的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邓小平在谈到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时，总是把坚持党的先进性与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始终认为，只有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实现党的正确领导；而只有把党的建设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党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在这里，邓小平为我们指明了新时期确保党的先进性的有效途径和具体道路。

要实现上述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党的建设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这就是，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理。邓小平在继承这一重要原理的同时，着重强调：今天党的建设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使其得到积极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作为党的建设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根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来研究和部署党建工作，围绕贯彻基本路线的实践来开展党建工作；就是要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际效果来

衡量和检验党的建设工作的。

（四）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科学论断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中心是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此，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和思考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科学论断，从而为我们实现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指明了方向。

党是在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经历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经历了对“西单民主墙”、“1989年动乱”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深刻批判。在这一系列具有关键意义的历程中，党内外都曾出现过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和思潮。对此，邓小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党的领导以新的内容。他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时期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它的先进性决定的。“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①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地位，决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富有成效的斗争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反复比较而作出的正确选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靠保证。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搞现代化，而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确立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能造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页。

社会环境，才能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投身于改革和四化大业。总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①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只有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党才能担当起领导的重任。为此，邓小平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着力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任务。他们：“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②怎样改善党的领导，涉及各个方面，包括党的组织状况、作风状况、领导工作状况等，就党的领导本身而言，邓小平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思想：第一，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应当怎样领导。邓小平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但也不能忽视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十二大党章总结了党的领导的历史经验，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第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党要善于把党关于国家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的所有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第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但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一些弊端。这就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第四，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五，“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2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

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党的领导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统一、紧密相联的。坚持党的领导，是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和归宿；而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党的领导的目的。改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不注意改善，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邓小平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的创造性的贡献。

（五）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的干部队伍

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关键。邓小平反复强调，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①他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指出这是关系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党的组织状况，特别是干部队伍状况又如何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种种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主要有：由于“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干部的正常选拔、培养工作，致使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年龄偏大；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造成干部的文化水平偏低，专业结构不合理；由于我国封建体制和意识源远流长，在干部管理体制上缺乏民主和法制，缺乏竞争机制，致使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也难以避免。干部队伍的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述状况，严重地阻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如何改变这一状况，便成为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第一，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一方针既包含了对干部的“德”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的“才”的要求，并且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了德与才新的时代内容。这一方针是我党关于德才兼备干部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第二，为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破除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旧的用人观念。他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陈腐观念；特别要重用那些被人民群众公认、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政绩突出的人，而决不能重用那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人。这些新的用人观念，对贯彻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为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他通过剖析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指明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要求将竞争、民主、公开和法制原则引入干部队伍建设中，加快干部选拔、培养、考核、交流、监督等重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六）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遭到削弱和破坏的教训，着重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和丢掉的法宝。从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个长时期内，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党内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并出

现“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好传统没有坚持下来。因此，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变革时期，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全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决不能削弱和放弃这个根本组织原则。

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不仅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对我们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开拓新的历史局面的重要性，而且还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必须发扬党内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实行“三不主义”原则；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集体讨论，严格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决不允许党内存在特殊人物和特殊党员。

（七）提出制度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防止十年内乱重演的办法，防止党内个人专断现象出现的办法，不应该仅仅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中去找，而应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中去找。制度问题不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一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我们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如果仅仅强调思想作风对于克

服党内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那么，过去出现的官僚主义、个人专断等严重问题还会重演。只有把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才能实现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努力加强制度建设，并使其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党根据新的实际，不断完善已有的制度，逐步建立新的制度，在党的建设的许多方面制定了若干制度和条例，使党内生活向制度化、规范化迈出新的步伐。

（八）开创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风建设的新路子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什么新的特点？对此，邓小平着重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指出了党风建设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二是指出了党风建设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任务和党所处的环境的变化，全党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邓小平提醒全党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党受消极思想侵蚀的危险性增大了。实践的发展，印证了邓小平预见的正确性。在改革开放步子加大、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党内出现了许多消极腐败现象。对此，邓小平严肃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①“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②邓小平在指出党风建设的紧迫性的同时，还针对消极腐败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蔓延、泛滥、高发等特征，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明确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

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①“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②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新路子。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党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其中包括：第一，加强思想教育。要教育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批判和抵制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想，牢固树立遵纪守法、廉政勤政观念。第二，加强法制建设。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要逐步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形成有效地防范各种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以法治党、治国的道路。第三，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纪。第四，深化改革，在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的同时，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二、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150 年的历程，其间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4 页。

建党思想以及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它们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回答了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建设一个肩负起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时期。此时，无产阶级虽然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既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马克思、恩格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无产阶级要不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创立的科学理论，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工作，而后又推动了第一批民族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在建党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由准备阶段进入直接行动时期。此时，列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落后的俄国，是建立一个组织松散、以议会斗争为主的西式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俄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创立了列宁建党学说。

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西方资本主义诸国，也不同于虽然落后，却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有着十分特殊的国情。如何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

临的特殊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出色地回答了党的建设面临的特殊难题，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始终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先进政党，便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面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紧紧把握“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现实新鲜经验的提炼。首先，他率领全党冲破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框框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正确地解决了执政党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问题。其次，围绕这一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回答了执政党建设的前进目标、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整体布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首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执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诸如坚持党的最高目标、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等，而且把这些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不仅以其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和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在实践中也有着重大

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20 年来党的建设发展的实践证明，党的建设的改进与加强、完善与巩固，有赖于党的建设正确理论的指导，有赖于全党运用这一理论，不断研究解决新问题作出的艰辛努力。当前，我国正处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关键时期。实现这一跨世纪发展目标的重任，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在于把党建设好。为此，就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把党的建设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保证我们党以崭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跨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十章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在实践中 继续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是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为行动指南，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从而既把党的建设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展开、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

第一节 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和 党的建设面临的新任务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使党面临着严峻考验；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新的挑战，更加重着党肩负的历史责任。所有这些，都要求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形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同时，“聚精会神抓党建”，继续大力推进邓小平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前进。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接过领导重任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艰难开拓将呼之欲出之时。在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的指引下，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应决定，这不仅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也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党切实有效地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但同时也给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问题。它要求党努力探索党的领导的新途径，即改变过去计划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领导观念、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解决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很好克服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领导混同于管理、权力大于法律、宏观与微观统管等问题，通过完善法制保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人民群众有效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通过完善法制有效组织社会生活，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国家。从而建立和创制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体现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趋势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以更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的途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必须转变在计划体制条件下，不少党组织领导人主要依赖行政权力实施领导的工作途径，通过加强科学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拓展密切党群血肉联系的各种渠道，增强党组织在各基层单位的政治向心力和组织凝聚力，来有效动员、组织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法令政策，完

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这些都要求各级党组织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组织建制、工作途径和活动形式，探索新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党组织工作方式和运作机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形式内容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要成为既具有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又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和法律观念，勇于与各种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充满时代精神的先进分子；党员要把坚持和实践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为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实际行动，成为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又充满奉献、牺牲精神，带领人民群众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模范表率。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对党员的思想觉悟、能力才干、文明水准和道德境界提出了新的具有时代性的要求。

（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实有了极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拜物教观念和商品交换原则，不可避免地产生着一些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吸收引进资金、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价值观念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内的思想、作风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极少数党员干部发生腐败变质，使我们党面临着拒腐防变的严峻考验。这表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到坚持党的根本性质，巩固党的执政领导地位的重大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以上这些，都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需要全党自觉地探索和回答，从而把党建设成为能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世纪之交国际新格局重组使党面临着严峻挑战

世纪之交国际局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种力量正经历着一个复杂的较量、分化、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能否经受住严峻挑战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抓住机遇，不仅关系到能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今后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中的地位、前途和命运。

首先，80年代末，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刚刚平息，国际上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相继倾覆。苏联东欧国家共产政权的夭亡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从思想理论上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是不是等于社会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代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加快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通过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快地跃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从政治上说，当时的西方反动势力正借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国内国际困难，施加各种巨大压力，企图使苏联剧变在中国重演。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说，1989年的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又一次历史考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着这一严峻挑战，而这一严峻挑战使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来第一次直接面对着党自身和社会主义政权生死存亡的威胁。

其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从而使得过去的两极化世界格局朝多极化格局方向发展。尽管中国必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然而，中国能否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多种原因，竭力遏制我国的发展，并力图“西化”、“分化”我国；另一方面

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角色配置，归根到底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各国激烈竞争中求得快速发展，才能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这一挑战的另一层涵义，就是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纪中是以繁荣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再次沦为西方强国的附庸？中华民族面临着又一次影响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口。江泽民在 1991 年初就指出，当前世界政治风云多变，经济竞争更加剧烈。我们的经济建设能不能搞上去，综合国力能不能大大增强，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江泽民要求全党对此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

这表明世纪之交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国家、民族之间的生存发展竞争，并且是直接以国家民族之间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竞争态势的优劣强弱来表现结果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衰盛亡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为一体。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挑战中抓住有利时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才能胜利地回应挑战。

正是这样的情势，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角度思考党的建设，并且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置于全球范围政治力量的较量变化大背景中观照，使党的建设问题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江泽民曾说过：“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江泽民在 1989 年底指出，不管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将怎样变化，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面对现实，把握未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紧迫感，充分发动和依靠全党的力量，下工夫抓紧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以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目标关键在党

回应严峻挑战，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在于“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基于此，党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目标，作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决心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而要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党。“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党的队伍是团结巩固、步调一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前程似锦。”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赢得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全面振兴，胜利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

现代化建设在本质上是世界上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通过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而体现出来的综合国力竞争。从全球范围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将最终由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以及国力竞争的态势所决定。当今人类社会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各国间的竞争更趋激烈，而知识经济的信息共享特征又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从而后来居上，跃入先进国家行列。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能否抓住机遇，同时又有能力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实现这样的跳跃。这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既存在严峻挑战的巨大压力，又有着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的极好机遇。而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一段极为宝贵的机遇，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完成历史遗留的工业化任务，迎头赶上当今世界的信息革命潮流。我们面临的任务之艰巨、时间之紧迫，是当今世界各国少有的。因此江泽民多次指出：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是我们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进而为并工业化、信息化这两化于一化，为下一世纪中华

民族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这要求极大地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既要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头脑清醒，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敏锐的政治判别力，又要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开放的时代先进意识，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素养，善于应对复杂局势，稳妥处理各种矛盾。

从国内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看，90年代这10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第二步关键的10年，又是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基础的10年。实现跨世纪目标实质上是中国社会的又一次腾跃。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最为艰难的攻坚阶段，各种最深层的矛盾将失去过去所有的屏障而凸现出来。这些矛盾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影响，处理不好将危及整个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同时，这段时间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定型与我国经济结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交迭的时期。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既是一切矛盾的焦点，又是解开一切矛盾的关键扣结。这不仅需要党的正确决策，需要党有驾驭矛盾、把握复杂局势的素质能力，而且需要党对在解决深层矛盾时整个社会所不可避免而产生的巨大震撼具有极高的控导艺术；这不仅需要全党的紧密团结、艰苦创业，而且需要党和人民的精诚团结、共同奋斗。所有这一切，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全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是根本、是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为指导，更自觉地探索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新路。经过10年的探求，逐步明确了“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并围绕这一总目标的实现，构建了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内容，使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第二节 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从 1989 年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着眼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立足于未来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面对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聚精会神抓党建”，继续推进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 1989 年政治风波中暴露出的问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接任时，邓小平同志告诫：“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抓起，着力解决当时党的自身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布几项决定，建立举报制度，集中力量抓紧查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依靠群众严惩腐败。接着，中央连续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组织部长会议，对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对解决党的自身建设的几个迫切问题作了研究。随后，中央于 1989 年 9 月 28 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提出了从 8 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为了切实加强党群血肉联系，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党还召开了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这几个文件中，中央就拓宽党同各界群众联系的渠道，自觉接受各界群众和民主党派监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作用等做了一系列明确规定。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中央于 1989 年底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党建理论研究班。江泽民在研究班上作了《为把党的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回答了党的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澄清了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思想混乱，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前进目标、基本原则和工作重点。这一讲话为进一步抓好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建设的前进。

根据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精神和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实际需要，中央在 1990 年 2 月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专门部署搞好干部考察，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工作，提出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此后，中央继续就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抓紧培养教育年轻干部，强化党内监督等采取了措施。在纪念建党 7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又向全党发出“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号召，提出了党的建设的 4 项重大任务。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党建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经过两年多富有成效的努力，党的建设呈现出全面加强的好势头。党在极为复杂的局势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顺利地解决了国际国内的各种重大问题，创造了安定团结的良好政治、社会条件，使党得以继续有步骤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二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逐步形成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部署

这 5 年间党的建设的基本特点是，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精心部署、切实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 5 项任务，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部署。

首先，切实抓好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落实。1993 年 11 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决定》，要求广大干部系统学习这一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为了把这一学习引向深入，中央举办了 4 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各地各部门党组织也举办了学习班。全国还举行了 3 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在继续组织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同时，用 3 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章，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

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党的十四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决议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要求。江泽民在党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新形势下反腐败的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工作重点。此后，在中央纪委第三、五、六、八次会议上，江泽民分别就密切党群关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问题做了重要讲话。5 年来，党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和行政、经济决策的实施制定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党纪、党规和制度，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大案、要案，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使反腐败斗争由治标到治本，深入

展。

在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成为突出的环节。为此，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强调在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部署的同时，特别要提出和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 3 个问题：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从政治家的高度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 5 个方面的要求。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指出首要的是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四中全会后，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通知》，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建立科学制度和规范程序，以制度保障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素质，克服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中央还下发了《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1996 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对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这一讲话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干部队伍建设。

总之，在中央的有力领导下，5 年来党建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整体推进和突出重点有机结合的格局。即把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做为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性建设；把反腐败、党风廉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组织建设作为突出环节，干部队伍建设又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制度保证党的各项建设的有效落实，并使这几方面有机配合整体推进，使党的建设在前两年全面加强

基础上，又有明显的进展。

三、党的十五大以来：继续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

十五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特点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在原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党的自身建设改革。

党的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关键在于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为此，党进一步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这就是：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解决好两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为此，党的十五大作出部署，确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江泽民发表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文章。不久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把全党的理论学习深入、持久、扎实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央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与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发出了《关于在县（处）以上党政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用一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这项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

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围绕“一个总目标”，解决“两大课题”，加强“三方面建设”和发挥“三大优势”，构成了面向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框架和总体部署。

第三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从 1989 年以来的 10 年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把邓小平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给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新的党建伟大工程的基础性建设。党的十五大的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对党的指导地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极为重视这一问题，始终把它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地位。

（一）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江泽民指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

在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江泽民鲜明地提出了“旗帜”问题。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

告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情地回顾了党成立 70 多年来，先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郑重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历史过程，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更加强调：“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庄严地宣告：“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二）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是政治上清醒和坚定的基础

1989 年江泽民就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他认为，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党和人民的思想，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江泽民说：“全党同志应该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认识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坚持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意义。”党的十四大把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武装全党，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摆到全党面前。党的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并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党的十五大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三）学风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指出：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能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理论上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中央对全党理论学习的一贯要求。江泽民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更加全面自觉。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联系党的历史经验，联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联系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联系自己的工作 and 思想实际学习理论。他多次强调，学习理论要紧密联系实际，认真探讨和解决当代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

一是要在认真研读邓小平同志的原著，全面系统地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上下工夫，要努力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搞通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理论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前进。

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新的形势，着眼于新的实践，研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

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

三是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为此，中央特别强调全党必须在学风问题上有一个明显进步，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

（四）把抓好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作为党在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空前深刻的历史性巨变之中，人民群众中的一些深层思想问题需要得到清楚透彻、令人信服的答案。用邓小平理论统一人民群众的认识，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党中央要求把抓好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与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使邓小平理论成为团结人民、凝聚力量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在实践中思考和探索如何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增强党的执政意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要通过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向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等来实现。按照宪法规定，国家各级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同时，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形势、任务

和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改革和探索，以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决不是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取消党的领导。

第二，党的领导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坚持改善党的领导要靠我们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靠自己的政治坚定性，靠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要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省部级以上干部肩负着重大的社会政治责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江泽民指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和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从国内发展看，我们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新知识、新经验层出不穷。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掌握新知识，摸索新经验，既是新的实践过程，也是新的学习过程。不加强学习，就不可能取得领导的主动权；从国际形势看，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国际竞争愈加激烈。国际竞争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才的竞争，是领导者的能力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干部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需要学习或重新学习的东西很多。因此，江泽民极为重视学习问题。他多次强调，干部必须有紧迫感，必须增强自觉性，努力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

第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要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领导集体，是保证党的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要着重解决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廉政建设等 3 个问题。江泽民于 1995 年 6

月在中组部召开的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会上，要求县以上干部“尤其要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理论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大的进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江泽民 1996 年又强调了 3 条：一是建设好领导班子，关键是要选好“班长”。在选好“班长”的同时，重视搞好群体配备，实现领导班子的优化组合；二是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三是坚持做好领导干部的交流工作。通过落实这些要求和措施，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充满活力。

三、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密切党群联系，是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密切党群联系既是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人民群众，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全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能否在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党的根本性质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一）对党群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形成新的认识

第一，强调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发展观。江泽民在庆祝建国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全党同志必须时刻警惕在执政条件下，由于党的权力地位变化而带来的脱离群众的危险，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努力保持和发展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第二，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内

涵的一个深刻揭示。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江泽民指出：讲政治，就要求坚持尊重群众尊重实践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江泽民还特别指出青年干部尤其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二）重申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必须切实转变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江泽民指出：基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根本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能保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要克服一些人热衷于照搬西方的某些管理学，贬低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方法，把一些干部的思想搞乱，作风弄浮的倾向。

党中央要求党政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起人民至上，群众第一的思想，经常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诚心诚意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和建议。江泽民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说：“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尊重实践必然尊重群众。干部的成长规律表明，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就是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领导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领导干部要不断总结经验，善于运用群众创造的经验来引导群众前进。“要把这件事放到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度来对待。”

（三）党制定政策必须反映和代表群众根本利益

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要求。这不仅要体现在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并且首先是要体现在党的路线政策中。江泽民在

1989年就明确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性问题，都必须十分审慎。”后来，江泽民在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不要忘了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确保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按照邓小平所要求的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做为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一个根本尺度。正是由于此，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才充满自信地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符合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说党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

（四）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和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强化党和群众的紧密联系

过去我们党在加强党群关系方面，较多的是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下工夫，而从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着手，开拓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群联系的新渠道新途径，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探索。党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建立一系列联系群众的制度，拓宽党和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党中央在实践中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使这些决定、制度得以具体落实和不断完善健全，并严格检查落实情况。所有这些，不仅在及时沟通党和各界群众之间的思想认识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而且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与加强党群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党领导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为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奠定了必需的制度基础和机制构架。

（五）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严惩腐败

第一，江泽民指出，党执政以后，获得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会更大。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必须毫不留情地同一切腐败消极现象作斗争。

第二，要把反腐败斗争放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局中来把握，放在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位置来抓，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结合起来。江泽民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在党的反腐败斗争之中。

第三，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实事求是地确定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目标。“我们既要看到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打好阶段性战役。要做到持久作战和打好阶段性战役相结合，发动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查处相结合，查处大要案和堵塞漏洞、加强管理、健全制度相结合，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突出问题，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第四，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反腐败要靠教育，靠法制。要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领导干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极端重要性。领导干部要作到“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要“自省、自重、自警、自律、自励”，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法制是保证。对腐败案件的查处，不管

涉及到谁，要一律按照法律办事，通过严格执法，达到以法保廉。同时，必须在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上下工夫，切实做到监督到位。重点是强化党内监督机制，要加强党委会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要把党组织的严格监督和党员干部的认真自律结合起来，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健全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做到两手抓，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四、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成为党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指导下，面向新的实际作出了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这主要是：

1. 在理论上明确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决不能放弃和削弱民主集中制，而是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2. 把发扬党内民主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党内民主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以引导、保护和发挥积极性为出发点，紧密结合党组织的职能和党员的权利、义务而展开，发展党内民主要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决策民主化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

3. 维护中央的权威，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力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4. 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并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必要的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职责范围、

议事规则、决策程序。

5. 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明确党内监督的实质、主要内容、监督重点，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注意防范党员干部发生违纪违法行为。

6. 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制度保证党的各项任务的切实完成。近 10 年来，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有关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内选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党员和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等方面的一系列党纪党规，使党内的规章制度逐步健全配套。

五、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根据新的实践要求，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丰富了邓小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干部成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振兴中华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皆系于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高低。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望，要求我们在新时期必须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好，特别是要建设一支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能够深入实际，开拓进取，勇于负责，顾全大局，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这是一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组成的宏大干部队伍。能不能培养和造就这样一支

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把干部队伍建设这件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大事抓紧抓好。

（二）全面提高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党的高级干部要成为会治党治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90年江泽民就提出，党校要通过培训干部，引导和帮助干部从5个方面提高自己的素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从政治家的高度对高级干部提出5条严格要求。以后，江泽民就领导干部讲政治、全面提高中高级干部的素质做了多次重要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是：（1）高中级干部的首要职责就是要注意讲政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是做合格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重要条件；（2）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全局观察问题，想大局、议大事、谋大计。要时刻胸怀大局，坚持以大局为重，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3）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高低，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认真学好理论；（4）要提高执政和领导水平，就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知识潮流，要倡导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精神，不断丰富思想，提高创造能力，做好领导工作；（5）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带头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以律己、廉洁勤政、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三）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中央把培养干部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始终紧抓不懈。1989 年底，总结我们党和苏东国家的经验教训，江泽民就提出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抓紧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必须下工夫做好领导骨干的培育工作，只着眼选人用人忽视育人，既是短视的，也选不准人、用不好人。1996 年江泽民在关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中又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第一，干部在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才能有所作为。第二，年轻干部要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要下苦功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打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思想功底和知识功底。第三，各级党委要对年轻干部严格要求、热情关心、严格监督，帮助年轻干部尽快成长和成熟起来。

（四）‘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利形成竞争机制，这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必然途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继续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为此，中央制定并实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党的十五大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特别指出，要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尤其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符合党政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健全一种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形成一套管理严格、制度完备、群众参与的监督体系。

六、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来自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有了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才能广泛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各项任务。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使之始终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探索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鉴于苏联东欧国家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鉴于对 1989 年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的反思，江泽民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坚强有力还是软弱涣散，直接影响着党的生机。在新形势下，能否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荣辱兴衰。江泽民在 1989 年 7 月发表的《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一文中进一步警示全党：“在如此深刻、广泛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如果党的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广大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那么，党要对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有效的政治领导，势必因为缺乏坚强的组织保证而成为一句空话。”党的十四大把努力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作为党的建设的四大任务之一，并提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我们要把基层组织建设成为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群众，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坚强堡垒，改变一部分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

（二）提出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在组织上的优势，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根据新时期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4 条指导方针。第一，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用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第二，必须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运用已有的成功经验并进行革新和创造，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第三，必须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第四，必须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规划，又要抓紧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

（三）结合各自特点，做好基层党组织工作，努力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

加强农村党基层组织建设，把农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坚强核心。江泽民指出，搞好农村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基础一环，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农村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政治组织保证，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好班子，尤其是要有一个好书记；培养锻炼一支好队伍；选准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的经营体制；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以后，中央又把扶贫和党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指出村级组织建设的关键是建设一个好支部，选准一条好路子，制定执行一套好制度，真正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推动企业深化改革中，坚持和改善党对企业的领导。江泽民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决不能丧失。企业党组织在深化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都重申要“充分发挥企

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选配政治强、会管理、懂经营的优秀人才担任企业领导工作。为了加大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力度，1995年中组部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后来，党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通知》。在这些通知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对不适应改革和发展形势要求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进行充实调整，真正实行优胜劣汰。同时，中央专门举办了关于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研讨班，就企业深化改革中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加强机关、学校、街道和其他新经济组织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机关党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是紧密结合本单位的业务工作，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监督。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学校党的建设要围绕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培养“四有”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来进行。城市街道和各类新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面临着大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结合各自实际，根据各自特点，探索与此相适应的党建工作的新方法和新内容，寻找发挥党组织作用的有效途径。

（四）重申党员质量重于数量的思想，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党员队伍

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6月就说过，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的战斗力，这个任务已经突出地摆到全党同志的面前。由此，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一项基本工作。中央在当时提出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党纲党章的基本知识、党的基本路线

方针政策的教育。党一方面始终坚持要严格党员标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针对改革开放给党员队伍带来的思想变化新情况，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出要加强党员的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并对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了 4 条明确要求。

综上所述，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真正做到“聚精会神抓党建”，全面贯彻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并面向新的实践、面向新的世纪，力求探索解决党的建设所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为把党建设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作出了不懈的富有成效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新的实际大胆思考大胆创造，不仅展开、深化了邓小平的党建思想，而且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新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党的建设推向了前进。这些新的理论观点还会在实践中进一步生长，并必将有力地指导党的建设的自身改革，从而使党不断呈现出新的时代风采，带领中华民族去创建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明天！

后 记

为了适应党建课教学的需要和加强教材建设，在中央党校教务部的支持下，我们集体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一书。

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为线索，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著作为根据，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本教研室过去出版的同类教材，又吸收了近年来教学和科研的新成果，力求在内容上更加充实、结构上更为合理。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和遗漏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主编为卢先福、赵云献。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梁妍慧（绪论、第九章）张荣臣（第一章）卢先福（第二、四章）赵云献（第三、五章）、任铁纓（第六、七章）、张国荣（第八章）、蔡霞（第十章）。全书最后由卢先福、赵云献统改定稿。梁妍慧负责全书的编写组织工作。

教务部岳长龄主任、李援朝副主任及教材处徐跃、苏燕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组织编写和编务工作，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
党的学说史教研室

1999年5月